

校内试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上册

(修改稿)

D23

D23
129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语录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要；义主五新新要不，义主思京品高要

。付新斯则新要不，大五即光要；要长要不，新

说 明

一、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以毛泽东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我们编写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只是一个教学参考材料。

二、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月所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修改稿。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吉林市城建局、长春铁路分局、营城煤矿、工人理论队伍的指导帮助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学习和参考了一些兄弟院校的教材，在此深表感谢。

三、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修改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现仅作为校内试用本印发给学员，欢迎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编 者

一九七六年七月

目 录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1)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

(1)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1)

(5)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2) 五四运动…… (6)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毛主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活动。

三、毛主席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18) 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6)

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20)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1)

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和安源路矿大罢工。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节 党为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毛主席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28)

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革命群众
运动的高涨…… (28)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的
发展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一) 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
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 (35)

(二) 三、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41)

(第三节)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投降主义
路线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的发表…… (45)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
起义。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 (45)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上海工人的三次
武装起义。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二、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51)

在农民问题上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
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毛主席《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三、毛主席挽救革命的斗争。陈独秀对革命的

(二) 可耻叛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59)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加紧干涉和蒋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 (57)

大会。陈独秀的叛卖活动。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01)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67)

第一节 毛主席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104) 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67)

一、工农红军的创建和井冈山

(104) 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67)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状况。“八一”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和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二、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111)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76)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的斗争。陈独秀取消主义的破产。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80)

第二节 党为巩固发展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和反对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87)

(104) 一、古田会议，毛主席《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发表…… (87)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古田会议，毛主席

(121)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发表。

二、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土地革命的

(131) 开展和党的土地革命路线…… (93)

| | | |
|------|--|-------|
| | 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党的土地革命路线。 | |
| | 三、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 (97) |
| (70) | 四、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 (101) |
| | 第三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 (104) |
| (70) | 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 (104) |
| |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及其主要错误。 | |
| (87) | 二、红军战争的胜利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与政策…… | (111) |
| |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与政策。 | |
| (00) | 三、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 (118) |
| (75) | 四、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 (120) |
| | 第四节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被粉碎。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 (125) |
| (80) | 一、粉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 (125) |

| | | |
|--|---|-------|
| 二、 | 华北事变。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 (133) |
| (178) | 华北事变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 |
| | 瓦窑堡会议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 |
| (182) | 三、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 (140) |
| (177) | 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
| |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144) |
| (181)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 | 五、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从思想路线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批判…… | (149) |
| (181) | 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批判…… | (149) |
|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 | |
| (183)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 (158) |
| 第一节 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和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的发表…… | | |
| (189) | 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对立。党的洛川会议…… | (158) |
| (192) | 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尖锐对立。 | |
| (192) | 党的洛川会议。两个战场的两种局面。 | |
| | 二、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 | (168) |

| | | |
|-------|-------------------------|-------|
| | 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 | |
| (133) | 和任务》的发表。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 | |
| | 三、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发表 | (176) |
| | 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 | |
| |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 (182) |
| | 第二节 党为坚持团结抗战，粉碎国民党反共 | |
| (140) | 投降逆流的斗争。毛主席《新民主主义 | |
| | 义论》的发表 | (187) |
| (144) |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击退 | |
| |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 (187) |
| |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击退 | |
| |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 |
| (149) | 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 (191) |
| | 三、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 | |
| (153) |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 | (199) |
| | 毛主席发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 | 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敌后 | |
| (158) | 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 |
| | 四、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 (205) |
| | 第三节 党为坚持抗战、巩固解放区的斗争。毛主席 | |
| | 《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的发表 | (210) |
| | 一、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到来和党关于 | |
| | 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 | (210) |
| | 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到来。 | |
| | 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 | |
| (167) | 二、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改造 | |

| | |
|-------|--|
| | 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献的发表……………(214) |
| (378) | 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毛主席 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 三、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228) |
| (383) | 毛主席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 和政策。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
| | 四、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 猖狂进攻的英勇斗争……………(232) |
| (387) | 第四节 党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发表……………(235) |
| | 一、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国民党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235) |
| (378) | 解放区的恢复、扩大和局部反攻。国民党第三 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 策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 |
| (378) | 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发表……………(242) |
| | 三、解放区军民大反攻,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47) |
| |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253) |
| (378) |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十月)……………(253) |
| | 第一节 党为粉碎美蒋“和平”阴谋和反对刘少奇 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抗日战争 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253) |
| (383) |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形势。毛主席 |

- (251)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论针》的发表……(253)
- 毛主席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毛主席《抗
 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 (252) 二、党为粉碎美蒋“和平”阴谋和
 军事进攻的斗争……(262)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
 同美蒋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
- (253) 三、反对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
 路线的斗争。党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267)
- (254) 反对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
 的斗争。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 第二节 党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的斗争。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
 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272)
- 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毛主席
 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72)
- (255) 全面内战的爆发。毛主席论帝国
 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256) 二、毛主席关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
 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解放区军
 民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军事进攻……(277)
- (257) 毛主席关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方针和
 军事原则。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和重点进
 攻的被粉碎。
- (258) 三、蒋介石反动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中……(282)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危机。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第三节 党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毛主席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286)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286)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开展。

二、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290)

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被纠正。

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295)

刘少奇在土改、整党中形“左”实右路线的被纠正。党关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整军运动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

第四节 党为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准备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斗争。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

《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304)

一、伟大的战略决战。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304)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美蒋“和平”阴谋的被粉碎。

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316)

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321)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88)……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90)……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92)……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400)……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402)……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404)……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418)……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伟大的民族。

中国的社会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俄、德、日、意等外国侵略者接踵而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

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手段，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在中国领土上驻兵，开设银行、工矿，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事业、海关和对外贸易，垄断中国的金融财政。它们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其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府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

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决定这种情况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一八四〇年反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使得帝国主义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但是，所有这些革命斗争都失败了。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后坚持了十四年，革命势力发展到十八个省份，并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显示了农民具有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提不出彻底的革命纲领，看不到革命的发展前途，不能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4页。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一次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所窃取，革命遂告失败。辛亥革命失败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参加革命，但是，由于它们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农群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表现了动摇和妥协，因此，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了一条真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①这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肩上。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的。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了某些近代企业，在这些企业中产生了最早的一批中国产业工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开始创办军事工业，以及采矿、炼铁和纺织工业，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8页。

又产生了一批现代产业工人。七十年代，又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仔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逐渐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着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一九年，全国产业工人发展到约二百余万人。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它是新的生产力代表者，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出的优点：（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同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二）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几个大城市和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大企业中。由于他们集中的程度很高，非常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战斗，在革命斗争中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很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出身的，它与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些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早在一八五八年，中国工人就在香港举行过两万多人的反对英、法侵略军强占广州的罢工。一九〇六

年，安源煤矿工人参加了萍、浏、醴起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也曾举行起义。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无产阶级斗争更加不断发展。以罢工斗争为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一三年发生过十一次，一九一七年发展到二十三次，而到一九一八年就增加到三十次。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精神。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没有提出本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本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它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

中国无产阶级要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建立本阶级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①无产阶级随着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有这样一个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而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就为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革命党准备了阶级基础。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人阶级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

^①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05—455页。

专政的国家。伟大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十月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始终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七十多年当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可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还是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③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后，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28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③ 同上，第1359页。

开滦煤矿的工人，了解到十月革命后俄国工人的状况，迫切地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初步传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积极开始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组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并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组织一部分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一八年九月，毛主席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社会调查和传播革命真理。一九一九年三月，毛主席离开北京经上海到长沙，沿途进行考察，并向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革命青年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在此期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烈歌颂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刊物，一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宣传新思想的进步团体也开始出现。

【五四运动】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下，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辛亥革命失败后，卖国头子袁世凯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府，他为了复辟帝制，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然承认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的卖国复辟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公开分裂。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军阀，依

靠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把持北京中央政府；以曹錕、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军阀，则以英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皖系军阀相对抗；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盘踞在东北三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此外，其他各省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各派军阀，连年混战，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一九一九年春，战胜国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召开所谓“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强盗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以“战胜国”资格也派代表出席，并在中国人民督促下向大会提出要求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利等。但是会议在美、英、法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拒绝了中国人民的这些正义要求，并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当时中国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宰割中国的条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为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在天安门前集合，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陆宗輿（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反动政府对爱国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当场逮捕学生三十多人，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坚持斗争，全国学生纷纷响应，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六月三日，北京学生为反抗军警镇压，举行集会讲演，反动政府在帝国主

义唆使下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学生一千余人，妄图把人民的革命怒火扑灭。在这严重的时刻，中国无产阶级挺身而出，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到斗争第一线，使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六三”以后，工人阶级成了爱国运动的主力。六月五日，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斗争。接着唐山、长辛店、天津、长沙、武汉等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斗争。在无产阶级参加和带领下，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工商界也先后举行了罢市斗争。这样，运动就突破了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形成了一个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高潮。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威胁着军阀政府的统治。天津总商会在一份向北京政府告急的电报中说，天津几十万工人“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当时沪宁、沪杭铁路交通中断，长江轮船停驶。面对着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撤职，并宣告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次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不但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斗争的锋芒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和孔学。当年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等文，猛烈地抨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

度，尖锐地揭露了孔孟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政治思想基础，大大破除了人们对“孔家店”的迷信，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扫清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思想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除了原有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外，在湖南，毛主席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天津，周恩来同志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在武汉，恽代英同志组织了互助社，出版了《互助》。同时在成都、杭州、广州、开封等地，也出现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团体和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半年时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百多种。一九二〇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已在中国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决心到革命群众中进行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因为“五四运动是在当

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①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②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在“六三”以后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阶级。这样“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③

【毛主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活动】代表着五四运动正确方向的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人，诞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少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劳动，建立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从青年时期起，毛主席就积极寻找革命真理，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参加实际斗争。一九一七年夏，步行千里，历时一个多月，到湘中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宣传革命真理，同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长沙创办工人夜校，亲自讲课，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在领导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毛主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代表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组织和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发动了长沙学生总罢课，并组织长沙等地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斗争的浪潮迅速向

^{①②③}《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全省扩展，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毛主席在发动和组织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活动。

一九一九年七月，毛主席在长沙创办的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上，毛主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毛主席在这些文章中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罪恶，热情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在这个世界革命潮流中，中国革命运动席卷全国，锐不可挡。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同时，毛主席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认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毛主席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的人，立即仿效俄国，联合起来闹革命。毛主席坚信：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将胜利，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上多次发表批孔文章，向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猛烈开火，愤怒痛斥孔丘和儒家思想是思想界的强权，它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不可不竭力打破。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孔老二独霸中国。毛主席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代表了批孔斗争的正确方向和路线。毛主席这些光辉思想，对当时湖南和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北京、成都、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都转载

或推荐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主席主办的《湘江评论》，对于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为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更大发展，毛主席率领要求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毛主席一面积极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一面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此后，毛主席就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进行更加艰巨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严重的斗争。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①

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端仇视和恐惧，它们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洪水猛兽”，竭力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一九一九年七月，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胡适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文章，以反动的实用主义为武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进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庸俗进化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疯狂鼓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一点一滴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地主买办阶级代表梁启超、张东荪之流，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主义，散布中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宣扬中国的出路应该是发展资本主义和普及教育，“通过劳资协调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改良主义谬论。与此同时，还出现一股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鼓吹所谓“绝对自由”，否认一切权力，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胡适、梁启超之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猖狂进攻，给以坚决反击。毛主席明确指出，改良主义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要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改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作指导，才能成功。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就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谓“教育救国论”是骗人的鬼话。毛主席还尖锐地指出，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统统不成办法，根本行不通。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俄国式的方法，即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实现共产主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揭穿了他们的反动本质，从理论上驳斥了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污蔑，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更加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毛主席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大论战的典范。

三、毛主席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日益发展，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也就日益迫切。从一九二〇年夏天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积极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毛主席集中主要精力，投入建党活动。

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首先必须进行思想上的战斗。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指引下，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激烈斗争中创建起来。当时，陈独秀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求以“英美做榜样”实行资产阶级的“民治主义”；他宣扬阶级调和，提出“协作社会”，搞劳资协作来解决中国社会矛盾；他提倡应使“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把党办成一个知识分子自由结合的、不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因此，要不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就成为当时斗争的中心。

关于建立一个怎样的党，按照什么原则来建党的问题，毛主席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进行激烈的斗争中，阐明了建党原则。从一九二〇年夏到一九二一年初，毛主席曾多次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引导广大会员批判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

潮，以便把党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毛主席在给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深入地讨论了建党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原则。毛主席等认为，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首先要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的无产阶级政党，即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毛主席还深刻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出这个党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主张必须是高度集中的又有民主的组织，并且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总之，毛主席等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代表了建党的正确方向。

毛主席为在中国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一九二〇年八月，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在全省设立七个分社，同时和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全国各地革命团体、出版机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量销售进步书刊，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同时，毛主席以新民学会的左翼为骨干，在长沙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领导进步青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组织会员赴俄作实地考察。九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并引导会员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组织会员到工矿、农村作社会调查。毛主席还亲自到长沙铁路工人、泥木工人及其他工人中创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一九二〇年秋，毛主席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建立了党的预备队伍——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这期间，上海、北京、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以及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都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更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至此，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湖北、山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十二人，代表七十名党员，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等同志。在大会进行中，由于帝国主义巡捕的搜查，后来迁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曾积极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大会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

大会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时，曾经出现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不赞成建立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建立一个只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搞合法主义的

斗争。一种是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脱离广大群众狭隘的小团体“左”倾关门主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反对了这两种错误观点，从而保证了党按照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

大会制定了党章，通过了关于党的实际工作计划的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中国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次大会选举了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五四运动后，他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陈独秀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当时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名声和党初创时期的幼稚，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毛主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②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党迫切需要制定出自己的明确、具体的革命纲领，进一步向全国人民提出党的政治主张和当前的革命任务。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3页。

②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页。

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的制定，列宁和共产国际给了重要帮助。一九二〇年七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列宁深刻地指出：第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第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第三，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又明确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一九二二年七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三名党员。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宣布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党在当前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大会发表了宣言，修改了党章，改选了党的中央机关。但是大会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没有明确解决武装斗争和农民土地问题。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功绩是巨大的，它在全国人民面

前，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成为动员、组织和鼓舞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战斗旗帜。

四、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和安源路矿大罢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集中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党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各地建立了领导工人斗争的各种组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全国罢工达一百多次，参加的人数达三十万以上。

这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了罢工，至三月初发展成为有十万多人参加的香港全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对于罢工，采取了阴谋破坏与血腥镇压，但都遭到了香港罢工工人的坚决回击。为了使斗争得到胜利，党号召和组织全国工人支援这次罢工。全国各地工人为声援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为粉碎英帝国主义对香港工人罢工的镇压，进行了募捐。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已经开始联合起来。由于香港工人的斗争和全国工人的支援，罢工斗争一直坚持了八个星期，经过激烈

的流血斗争，终于迫使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承认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资、恢复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家属，取得了罢工斗争的巨大胜利。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指示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同年八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了“劳动立法大纲”，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并在工人中进行深入宣传，号召全国工人进行劳动立法运动。

随着劳动立法运动的兴起，工人运动更加高涨，先后爆发了汉阳铁厂工人罢工、上海四十家丝厂工人联合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一九二二年二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形成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在这一时期，毛主席以主要精力领导了工人运动。党的“一大”后，毛主席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包括江西的安源）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形成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并亲自组织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派遣党的优秀干部到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等地的各种重要产业和手工业企业中开展工人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党胜利地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水口山铅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包括泥木工人、人力车工人、理发工人等）大罢工等十多次罢工斗争。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组织了湖

南工团联合会，毛主席担任总干事。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全省各地成立工会十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五万多人。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官办资本企业，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有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在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压迫下，工人们的生活极为悲惨，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就是当年路矿工人悲愤的血泪控诉。

为了点燃安源工人运动的革命烈火，一九二一年秋，毛主席第一次来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和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亲自播下了革命火种。工人们满怀革命激情热情歌颂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芝，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成团。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一九二二年一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安源办起了第一所工人夜校，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五月成立了以“保护工人利益，解除工人的痛苦与压迫”为宗旨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工人组织起来开始了自觉的

革命斗争。资本家为了扑灭斗争烈火，采取威胁手段，扣发工人工资，并阴谋解散工人俱乐部，这就更激发了工人的斗志，大罢工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当安源工人盼望党给他们指方向、定决策的关键时刻，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毛主席又一次来到安源，亲自召开了安源党组织会议，调查工人斗争情况，精辟地分析了革命形势，作出了举行大罢工的英明决定。毛主席号召安源工人团结一致，向资本家和军阀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指示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领群众奋勇前进。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多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战斗口号下，举行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但是，大工贼刘少奇在罢工前夕窜到了安源。他一到安源，咒骂大罢工是“铤而走险”，反对大罢工；罢工爆发后，他又提出“文明罢工”，要工人“比平时更加文明”，“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压制大罢工；当安源工人向反动派展开激烈搏斗时，刘少奇妄图出卖工人利益和矿局资本家乞求所谓“和平谈判”，并向反动军阀保证维护地方“秩序”和矿山锅炉房、发电机等要害部门的“安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安源工人挫败大工贼投降叛卖阴谋，他们英勇顽强，坚持斗争。九月十七日，工人们冲破了敌人的守卫，进占了电机房和锅炉房等要害部门，准备炸毁锅炉，迫使路矿当局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和安源工人斗争胜利的鼓舞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这一正义要求却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吴佩孚的

无理干涉和反对，因而激起广大工人的愤怒，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月四日，罢工开始后三小时，京汉铁路全线车辆一律停止了行驶。二月七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染遍了工人的鲜血，计四十多工人惨死，数百人受伤，几十人被捕，一千多人被开除。优秀共产党员、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亦先后惨遭杀害。林祥谦同志被敌人绑在电线杆上，敌人向他连砍数刀，强迫他下令复工，他鲜血溅地，巍然不动，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开！”大义凛然，慷慨就义，表现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一切反动派英勇斗争的革命英雄气概。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受到很大破坏和摧残，至此，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极大地锻炼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因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革命的实践使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工人阶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必须联合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胜利。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二七”惨案后，党采取了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毛主席一贯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一九二三年四月，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要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党必须联合国民党及其它民主力量结成革命联盟。一九二三年夏天以后，毛主席就集中力量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

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政治联盟。辛亥革命以后，其中一部分人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相妥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则继续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进行革命活动。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提不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找不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因此，多次斗争都陷于失败。“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①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表示接受我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九月，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了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并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政纲的机构。

为了正式讨论并决定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二三年七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毛主席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围绕着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做为助手参加，因此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放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领导权的右倾倾向，实质上就是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者，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因此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改造国民党。这是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否认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都是有损于敌人不利于人民的，因而受到了大会的批判。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大会上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严厉驳斥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论调，强调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单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全国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职员以及各种被压迫的人民，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革命才能成功。并正确地估计了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可以实行合作，但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后担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

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的问题，是革命人民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谈到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略时指出：“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对于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反帝反封建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党缺乏经验，以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大会对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作出明确决定，对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也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节 党为争取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斗争。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全党加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和我党的一些干部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少数人所专有；民生主义确定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最重要的原则，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①但是，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仍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新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共产主义最终目的的不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新三民主义则没有；第三、宇宙观的根本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第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即没有革命彻底性。共产党人绝对不能把这两者混同起来，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1页。

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这样改组后的国民党，实际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统一战线的建立，迅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统一战线的建立，为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二四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在广东建立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并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到军校学习，成为军校的骨干。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成为当时建立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为我党公开地组织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二四年七月，党领导广州沙面数千工人，进行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所谓“新警律”的罢工斗争。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推动国民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工人成立了工团军。沙面罢工是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征兆。此后，上海、武汉、北京、唐山、沈阳等地，也都相继爆发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又日益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全国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早在一九二三年毛主席派了一批工人党员到湖南衡山、岳北一带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工会，拥有会员十万以上。一九二四年底，毛主席从上海回到湖南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

二月，在毛主席的直接教育和组织下，韶山地区创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并在二十多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同年六月，毛主席亲自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领导广大农民向地主进行了阻止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在这期间，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陆丰、潮汕等地的农民运动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九二四年，农会会员增加到二十余万，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五十人。大会着重讨论了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为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准备的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将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得到胜利。”还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主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次大会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但大会对农民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仍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党的“四大”以后，全国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迅速发

展。“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旬，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五月十五日，当工人代表和厂方交涉时，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愤慨，纷纷起来援助工人斗争。五月卅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进行宣传，声援工人，要求收回租界，随后群众万余人集合在英租界捕房门口，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又开枪屠杀群众，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晚，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统一战线，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六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二十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五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胜利地实现了“三罢”。六月七日，在总工会号召下，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通过了要求惩凶、赔偿、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等十七条交涉条件，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的革命精神。美、英、日、法、意等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出动了大批军队肆意屠杀群众，并调集军舰二十余艘在黄浦江上进行恫吓。但是，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并不能将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镇压下去。上海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帝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政策遭到挫败后，便采取分裂反帝

统一战线的阴谋，破坏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们勾结上海大买办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一面进行利诱、分化，一面加以威胁。在帝国主义的利诱、威胁下，民族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买办资产阶级乘机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改为十三条，删去反帝的主要条款，并以单独开市等压迫工人复工，破坏“三罢”斗争。同时，帝国主义又勾结封建军阀，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工人已得的胜利，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

五卅运动充分证明了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同时，也充分表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五卅运动后，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长沙等许多城市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从上海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反帝风暴。其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广州和香港工人举行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

香港十余万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于六月十九日举行了罢工，罢工工人纷纷回到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和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以及学生、农民、黄埔学生军等各界约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路过沙基路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当场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了香港、广州群众的愤怒。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反帝斗争的统一领导，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

会，共产党员苏兆征、邓中夏为正副主席。当时，参加罢工工人达二十五万，并组成了有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坚决抵制英货、日货和封锁香港海口，香港的轮船、火车、电车、汽车和工厂的机器，绝大部分停止开动，商店歇业，物价大涨，满街都是垃圾，使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大罢工，在广东区委陈延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开始，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才于一九二六年十月胜利结束，这不仅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运史上也是罕见的。

【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五卅”反帝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毛主席以极大精力从事了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初，毛主席负责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全国农民斗争。为了培养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三月，在广州亲自主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二十一个省，共三百多人。毛主席极其重视对学员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极其重视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本领。毛主席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经常组织学员深入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研究各省农民运动，并把军事课程列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体现了武装农民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当时在农讲所担任教员的还有周恩来、彭湃、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为全国各省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学员毕业后，回到全国各地，大大加强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毛主

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一九二六年六月，全国农民协会就遍及十二个省，乡以上的农民协会有五千三百五十三个，会员人数达九十八万一千人。

工农运动的高涨，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我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以期清除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势力。由于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军的英勇作战和海陆丰农民的支援，打垮了军阀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潮汕。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粉碎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我党的倡议下，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三年三月成立）进行了改组，成立国民政府。并将所辖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提高了这些军队的革命精神。同年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农民协会的帮助下，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收复了东江。同年冬，国民革命军还举行了南征，击溃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邓本殷军阀势力。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和统一，为北伐出师准备了条件。

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由于统一战线中各个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利益，特别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处心积虑

地要篡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扭转革命方向。因此，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着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的右派更加猖狂起来。十一月，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破坏统一战线，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也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蒋介石原是上海的大流氓和交易所经纪人，是一个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他伪装革命，骗取孙中山的信任，窃据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夺了一部分军权。以后，他继续高唱革命词句，假充“左派”，而在暗中则网罗党羽，扩充实力，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五年秋，蒋介石指使其走狗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大肆贩卖孔孟之道，胡说三民主义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反对唯物史观，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仁爱是人类共性”，可以“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其“尊重”工农利益，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妄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戴季陶抛出这些反动理论的目的，就是妄图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控制、打击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的工

具，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蒋介石新右派集团还在广州、上海等地建立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为反革命政变作组织上的准备。

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广州亲自主编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针对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反共反人民的叫嚣，毛主席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毛主席在《政治周报》上组织文章，针对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给以致命的打击。有力地批判了戴季陶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指出：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出发点完全不同，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为了发财，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工农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为了得到自己阶级的解放。还指出，在中国工农阶级已形成一个社会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还梦想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文章进一步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正是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一样，都是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性。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以至把他们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团结了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毛主席、周恩来等同志主张把国民党中央的右派完全清除出去，改造国民

党中央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中央。由于毛主席、周恩来等同志的坚决斗争，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大会上占了优势。大会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斥责国民党右派的决议，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并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动主张。但是，由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的退让政策，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密谋策划，把一批右派分子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扩大右派势力，并把蒋介石等一些右派分子选进了中央，使他们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职务。从此，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加嚣张起来。

蒋介石根据中国历代反动统治的经验，深知掌握军权的重要，为了篡夺军权，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调派中山舰到黄埔港候用。中山舰奉命到黄埔后，他们立即散布谣言，诬蔑我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三月二十日晨，蒋介石下令逮捕中山舰舰长，并宣布戒严，武装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强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从而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

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夺权的信号。事件发生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坚决主张进行反击，以巩固我党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当时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大，在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蒋介石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一个军，其余各军都和他有矛

盾；我党在一部分军队中有相当好的工作基础，有党直接掌握的广东警卫团；有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广大农民和农民自卫军。依靠这些力量，采取正确的政策，完全可以挫败蒋介石。但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继续采取了投降主义方针，胡说这个事件是我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他甚至在《向导》上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无耻地为蒋介石掩盖罪责，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谁“倒蒋”就是反革命。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向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并要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全部名单等等。这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反革命提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要坚决反击，但陈独秀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胡说“既然要联合，就应当自己退让”，并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投降主义方针。他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胡说《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他党无权赞否！”并表示“欣然接受”，下令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结果，许多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代替共产党员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也乘机窃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军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等重要职位，篡夺了党、政、军大权，为其以后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作了准备。

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实行投降主义政策，这是同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抛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借口中国产业落后，诬蔑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则“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公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公式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陈独秀妄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能从胜利中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二次革命论”。反动的“二次革命论”，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一味妥协退让，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一姓一党的私利。

当时党内还有一种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只注意工人运动，而忘记了农民，污蔑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因而，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这同样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忘记了农民，都

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又不知到何处去取得广大同盟者，因而都否认或者实际否认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作用。

三、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紧急关头，毛主席为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指引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主席首先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和革命成败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因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要分清敌友，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因为“**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国民党右派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毛主席这一科学分析，清楚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同时也彻底揭露了陈独秀认敌为友，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面目。

针对资产阶级篡夺革命领导权和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重情况，毛主席着重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而决不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明确指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毛主席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从中国无产阶级的本质和特点的分析中，着重阐明了实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毛主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主席进一步列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产阶级在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无比顽强的革命精神，论证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彻底批判了陈独秀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反动谬论和叛徒立场，击中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要害。

无产阶级要实现对中国的领导，必须有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毛主席指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绝大多数是贫农。“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毛主席的英明分析，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伟大的力量源泉，找到了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从根本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

级革命领导权的关键问题，奠定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基础，在这里，毛主席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各种反动谬论。

毛主席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根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据中国社会特点，创造性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使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恰好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已经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揭露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尖锐斗争，预见到他们叛变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同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的反动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为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孔老二的

忠实信徒，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之流妄图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反动叫嚣。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反动的“二次革命论”，毛主席针对这些谬论，明确指出：“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主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光辉的结论，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

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这篇著作是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猖狂进攻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给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这篇著作，是我党成立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篇伟大文献。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节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摆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北伐战争，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当时全国主要有三支军阀：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盘据在湖南及沿京汉铁路的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拥有军队二十万人；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各省与津浦铁路北段，以及京津一带，拥有军队三十五万人；一是原为直系军阀后来独立成一派的军阀

孙传芳，占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拥有军队二十万人。这些军阀代表着不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当着革命力量还未壮大时，他们争夺地盘。北伐战争即将开始时，他们联合起来对付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举行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并“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从广东开始了。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革命阶级巩固统一战线，积极参加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但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对北伐战争完全持消极态度，他以北伐条件“尚未成熟”为借口，放弃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甚至说共产党员直接掌握军队就会变成“军阀”。结果，还在北伐战争前夕，蒋介石就趁机窃取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并在总司令的名义下，控制了军事、民政、财政等各项大权。阴谋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伺机绞杀革命。因此，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就已经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军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内部矛盾的状况，采取了集

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消灭吴佩孚的军队；同时，防止敌人从侧背发动攻击，分出两支部队警戒江西、福建的敌人。然后集中力量，出兵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再消灭张作霖。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北伐分三路进军：

第一路攻入湖南，直取武昌，以消灭吴佩孚势力为目标，这是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这一路有北伐军的第四、七、八三个军约五万人，其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战斗力最强，是北伐军中最精锐、最英勇的部队。这一路军七月克长沙，八月下岳州，在工农运动的有力支援下，继而又在粤汉路上的两个军事要隘——汀泗桥、贺胜桥的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击败吴佩孚的主力，打开了北伐胜利的局面。九、十月间占领武汉三镇，夺取了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在这些主要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起了先锋模范作用。由于叶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受到两湖人民热烈称赞，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第二路从广东出发入江西，进攻孙传芳。这一路以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的第二军和第六军，也是北伐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依靠这些部队和工农群众的支援，十月占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并沿江东下，由安庆、芜湖直捣南京。在争夺南昌战役中，作了预备队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军教导师，由于排挤了共产党的工作，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孙传芳军队一接触，就几乎全军覆灭。

第三路向福建浙江方面进军。由于当时孙传芳的主力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兵力空虚，加上敌军内部的分化，没

有经过什么战斗，就于十二月占领了福建、浙江两省。

直系将领冯玉祥在革命形势的影响和我党的帮助下，一九二六年九月，率领他的部队，在绥远省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军，年底占领了陕西全省，并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

北伐战争由于有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加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效的政治工作和发挥骨干模范作用，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奋战之下，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出师北伐以来，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从广东推进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占领了半个中国，迅速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严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见附图一）

工农群众运动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工会组织迅速扩大，湖南，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工会会员由原来的六万人发展到二十二万人。湖北，一九二七年初工会会员增加到三十万。安徽、江西、江苏、上海等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会组织都迅速发展。同时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高潮，仅武汉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工人罢工就达三百余次。并在罢工斗争中普遍组织了武装纠察队，有的地方由罢工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直接配合北伐

作战。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的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先后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则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和第二次起义（一九二七年二月），都因为准备不足和时机不当在军阀孙传芳的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党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组织了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为首的起义领导机构，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在进行了更大规模起义的准备工作后，选择了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的有利时机，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市七个区在一小时内同时行动，以工人武装纠察队为先锋，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进行了猛烈的进攻。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与进抵上海郊区的北伐军联系，请求派兵援助，然而当时的前线总指挥白崇禧，却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让北洋军阀去削弱工人的力量。但是，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在二十二日占领全上海，取得了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在我党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一样猛烈的开展起来。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湖南农民从十月开始，掀

起了一个以夺权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湖南各地农民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成立了自己的政权，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①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展开了强大的夺权斗争。农会成了乡村的唯一权力机构。几千年来受压迫和奴役的农民，依靠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在政治上打击地主，对地主阶级实行革命的专政。过去长期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现在受到农民设立的特别法庭的审问和处罚，罪大恶极的被判处死刑。农民打碎了几千年束缚他们的孔孟之道的枷锁，冲破了宗法社会的罗网，打掉了地主阶级的特权，扫尽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推翻了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农民掌握了权力之后，就广泛地开展减租、减息，直至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等经济斗争，开始改变乡村的宗法制度，恶劣习惯，着手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到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农村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②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全省已有五十四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二百万，农会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余万，约占全省农民的半数以上。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也猛烈开展起来。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运动都在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九百余万。农村革命的暴风骤雨，充分显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形成了第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4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5页。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

二、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在农民问题上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以湖南为中心的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从根本上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在这场旋转乾坤的伟大革命风暴中，各种反动势力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的凶恶面目。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分子、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纷纷联合起来，向农民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一方面大造反革命舆论，污蔑和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是什么“过火了”，“妨碍税收”，“影响北伐”，是“糟得很”；另一方面暗害农会骨干，公开残杀农民，组织假农会，打入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阴谋破坏革命，甚至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叛乱，疯狂地反对农民运动。

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猛烈发展的情况下，也起来反对农民革命，多方阻止无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结合，并以分裂统一战线来恐吓，企图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时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跟在反革命派后面做应声虫，说农民运动“太过分”，是“越轨”、“胡闹”。

形势的发展，已经把农民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不顾资产阶级的阻挠，坚决依靠农民群众去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呢？还是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抛弃农民，使革命归于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潮流所吓倒，屈服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压力，竭力压制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右派，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六年九月，陈独秀炮制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系统地提出了压制农民革命的投降主义纲领。自愿把革命领导权出卖给资产阶级。胡说什么“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导无产阶级，使其它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个决议案中，大肆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不许农民革命。攻击农民运动“过左”，叫嚷“不能放任农民组织的自由行动”，妄图把农民的手脚束缚起来，反对推翻地主的政权和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规定农民协会不要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强调农村问题的解决应取决于旧农会的“调停”，主张建立在地主封建势力控制下的“乡村联合战线”；反对消灭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主张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规定农民若建立武装绝对“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

这个机会主义纲领一出笼，当即受到毛主席的彻底批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先后作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和《革命联合阵线》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要

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斥责了那种诬蔑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的谬论。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通过的决议指出：农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并规定：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民主政权，决不能采取“免除纠纷”的改良主义政策。“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若是害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大会决议案的通过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是对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谬论的有力驳斥。

但是，陈独秀却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到一九二七年初，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从而使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一九二七年初，决定革命成败的农民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摆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驳斥地主资产阶级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并支持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引导全党把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向前进。于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对农民运动作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于三月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

毛主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高度评价农村大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毛主席指

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过去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大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大变动，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因素。毛主席通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透彻分析，论述了党领导的农村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孙中山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主席痛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论调，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运动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纯粹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革命，企图保持封建旧秩序的反革命的理论。所以，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支持和领导农民运动，否则，必然堕入反革命泥坑。这就彻底批判了陈独秀之流对农民运动的污蔑，揭露了他们成为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镇压农民运动帮凶的反革命立场。

毛主席精辟地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针对陈独秀维护地主权力的反动主张，毛主席坚决地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必须用革命暴力

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不把地主政权打倒，“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在农村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因此，这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毛主席指出，为了打倒地主，夺取政权，巩固农民的革命政权，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办法：一方面夺取地主武装加以改造；一方面则以主要精力建立“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农会的梭镖队。针对陈独秀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机会主义政策，毛主席强调指出：“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毛主席深刻的分析了农村中的各阶级，正确规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毛主席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高涨时，他们也可以参加革命，应当多作工作团结他们。只有贫农才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农村中的“革命先锋”。贫农占乡村人口中的百分之七十，地主豪绅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主要地是加在他们身上。贫农中许多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所以“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贫农在革命中的作用，指出：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

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党应当坚决支持贫农的革命行动，依靠他们来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痛斥了那种把贫农污蔑和咒骂为“痞子”、“惰农”的反革命论调，强调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毛主席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

毛主席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热情歌颂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毛主席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和总结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列举了农民协会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首先是组织起来，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封建势力陷于孤立，才能造成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才能从经济上打击地主。从不准地主谷米出境、减租、减息直至解决土地问题。然后推翻封建的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摧毁封建“四权”的斗争，是广大农民直接向“三纲五常”宣战，是从根本上批判孔孟之道。最后，如修道路、修塘坝、办学校和组织合作社运动等等，毛主席热情的支持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热烈赞扬他们的行动好得很。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

毛主席阐明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光辉思想。毛主席指出，在中国要推翻几

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在农村中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发动和组织亿万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陈独秀之流搬出孔老二的主张倒退复辟的中庸之道来反对革命，指责农民运动“过分”，竭力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中，必然会出现“反常”的举动，但是这个“反常”是完全必要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都具有革命的意义。毛主席指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当然，在群众运动中，也会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但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践斗争，不断取得经验，是可以克服和正确解决的。毛主席有力地痛斥了农民运动“过分”的反动叫嚣，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鼓吹孔孟的中庸之道。这就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陈独秀之流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种立场，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毛主席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而一切机会主义者，总是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所谓英雄史观，因此，他们总是同革命群众相对立，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所抛弃。革命者要正确的对待群众运动，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辉文献。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正确路线。它彻底的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思想基础孔孟之道，打击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进攻，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又一次给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总结欧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经验时就指出：无产阶级如果能获得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②毛主席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仅深刻的论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且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重大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9页。

^②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11页。

三、毛主席挽救革命的斗争。陈独秀对革命的可耻叛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加紧干涉和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猛烈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和恐慌。为了扑灭中国革命，帝国主义一面以武力相威胁，甚至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在革命阵营内部寻找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的新工具、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占领了两湖和江西，革命势力向长江下游发展，锋芒指向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上海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大量增兵，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也接踵而来，公开叫嚣要以武装“保卫上海”，企图阻止上海工人起义和北伐军的进军。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晚间，英、美帝国主义下令停泊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轰击，结果死伤二千余人，房屋财产毁坏无数，造成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这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也是帝国主义促使国民党新右派叛变革命的政治阴谋。

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分化中国革命阵营，通过豪绅买办阶级，加紧收买蒋介石，妄图从统一战线内部瓦解革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打下南昌后，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府的政客，纷纷出入于南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策动他公开叛变革命。这时，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连续向革

命发动了猖狂进攻。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六日，解散并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及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此后，又在安庆、福州、重庆等地制造反革命惨案，公开捣毁工会，屠杀工农群众。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上海后，就立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起来，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他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上海，并组织流氓打手准备反革命政变；一面又亲自题了“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送给上海总工会，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以此麻痹群众。蒋介石的反动活动，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奖励，立即送给他一千五百万的屠杀费用，并答应给以武力配合和在反革命得逞后，再给三千万元的巨款，作为建立反动王朝的资本。

但是，在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形势下，陈独秀却顽固地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时，上海八十万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上海人民还召开了市民代表大会，组织了上海的临时革命政府。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有三千人，北伐军中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同情革命。陈独秀不仅不采取措施巩固上海的革命政权，不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工人武装，不去做北伐军中同情革命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反而故意使上海革命政府的工作陷于停顿，不准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更可耻的是，四月五日，陈独秀却同正在上海与蒋介石密谋反共的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辩护，胡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并要我党和工农群众立即抛弃“怀疑”，同蒋介石一伙“开

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党和人民在思想上的武装，实际上帮助了蒋介石实现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独夫民贼蒋介石指使流氓、特务，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遂发生激战，这时，蒋介石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事后，上海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和游行请愿，表示反抗，遭到蒋介石的大屠杀。驻在上海的美、英侵略军也直接出动，帮助蒋介石捕杀革命群众。十三日下午，蒋介石下令取消上海总工会，查封了一切革命团体，大批工人领袖和工人被捕杀。到十五日，仅三天之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从这时起，上海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全上海陷入了血海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均在这时英勇牺牲。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罪恶滔天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又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广州等凡是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也展开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所谓“清党”运动，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从此，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走狗。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叛变后，立即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联合起来，对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实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同时，蒋介石又与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

内的国民党右派汪精卫加紧勾结，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下，武汉革命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革命处于紧急阶段。

但是，蒋介石的叛变仅仅是革命的局部失败，并不能决定革命的全部命运。当时，武汉革命政权还保存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和深入。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主张对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进行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昌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的追悼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烈士的大会上指出，在革命势力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的案件，这证明反动分子正准备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向反动势力进行反攻，以保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这时，毛主席、董必武、恽代英等同志，依靠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等主张。还通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撤掉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蒋运动。武汉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反蒋大会；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湖南省工会印发了揭露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八十条的传单，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江西省四十万有组织的农民通电援助上海工人，强烈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在党的领导和群众反蒋怒潮的推动下，武汉的国民

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反对和声讨蒋介石。这就使隐藏在武汉国民党内的一小撮假左派真右派不敢立即公开叛变，使蒋介石的阴谋暂时在湖南、湖北地区无法实现。

在革命的紧急时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余人。会上，毛主席再次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迅速加强农民的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可是陈独秀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实行家长统治，独断专横，拒绝讨论毛主席的建议，把毛主席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毛主席的表决权。大会经过斗争，虽然通过了斥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决议，但由于当时党还是幼年的党，陈独秀又作了假检讨，还仍然选他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样，“五大”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陈独秀的叛卖活动】党的“五大”以后，陈独秀利用其在党内窃据的地位，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一步助长反革命的气焰。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主席坚决主张镇压，并亲自领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协同叶挺同志率领的部队，进行坚决反击，击溃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又指使驻长沙的三十五师的一个团长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马”字是电报“二十一”的代号），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封闭省工会和农民协会，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这是汪、蒋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伙的信号。事变发生后，许多革命群众从长沙赶到武汉，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指示他们拿起武器，坚决斗

争，武装保卫革命。五月底，湖南十万农民军在郭亮、柳直荀等同志的领导下，高喊“梭标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革命口号，武装包围了长沙。当时被围困在长沙的许克祥叛军只有一个团约一千人左右，即将被全部消灭。可是，陈独秀这时叫嚷农民攻城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下令“农民不得进城武装斗争”，结果，农军被迫撤退。许克祥乘机反扑，二十多天内，长沙附近各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被杀害。

“马日事变”后，反动派的气焰更加嚣张，汪精卫公开发表布告，叫嚣对农民运动要“加以制裁”。随后，又把在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准备大规模镇压革命。六月，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又进一步勾结，经过六月十日的郑州会议和六月十九日的徐州会议，达成了联合反共的协议，蒋、汪合流，“宁汉合作”，准备在“分共”的名义下，对革命全面镇压，革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为了挽救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毛主席利用他当时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条件，连续发表通电和文件，揭露了敌人的罪行，号召各地农民协会团结广大农民，严密组织，加强武装，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挑衅活动。当时蔡和森同志在六月二十五日也写信给中央常委，提出事态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以静候人家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党中央及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当时在我党领导下还有相当力量，叶挺部有一个军（二个师），教导队有三千多人，武汉军校还有一批武装，武汉工人纠察队有五千人，二千枝枪，全国工农运动还

有相当的力量，武装二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群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完全被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气焰吓破了胆，再次拒绝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失去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机会。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又操纵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他起草向国民党右派全面投降的“国共合作十一条”，无耻地承认国民党是“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说什么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可以用“请病假”名义退出政府；要工农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这个决议是陈独秀叛徒集团出卖中国革命的投降书，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时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时，身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忠实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就被捕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六月，汪精卫集团指定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充当特务。他向国民党反动头目陈公博献策，建议：调走武汉工运骨干，使“干群脱节”；遣散工人纠察队，以“防止暴动”。六月二十八日，他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将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都交给了国民党。刘少奇为了掩盖其内奸面目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假意逮捕，次日将刘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指示刘“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刘少奇表示“竭尽全力以赴”，然后释放。在汪精卫实行反革命大屠杀前，指使刘躲往庐

山。这时，刘少奇又向汪精卫集团密告共产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的情况，要汪精卫、陈公博“速除”。刘少奇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内奸、工贼，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精卫反动派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到了后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①“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②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在全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53页。

^②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61页。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一节 毛主席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斗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一、工农红军的创建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状况】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叛变了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代替了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的军事专政——新军阀统治。“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

依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实行卖国政策，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上台后，积极和美、日帝国主义勾结，实行亲美外交路线。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美、英帝国主义赔款、道歉。五月，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杀伤中国军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民万余人，蒋介石竟下令不准抵抗，任凭日军缴械，并无耻声称：“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在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下，帝国主义逐步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由于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的加深，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更加频繁。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大规模战争就有六、七次。如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李宗仁同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同年十二月，两广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闫锡山联合与张作霖争夺华北的战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蒋介石同广西派争夺华中的战争；同年八月，蒋、闫、冯之战；一九三〇年五月蒋、闫、冯第二次战争，等等。三年间战祸遍于大半个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洗劫。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凭借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战胜了他的对手，控制了全国政权。

国民党新军阀反动政权，对内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反动军队和特务组织，加强对人民的血腥镇压。他们把孔孟之道同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鼓吹孔教是什么“立国的纲维”，叫嚷反共反人民“就是行仁”，妄图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的反革命目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工农群众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城市，革命工会被解散，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被逮捕和屠杀。罢工成了“犯罪”行为。大批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工时延长。在农村，大批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遭迫害，农民协

会被解散。地主阶级进行反攻倒算，革命时期的减租减息变为加租加息。苛捐杂税，多方榨取。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农业生产日益萎缩。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毫无民主自由。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濒于破产。跟随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它们在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打击，使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半破产的境地。

由此可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和旧军阀的统治在阶级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比它更为残暴和凶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也是最后一个反动王朝。毛主席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①“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阶级力量重新组合，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高潮转入暂时低潮。蒋介石集团叛变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营垒，附合了大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发生动摇，脱离了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农民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乡，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就有三十余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在反革命的高压

①②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7页。

下，城市工人斗争由进攻转入防御，农村的斗争此起彼伏，处于分散状态。党的组织被打入地下，一些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被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共产党员由五万人减到一万人，工会会员由三百万人减至三万人。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但是，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还会到来，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只不过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这就决定了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党的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特点，找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将革命引向胜利。

【“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党认识到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七月，根据当时形势，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八月一日凌晨，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原北伐军一部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五个小时的激战，歼敌三个师，缴获枪枝万余支，成立了南昌革命委员会。起义军于八月五日撤离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7页。

南昌，经江西会昌、瑞金、福建长汀、上杭进取广东，于九月下旬到达潮州、汕头。十月初，在湯坑、三河坝受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激战数日，终于遭到严重地失败。余下的起义队伍，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同志率领，转战到湖南，坚持革命斗争。

南昌起义是党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唾弃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因此“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日。南昌起义的错误方面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表了告全党党员书，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在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革命斗争的方向，“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①但“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的时候，没有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左”的倾向，以致后来被瞿秋白发展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3页。

立革命政权的正确主张。会上，毛主席被选为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八七”会议后，毛主席回到湖南，代表党中央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并积极准备发动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出席了改组后的第一次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等重要问题。成立了秋收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

九月初，毛主席到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把在湘赣边境由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分别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这些武装力量有：在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安源煤矿起义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接着，毛主席到达革命军第三团驻地江西铜鼓，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志。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打响了秋收起义的枪声。起义部队分三路向敌人进攻：一团从修水出发，向赣南平江方向前进，在取道长寿街时，在金坪与敌激战，部队受了损失；二团从安源出发直取湖南醴陵，由于该团负责人的麻痹轻敌，战斗失利；三团从铜鼓出发，向湖南白沙进军，在地方党组织和广大农民配合下，一举攻克白沙、东门市，敌军狼狈逃窜，我军首战告捷。秋收起义部队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砸开牢门，救出革命同志，打开地主的谷仓分给农民，斗争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宣布没收地主土地，恢复被反动派解散了的工会和农会，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但当时全国形势处于低潮，起义部队在攻打浏阳等战斗中又遭到严重挫折。

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到文家市集中。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合。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必须改变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作法，决定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会师大会上，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明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发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号召。并亲自率领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九月底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立在连上；规定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建立了新的官兵关系；进行了整编，把原来的三个团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湾改编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使工农革命军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组织上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工农革命军，转战千里，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到达井冈山上，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①这是因为井冈山周围地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较大，并有地方群众组织起来的武装；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地处江西湖南之间，便于利用敌人矛盾，革命影响也容易散布出去。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78页。

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湘赣边界后，十分重视边界党的建设，培养发展了一批工农先进分子入党，使边界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对原在井冈山地区的袁文才、王佐等地方军队进行了团结、改造工作；帮助地方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地方武装。进行了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一九二八年二月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击退了向井冈山进犯之敌，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翌年二月，经过井冈山军民的艰苦奋斗，湘赣边界出现了一派大好革命形势。建立了茶陵、遂川、永新三县工农兵政府，重建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县的党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工农革命军由两个营扩大到两个团。土地革命逐步开展起来，从经济上、政治上解放了广大农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二八年五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战斗环境和物质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经常是“红米加南瓜”，“三月不知肉味”。食盐、药品、布匹都十分缺乏。但红军对这种艰苦毫无怨言，官兵平等，团结一致，战斗意志非常坚决。“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①

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军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并在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64页。

的正确道路。向井冈山进军是当时全党最有计划、最有秩序的退却，革命失掉了城市，却在某些地区武装割据了农村，它不仅直接保卫了这个退却的革命力量，而且夺取了新的阵地，革命进攻的方向转移到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农村，为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新的进攻创造了条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因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见附图二）

在这期间，党还在各地领导了武装起义。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太雷、叶剑英等同志领导下，广州市工人、革命士兵爆发了广州起义。起义队伍曾占领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广州公社。经过和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联合围攻的英勇血战，遭到了失败。张太雷同志壮烈牺牲。广州起义的失败表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同时，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横峰、弋阳等地领导了武装起义。彭湃同志在广东海陆丰领导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张鼎丞、邓子恢同志在闽西领导了起义。滕代远、黄公略同志在湖南领导了平江起义。刘志丹同志等在陕西渭南华阴领导了渭华起义。此外，湖北、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四川、广西等地也先后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凡是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地方，武装斗争又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后来各地红军的最初来源，为创建各地的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毛主席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

红军的新时期。”^①

二、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八七”会议后，窃据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职务的瞿秋白，利用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发展起来的革命急性病，推行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一系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瞿秋白主张“无间断的革命”，他说“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障碍”。在这种错误观点指导下，推行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左”的政策。

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瞿秋白把大革命失败后处于暂时低潮的革命形势，看成“不断高涨”，认为工农群众斗争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因而在策略上，他反对革命的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2—513页。

暂时退却，要求盲目的进攻，并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不顾条件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无视中国社会特点和当时革命的形势，坚持“城市中心论”。他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因此，他醉心于城市的工人暴动，命令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唐山六个城市的工人盲目的举行暴动，这就使我们党在城市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的屠刀下，使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瞿秋白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政治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实行惩办主义，排斥与打击不同意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瞿秋白发现毛主席一本有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作，十分恼火，认为“这是犯了大错误”，竟撤销了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瞿秋白还对南昌起义的前委一律给以纪律处分。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坚决抵制和斗争。

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执行瞿秋白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攻击毛主席“太右”“烧杀太少”，不顾毛主席的反对，强令部队分兵攻打湘南，去支援“年关暴动”，造成“三月失败”，致使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为了挽救井冈山根据地，毛主席率领部队又回到井冈山。四月，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的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主席率领的部队会师于宁冈县砦市，五月四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主席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从此，井冈山根据地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

引下，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包括三个整县，四个县各一部分的整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受到了毛主席和许多同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因此，到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条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就基本结束了。但“左”倾盲动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七月中旬，执行“左”倾盲动路线的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攻击毛主席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是“保守主义”。撤换了毛主席边界特委书记的职务。他乘毛主席远在永新之机，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定，不顾当时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时期，硬拉红军去湘南攻打郴州，又招致红军和湘赣边界的八月失败。红军损失一半，各县相继失陷。这时，毛主席亲率红军到桂东县与在湘南失利的红军大队会师，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九月下旬率红军回师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得到恢复。

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后，瞿秋白仍然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对革命表示悲观失望。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从根据地往上海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被捕后他屈膝投降写了叛党自白书《多余的话》，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

【陈独秀取消主义的破产】“八七”会议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一小撮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仍然坚持错误，并且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上，鼓吹取消主义，组织反党集团，变成了“托陈取消派”。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是

残余的残余”，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必须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狂叫无产阶级现时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他竭力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运动，特别是武装斗争，恶毒地污蔑红军是“土匪”，污蔑人民革命战争是“流寇运动”。

党对陈独秀取消主义进行了严肃斗争，但是他拒绝党的挽救，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并且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形成反革命的小组——托陈取消派，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把陈独秀清除出党，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但是，这一伙卑鄙的叛徒，死不悔改，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组织了所谓“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抛出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反动纲领，公然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中央机关，由陈独秀充当“总书记”。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恶毒攻击土地革命战争，重弹取消主义的滥调，竭力反对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后来，托陈取消派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又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接受托洛茨基匪徒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充当汉奸卖国贼，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革命任务和策略方针，以便统一党内思想和发展革命，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发布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十大纲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是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极大的重要性以及其他若干缺点和错误，因而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大会没有解决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问题，毛主席不仅在实践中已经解决，而且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

三、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表明毛主席已经在实践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和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中发展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醉心于中心城市的起义，反对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在根据地内部，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悲观主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所吓倒，对革命丧失信心，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认为距离革命高潮尚远，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鼓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谬论，妄图以“流动游击”方式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多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反对毛主席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①，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②

为了驳斥“左”倾盲动主义的“城市中心论”和林彪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坚持和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主席于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一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

毛主席根据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井冈山斗争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只能走“在乡村集聚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呢？毛主席作了深刻地论述。

①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4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2页。

第一，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遍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①因此，中国革命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②

第二，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的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坚持奋斗下去，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避免在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③因此，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④

第三，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民占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76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78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8页。

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5页。

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因此，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为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行土地革命。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民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为主要阵地，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主席不但深刻地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而且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有极大的不平衡性。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首先能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突破；由于地方农业经济占优势，中国的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相对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了物质条件；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就形成了许多地方势力和大大小小的军阀，“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①必然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削弱反革命力量，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2页。

这就在客观上给红色政权的存在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二，中国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许多地区都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曾经有过广大的工会、农会组织和高涨的革命群众斗争，这就为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这些地区首先建立和发展起来。

第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并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而日益发展和激化。毛主席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①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现在虽小，但“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②

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红色区域只有地方武装而没有正式红军就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发展的主观上最重要的条件。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军阀统治的状况和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如在对敌斗争中必须分清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还是军阀之间破裂的时候；分清是强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8页。

^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6页。①

敌还是弱敌。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要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可以采取比较急进的政策，但仍是**有步骤有阵地**的前进。对强敌要采取守势，对弱敌则要采取攻势，但始终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经验表明，没有对敌斗争的正确政策，要想战胜优势敌人的“围剿”，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上述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前三者是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后二者是主观条件。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第五条，有了这些客观根据和主观条件，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就是无疑的了。

总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紧密结合的观念，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红色政权的观念”。也就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①，即“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②的道路。因此，“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③

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有力地批判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悲观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红色政权存在的怀疑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5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317页。

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5页。①

和污蔑。它们都不能认识“红色政权”道路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的意义。他们或者妄想以城市为中心爆发起义，迅速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或者妄想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这些错误主张都是和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主席针对他们主观主义的不切当地估量形势时深刻指出，判断中国政治形势所需要掌握的科学分析方法：“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所谓抓住实质就是抓住矛盾进行分析。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揭示了“星星之火”必然发展成为燎原之火的客观规律，从而揭露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源。

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规律，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和俄国社会的具体状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6页。

况，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结论，成功地举行了城市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开辟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出发，坚持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则，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加深了中国社会矛盾。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从而开辟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它给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第二节 党为巩固发展工农红军、 革命根据地和反对李立三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 斗争

一、古田会议，毛主席《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发表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一九二八年冬，

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决定以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亲自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毛主席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起草了红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通俗地说明党的政策。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在瑞金北面大柏地，歼灭了尾追之敌，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并乘胜攻占了宁都、兴国、瑞金、雩都等地。二月下旬，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队伍会合，初步打开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接着，红四军从三月至十月间，三次进军闽西，在邓子恢、张鼎丞率领的闽西革命武装的配合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经过几次战斗，消灭了闽西地区的反动军阀武装，先后攻克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分别在赣南成立了江西工农民主政府和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为后来中央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古田会议，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发表】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红军得到迅速发展。这时，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在根据地，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红军也是以农民为主体，红军有一部分还来自旧军队，并处于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在党和红军内部，经常反映出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彻底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把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础上，就成了摆在党的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任务。围绕着这个问题，在红四军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毛主席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党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曾指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①毛主席还明确规定了红军必须负担起打仗、筹款（后改为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订了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但是，红四军党内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同志，极力鼓吹单纯军事观点，与毛主席的正确建军思想相对抗。他们反对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提出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反对建设根据地和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提出“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主张红军的任务只限于单纯打仗一项；反对党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和组织纪律，实行军阀主义统治等等。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影响下，红四军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等，有了严重的发展。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一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度占上风，排挤了毛主席对红四军的领导，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使红四军两次分兵冒进闽中和粤东，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毛主席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以极大的耐心帮助和教育犯错误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76页。

的同志，有些犯错误的同志在实践中也逐渐有所转变。在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战士，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在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毛主席重新回到红四军，继续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为了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贯彻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毛主席深入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路线斗争觉悟，团结了犯错误的同志。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光辉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系统地总结了我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制定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路线。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必须首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在“工农武装割据”情况下的农村环境中，建设一个“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艰巨性和严重意义。指明：“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而毛主席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只有首先从思想

上政治上建党才能保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决议》指出，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就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要教育党员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并“**彻底地加以肃清**”。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避免由于主观唯心主义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对工作的指导而产生“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同时，必须重视从组织上建党。党的正确路线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贯彻执行的。所以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增强党的观念。组织上建党的根本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等来自“左”的或右的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倾向；党员必须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党员必须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决议》要求党员懂得开展批评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巩固和团结，使党的各级组织成为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战斗堡垒。

在人民军队的建设方面，毛主席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阐明了我军的性质、任务和建军原则。毛主席从战

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工具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因此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统帅军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它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先决条件，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所谓“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从这个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出发，毛主席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深刻地批判了不愿意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流寇思想。

从这个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出发，毛主席还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等项原则，有力地批判了军阀主义。

古田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解决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最重要问题，即如何建党建军问题。毛主席为这次会议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文献。它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界限，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

西 列宁曾经指出：“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①毛主席在我党我军中工人不占主要成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条件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对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不懈的斗争，保证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正确路线的贯彻。从而使我党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使我军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保证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和军队建设学说的重大发展和伟大贡献。

二、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党的土地革命路线

【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开始，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十三个军约十万人，战斗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浙江等十多个省的三百多个县，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见附图三）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25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毛主席率领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以后，这个地区的地方武装相继发展为红三军（赣南）和红十二军（闽西）。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主席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指挥。以后，赣南、闽西联成一片，是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八月，红一军团与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团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毛主席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

湘赣根据地：当湘赣边区经过“八月失败”得到重新恢复的时候，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主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由于彭德怀的逃跑主义，井冈山曾一度被敌人占领。一九二九年六月，红五军奉命转回井冈山，恢复了湘赣边区。一九三〇年当地武装发展为红八军。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一部分，转入湘鄂赣边境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二九年十月，湘赣红五军主力返回与他们会合，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地武装发展为红十六军。一九三〇年六月，红五军、红十六军和湘赣的红八军合编为红军第三军团。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一带农民起义后，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夏，赣东北红军与一九二八年底崇安起义后建立的闽北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军，根据地发展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湖北黄安、麻城一带的革命武装转移到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初，建立了鄂东北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河南商城、

安徽六安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建立了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三月，三个地区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以后扩编为红四军团，徐向前任总指挥。

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返回湘西活动，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红军第二军，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段德昌等在洪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组成红军第六军，开辟了洪湖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七月，红二军和红六军会师公安，组成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委。洪湖、湘鄂西两根据地联成一片。

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和农民武装，在广西百色、恩隆等地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江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二月，党影响下的驻左江的一部分军队也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建立了左江根据地。

此外，在陕北地区、海南岛等地都坚持了武装斗争，开辟了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

旧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是极不合理的，根据毛主席的调查，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是：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在江西省遂川的土地集中情况十分严重，约百分之八十为地主占有。但在农村人口中，地主只占百分之五，而农民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土

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这是一场极其深刻、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毛主席做了大量地调查研究工作，不断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及时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湘赣边区政府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明确提出了“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的政策，纠正了某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的打击中小工商业者的错误政策。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在开辟赣南根据地的过程中，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六月，在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中又把土地所有权为政府所有的做法改为“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主席还纠正了某些地方按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多少分配土地的右的错误，提出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原则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

一九三〇年，毛主席在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是党在农村中一条坚定的阶级路线，它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中

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成为党领导农村的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根据地内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经过翻天覆地的伟大土地革命斗争，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从政治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加红军。他们组织起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组等互助合作组织，开办了信用合作社等等，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掀起了参军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潮。仅兴国县，一九三〇年就有三千人参加红军。其他如长汀、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翻身农民也都建立了地方武装独立团，在保卫红色政权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①

三、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到一九三〇年，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土地革命不断深入；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全国党员已有十多万人，参加革命工会的会员已达十一万余人。从一九二九年底开始，资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4页。

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地经济危机。一九三〇年五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闫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国民党军阀的混战，削弱了中外反动派的力量，减轻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恰当地利用这种有利形势，是能够推动革命得到更大地发展的。但是，在有利革命形势下，党内“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滋长，六大以后在党中央掌握着实权的李立三神气起来。他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散布了一系列的“左”倾观点。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李立三的操纵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

李立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从主观唯心论的阶级估量出发，片面地夸大了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的一面，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否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幻想革命马上胜利。他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当时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李立三也不懂得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

李立三抹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反对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攻击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叫喊什么“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这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幻想把两个阶段的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规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李立三反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他污蔑毛主席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李立三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他无视敌人统治势力的强大，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的极“左”口号，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大连等城市举行总罢工起义。同时又不顾红军力量的弱小，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口号。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地，要求实现“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①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李立三还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措施，将城市的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成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取消了党的领导，使这些组织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李立三为了推行他的错误路线，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实行“一言堂”，拒绝党内正确批评和建议。对不同意见的同志，随意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进行排斥打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

李立三路线推行不久，就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中心城市的暴动都失败了，地下党组织和其他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9页。

革命群众组织遭到残酷摧残，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如恽代英同志等因而牺牲，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屠杀，仅仅上海一地地下党员就由两千人减少到六百人。进攻中心城市的红军损失也很大。如二军团攻打武汉部队损失五分之四，并丢掉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从广西出发，孤军冒进，北上攻城，致使六千人缩减到二千多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十军攻九江，结果由两万人缩减到三千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潮流精神，坚持了正确路线，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始终进行着坚决斗争。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毛主席创造性地论述了调查研究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基本工作，强调指明：“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从认识论上揭露了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思想根源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同时告誡全党：“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这就为反对李立三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在实际工作中毛主席坚决抵制了李立三关于攻打南昌的命令，率领红一军团到赣西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扩充红军。这时顽固推行立三路线的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曾一度盲目攻入长沙又被迫退出。八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毛主席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李立三不顾敌我力量对比又命令一方面军攻长沙。毛主席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说

服了中央代表和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及时地纠正了这个错误决定，率领红军挥师南下，连克吉安等十几个县城。一九三〇年十月，毛主席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召开了总前敌委员会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坚持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确定了诱敌深入，伺机战胜和消灭来犯之敌的战略方针，宣告了立三路线在红一方面军的彻底破产。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不但使红军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利用军阀混战和赣西敌人力量薄弱的时机，又开辟了赣西南和湘东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力量。

由于毛主席的坚决斗争和立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激起广大党员和干部强烈不满，一九三〇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他的冒险主义计划的执行，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基本上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但六届三中全会表现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和妥协精神，认为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后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指出了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李立三离开中央后，长期留住苏联，一九四六年回国。解放后又一再犯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长期地对他进行耐心教育和挽救，但李立三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党和人民。

四、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结束不久，党又粉碎了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反党活动。

罗章龙原是党的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全

总主席，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老右倾机会主义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追随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为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所吓倒，长期消沉，不敢革命。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时，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宗派集团又极力篡夺党的领导权。在这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极其复杂的形势下，罗章龙及其一伙跳了出来，从极右的方面向党疯狂进攻，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借口，妄图达到反党篡权的目的。他们在政治上同叛徒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相呼应；在组织上另立中央，分裂党。一九三一年罗章龙一伙炮制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的主要罪行如下：

第一，反对“六大”路线，为托陈取消派翻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毛主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①，虽然有若干缺点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②但是，罗章龙站在极右的反动立场上，污蔑“中央六次大会的路线就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把全国革命形势看作一团漆黑，同托陈取消派唱一个调子，胡说“革命高潮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胜利”，“党是向崩溃道路发展下去”。他们公然叫嚷，“那些反对‘六大’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彭述之……都应该回到党和党的领导机关”，还说：“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领

①②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893页。

导，中共中央应当整个解散和开除出党”，为托陈取消派扬幡招魂，彻底暴露了罗章龙是地地道道的托陈取消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第二，污蔑工农红军，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罗章龙把同国民党浴血奋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咒骂为“流寇土匪”，叫嚷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前途”，主张党的任务已经不是巩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的经济斗争”。

第三，另立中央，制造分裂，反党篡权。一九三一年一月罗章龙一伙，公开抛出了他们的反党纲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攻击中央，叫嚣“中央的威信已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以此为借口要“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按照他们自己安排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根本改造政治局”，阴谋夺取党中央领导权。这一阴谋失败后，他们就公开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纠集同伙，非法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反党组织，妄图制造一个“第二党”。他们还派人到山东、河北、东北、广东等地，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阴谋从地方到中央分裂党。更为恶劣的是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者为了达到其分裂党取消革命的罪恶目的，竟以公开散发传单的方式，把党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的名单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结果使我党二十名负责干部被捕牺牲或遭监禁，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

罗章龙为了达到他反党篡权的目的，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反党篡权是真。事实上，罗章龙曾是

立三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关于这个问题，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为自己的“左”倾路线辩解时说过：“我的路线无论怎么不好，可是它的确曾经把许多很久消沉分子都变成过积极干部”（这里所谓积极干部即指罗章龙一伙）。罗在讨论政治决议案时也发言表示：“对整个系统意见完全赞成……尤其是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而在四中全会上这个立三路线的“积极干部”，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就是在这次会上，罗章龙一伙也是明反立三路线，暗里与立三路线的“左”倾分子相勾搭，并表示赞成他们的领导。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是右倾分裂主义反党集团的惯用手法。

对于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者的反革命罪行，广大党员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一九三一年一月，党把这伙叛徒永远清除出党。猖狂一时的罗章龙反党小集团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以后罗章龙卖身投靠国民党，成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奴才。

第三节 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蓄意挑衅，制造借口，策划一系列侵华阴谋事件。九月十八日悍然出兵，袭击沈阳，制造

“九一八”事变，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革命内战，消灭红军，对日寇的侵略行动竟然采取“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战而退，致使日寇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就侵占了东北全境，并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筹建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从此祖国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三千万同胞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

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和推动下，抗日反蒋怒潮汹涌澎湃。在东北，党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援助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五年后，各种东北抗日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等同志率领下，坚持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风起云涌，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在上海，首先爆发了三万五千码头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接着，八十万工人又举行反日集会，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在南京，爱国学生为抗议蒋介石的卖国外交，捣毁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殴打了外交部长。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济南、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大批拥向南京。于是，在南京爆发了全国各地学生三万多人联合大示威。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学生爱国示威进行了野蛮屠杀，激起全国广大人民更大的愤怒。

曾经在一九二七年附合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下，也发生新的动摇，开始改变政治态

度，表示赞助抵制日货运动，提出对日“经济绝交”。一九三二年四月《申报》等报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的呼吁，由于全国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官员，也开始政治上的分化。一九三一年十月，东北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违反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进行了抗战。十二月，被派到江西攻打红军的第廿六路军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同志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这时，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一度被迫宣告“下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国民党内部一些爱国分子率领十九路军，再一次违反蒋介石的意志，进行武装抵抗。

上述情况表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开始下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革命的变化。如果我们党能够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势力，组成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就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迅速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断送了“九一八”以后的有利形势。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及其主要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党的领导机关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机会主义路线。它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

叛徒和卖国贼。早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王明一伙在苏联学习期间，就结成了一个宗派集团，一九三〇年他们回国后，大肆进行以夺取中央领导权为目的的反党宗派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一伙依仗他们造成的政治声势和宗派势力，通过党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并以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为政治纲领，提出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统治达四年之久。“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①这主要是由于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王明反党宗派集团对中央施加压力，并得到部分经验主义者的呼应。王明在苏联学习期间就控制了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的领导权。并且形成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集团。一九三〇年，王明一伙陆续回国。回国后，大肆进行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叫嚷要“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要求以积极拥护他们的“斗争干部”来“改造领导”，“改造中央”。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这个宗派集团的欺骗和胁迫下，并得到部分经验主义者的支持，通过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第二，王明站在“左”的立场上，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挂着“国际路线”的招牌，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基本结束了立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然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3页。

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利用广大干部和党员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不满，却站在“左”的立场上，以一种更强烈的宗派情绪，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活动。他们不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却胡说什么“立三路线是‘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断言“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而王明自己却恬不知耻的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代表”，借以欺骗人、吓唬人。

第三，从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看，过去虽然曾经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纠正，但由于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并且大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实行了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政策，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内新鲜活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打击和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就缺乏识别能力和抵制力量。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的存在着。这就给王明的假马克思主义篡夺领导权创造了客观条件。

王明一伙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根本不懂。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只凭唯心论先验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错误观点，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问题上，王明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论断，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片面夸大了资本主义成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强调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资本主义并列起来。胡说什么“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妄图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阶级关系和党的策略上，王明一伙根本否认“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引起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错误地认为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和投降的烟幕弹”，甚至把一些赞助工人抗日罢工的资本家看成是收买工人的“反革命”，鼓吹中间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实行一系列过左的政策。他们还把反革命营垒看成铁板一块，否认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引起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否认利用反革命内部矛盾的可能和必要，拒绝同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势力结成统一战线，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

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王明一伙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无视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变，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王明把个别的、片面的、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全面的、本质的东西，把相

对真理夸大为绝对真理。在红军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后，王明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统治区在“加速崩溃”，把阶级敌人看成一钱不值。在这种唯心主义估量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叫嚷“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并且提出一条所谓“进攻路线”要求全党准备决战。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一伙仍然醉心于“城市中心论”。他们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在大江以南地区攻取南昌、赣州、吉安等几个中心城市；在大江以北地区要形成对武汉的包围形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在白区工作中，则强令少数党员和群众，经常地、无条件地举行政治罢工、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乃至城市武装起义。

在组织上，王明一伙大搞以我为核心的宗派主义。他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派出“钦差大臣”，打着“反右倾”，“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篡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们对不同意其错误路线的干部，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等大帽子，甚至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他们统治的四年中，把毛主席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尤其严重的是由于毛主席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反对，抵制他们攻占大城市的命令，因此王明一伙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赣南党代表大会与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

反毛主席并相继剥夺了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等领导职务。

二、红军战争的胜利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与政策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在毛主席军事路线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四次反革命“围剿”，取得红军战争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冯（玉祥）、闫（锡山）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集团立即纠集十万兵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以“分进合击”的办法，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攻。

红军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毛主席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英明地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主力诱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龙冈地区，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个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为远距离之两群。龙冈一役，歼敌九千余人，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接着，乘胜追击。其他各路敌军闻风丧胆，狼狈溃退。这次战役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的五天内，共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又纠集了二十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反革命战术，分兵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毛主席根据敌我

力量对比情况，英明地采用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自五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日，十五天内，红军由西向东转战七百余里，连续打了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粉碎了蒋介石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仅仅相隔一个月，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又纠集三十万兵力，并亲自担任总司令，分兵三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这时，红军只有三万人，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毛主席英明地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指挥红军绕道千里由闽西边境回师赣南，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五天内，三战三捷。敌军主力闻讯猛力扑来，红军又从密集大包围的缝隙中穿越过去，回师兴国。待敌发觉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而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哀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九月，蒋介石狼狈窜回南京。这次战役，前后三个月，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红军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红军消灭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之间的全部反革命白色据点，建立了连成一片的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二十一个县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其他各地的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各根据地代表和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代表来到瑞金，举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主席当选为主席。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又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但是，其错误路线尚未在红军中全面贯彻，红军在毛主席军事思想影响下，又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在中央根据地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前后，国内形势又进一步发生变化。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并进攻长城各口，开始侵入华北。同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愿意和全国任何派系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宣言发表后，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吉鸿昌同志的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同年十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政府”，并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

与此同时，红军向浙赣边界发展，使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联成一片。红军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

红军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形成了系统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根据唯物论的反映论，毛主席十分重视研究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根据中

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制定的。

毛主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强大。第三、红军弱小。第四、共产党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同时存在着的两个方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只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由此而来的根本规律出发，才可能产生正确的战争指导原则。毛主席认为，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红军的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力量，才能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

毛主席规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①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就是在战略防御中以战役战斗的进攻战，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歼灭敌人，在长期作战中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变弱为强，以达到战略上削弱敌人之目的，待到有利时机转入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消灭敌人。

为了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主席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是在优势敌军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歼灭敌军而主动采取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2页。

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①集中兵力，就是在战役战术上，以优势对劣势，以多数对少数。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只有在战略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才能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战略上敌我优劣、攻防的形势，直到最后打败敌人。运动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③这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形式。打运动战，就能使我主力部队在广阔的战场上，高度地机动，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捕捉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

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基础上的。实行人民战争是我军战略指导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这是由于我军战争的正义性所决定的。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④只有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把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充分地发挥出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才能保证队伍有雄厚的兵源，才能保证军队的装备和战争物资的供应，才能克服由战争引起的巨大困难，才能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发挥我军的优点，利用敌军的弱点，战胜敌人。

^{①②③④}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95、209、214、191页。

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它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胜强大敌人的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人民军队百战百胜的强大武器。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对当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连续“围剿”和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根据地经济建设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并且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如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等，致使根据地经济受到破坏，造成困难。为了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抵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毛主席以很大精力，从事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工作。从一九三三年八月到一九三四年初，毛主席在江西南部十七个县经济建设会议和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先后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报告，提出了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报告正确地分析了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着重批判了王明一伙把经济建设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错误路线。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

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打击。同时也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这样，既批判了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观点，又批判了那种离开革命战争搞经济建设的错误观点，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报告还规定了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则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毛主席正确地制定了经济建设的政策原则，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在毛主席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三三年赣南闽西区域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闽浙赣边区增加百分之二十。工业生产方面，办起了许多工厂，如兵工厂、织布厂、制糖厂、造纸厂等。合作社事业也获得迅速发展。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随着经济事业的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群众生活

并对后来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三、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 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一百万兵力、两百架飞机，在德、意、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的参与下，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敌人为了割断中央与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占领黎川。这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进一步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把“左”倾路线全面贯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去，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王明一伙对形势的估计上，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军事上，“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一开始，就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得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向敌之巩固阵地的白区进攻。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更以此为借口，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

后，发生福建事变。这时，毛主席本着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鉴于“围剿”已经无法在内线解决。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既能迫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能援助福建政府。这是扭转战局，转败为胜的英明决策。毛主席这一建议竟被“左”倾分子所拒绝。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的中央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当国民党反动军队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时，也不组织出击，让其畅通无阻地通过根据地，这样不但没有把中间势力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且在军事上也坐失良机。“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①致使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更加疯狂地向中央根据地围攻。一九三四年春，敌人纠集十一个师向中央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进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调集五个军团组织广昌大会战，实行“短促突击”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结果红军损失很大，广昌被敌占领。

广昌失守后，敌分四路继续向中央根据地推进，“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命令红军主力分别在兴国、广昌、头陂等地布防，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截，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当战争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毛主席再次向军委建议，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20页。

指出红军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以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左”倾机会主义者由轻敌受挫而为敌人吓倒，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①只好实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毛主席指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结果，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四、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工农红军被迫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前，一九三四年七月，党派寻淮州、粟裕同志率第七军团北上抗日，于赣东北同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第十军会合，组成第十兵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浙西、皖南地区，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接着中央又派出由湘赣、湘鄂赣区部队组成的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领导下突围，十月到达黔东，与红军第二军团会合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继第六军团西征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20页。

后，红军第二十五军也奉命退出鄂豫皖区向西北转移，经陕、甘入陕北。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除留下一部分部队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领导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外，其余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时，王明一伙又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作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既不作长征的准备工作，又不在指战员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出发后，不是积极争取有利时机，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而是指挥红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使红军主力变成掩护队，运动战变成掩护战，行动迟缓，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国民党反动派设置了四道严密封锁线，派了大批军队围追堵截。当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又调集四十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一筹莫展，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湘江东岸激战一星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这时，如果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就必然要与五、六倍于我的优势敌军决战，中央红军将面临覆没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当机立断，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左”倾分子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遵照毛主席的意见，红军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肯定了毛主席的主张。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迅速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草塘）。一九三五年一月初强渡乌江，解放遵义城。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大革命失败到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解放遵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根据地，使工农红军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由毛主席领导。

由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王明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长期坚持斗争；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正反两方面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激起对“左”倾路线的极端不满；有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在毛主席耐心帮助和事实的教育下，也逐渐觉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上的错误。

会议着重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推卸罪责，不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路线错误，而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中央苏区工作的不利。抹煞中央苏区支援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以掩盖由于他们错误的军事路线领导所产生的恶果。会议严正指出：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会议指出：在内线作战下，在绝对优势敌军进攻面前，红军必须实行退却与隐蔽，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等战略战术原则。所谓“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只不过是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分兵抵御，是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是革命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战略战术，实际上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会议明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组织路线及其恶劣的领导方法，纠正了过去的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会议上，周恩来等同志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会议撤换了一些“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任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遵义会议宣告了王明错误路线的破产，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是有极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胜重重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在这以后，在中国革命的长途中，党内虽然又多次出现重大路线斗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破坏和干扰，混进党里的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妄图篡党夺权，分裂我们的党，扭转历史车轮。但是，党的团结统一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他们都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了。中国革命始终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第四节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被粉碎。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一、粉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全军振奋，部队休整十几天立即转移北上。一月下旬红军经桐梓、鲇水在川黔边境土城一带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渡江。这时，敌人极为恐慌，急忙布防川黔边境，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彭德怀对抗毛主席的军事命令，在土城战役中没积极抢占青杠坡制高点；张国焘没把四方面军引向重庆方面牵制敌军，反而向相反方向移动，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致使军事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根据情况的变化，毛主席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意图，突然甩开敌人，出其不意，挥戈东指，从二郎滩一带再渡赤水。发动著名的遵义战役。二月下旬，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一举歼灭敌军二十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重大胜利。

三月，毛主席率领红军自遵义西进，由茅台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大筑碉堡。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实现我军战略转移的目标，红军突然由川南回师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迅速南下渡乌江，用主力佯攻贵阳，并分兵黔东，造成敌人的

过失。这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令滇军驰援“保驾”，一面调军东往余庆、石阡等地防我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于是，我军用一部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渡过北盘江，直逼昆明，时滇军主力已东调，龙云急调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则乘虚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边挺进，迅速会集于绞车渡，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地区，夺取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把蒋介石和川黔滇三省军阀的匪军远远甩在后面。与此同时，我军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部队亦经云南会泽渡过金沙江，这样我军就跳出了数十万敌人追击的圈子。

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我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在滇、黔、川广大地区开展了高度的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甩开敌人尾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在长征的关键时刻，红军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体现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范例。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一面同几十万敌军艰苦奋战，一面继续同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林彪的破坏和干扰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渡赤水后，林彪反对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更计划，二渡赤水后，他又右倾保守，犹豫动摇，消极对抗。遵义大捷以后，在节节胜利的进军途中，林彪又与彭德怀勾结，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林彪。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又翻越川康边境的大雪山——夹金山，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又展开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长征途中艰苦情况下形成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①张国焘早年投机革命，一九二一年骗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信任，出席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时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问题一直向党隐瞒）。他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在历史上忽“左”忽右，曾多次犯过错误。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是“左”倾关门主义者，不久又积极追随陈独秀，成为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大革命失败以后，张国焘悲观动摇，反对南昌起义。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一九三一年从苏联回国后得到王明一伙的重用，以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窃取了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张国焘到根据地以后，先是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遭到挫败后又惊慌失措，转为退却逃跑。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川陕地区，一九三五年三月，又擅自退出川陕根据地，向四川、西康逃跑。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6页。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这时，张国焘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面目进一步暴露，他公然对抗两河口会议决定，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搞宗派主义，制造借口，妄图改组中央军委，篡党夺权。

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政治形势，肯定了两河会议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力，北上抗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会议强调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作用，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以及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会议号召全党全军把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习气的斗争，当做当前的中心任务。经过尖锐的斗争，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路军、右路军。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战胜了饥饿，横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川北的巴西。但是，左路军在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后，进一步暴露出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野心，拒绝服从中央的北上命令，坚持其错误路线，甚至妄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在右路军中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发觉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主席。

为了粉碎张国焘的罪恶阴谋，八月底中央在巴西召开了

政治局会议，开展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会议决定，中央立即率领红军向陕北前进，以脱离危险区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立即组成北上抗日支队，渡过包座河，沿白龙江前进。在川甘边境攻克天险腊子口之后，越过岷山千里雪，渡过渭水封锁线。

一九三五年九月初，中央在四川俄界连续电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有误。接着，于九月十二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指出其对形势的右倾悲观的估计和军阀主义倾向；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坚决斗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北上抗日支队英勇善战，击败敌人的封锁追击，翻越六盘山的高峰，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毛主席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里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把刘志丹等一批被他们迫害拘捕的干部从狱中释放出来，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并肩作战，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北边区的“围剿”，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张国焘妄图截击中央，危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后，不顾中央的一切命令和警告，不顾朱德、刘伯承等的反对，悍然率领被其欺骗和强制的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并于十月五日在绰木碉非法另立“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

央政府”，自封“主席”，甚至狂妄的盗用“中央”的名义发电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准用中央名义，只能用北方局、西北政府名义，狂妄已极！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党野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鉴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罪行，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伪中央，放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六月，由湘鄂川黔边区进行长征，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甘孜的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六军团奉命组编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又企图以强制和欺骗手段，阻挠二方面军北上。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逼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伪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后来他则写了几次声明书，表示承认错误。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二方面军全体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分终于到达陕北，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歼敌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在北上途中，张国焘野心不死，竟盗用中央军委名义，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等口号，命令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由甘肃西渡黄河，至甘州、肃州地带，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终于失败，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在中央营救下，于一九三七年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

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①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用两年时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自然界的无数艰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胜利地完成举世闻名的长征。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深刻的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②“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③英雄的红军到达陕北时，虽然从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中央红军八万人减为八千人。全国党员也只剩下四万人。我们党的力量，在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路线正确，广大干部、党员和战士，经过艰难复杂的考验和锻炼，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因而，在质量上比过去更强了（见附图四）。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叛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之前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所犯重大路线错误的形成、发展和社会根源；批判了张国焘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2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35—136页。

③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36页。

计和他的退却路线；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决定》阐明了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方针政策，指出：过去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反对把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歪曲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并对四方面军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给以鼓励。会议号召全党全军在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要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完成党的任务。即使对张国焘本人在严肃斗争的同时，仍然耐心教育，促其觉悟，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撤销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工作。中央对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表面上表示服从，实际上却在准备最后叛党。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以去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为名，擅自跑到国统区西安、武汉。遵照中央指示，为了最后挽救他，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找到他，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并促其改正错误，但他竟公开表示对党的不信任，对革命前途绝望。四月十七日，公然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①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将叛徒张国焘开除出党。这一处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历史证明，那些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玩弄阴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最后都逃脱不了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下场。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9页。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由于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终于孤立、暴露和清除了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国焘，团结和教育了受张国焘路线影响而犯错误的干部大多数，党取得了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重大胜利。“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①

二、华北事变。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华北事变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五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在华北的控治权的无理要求。十月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十一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在冀东二十二个县成立了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还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在日寇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反动政府依然实行独裁卖国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一方面围追堵截我北上抗日的红军，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继续妥协退让，辱国丧权。六月，蒋介石派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侵略军头子梅津签订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出卖给日本强盗。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6页。

十一月，又指使军阀宋哲元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党的号召和推动下，首先在北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示威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但他们并没有被吓倒，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第二天，又举行全市总罢课，并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联盟的长期恐怖统治，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南京、上海、天津、杭州、长沙、武汉、太原、开封等地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高涨起来。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标志着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极大地被孤立了。

【瓦窑堡会议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为了正确分析形势，反对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以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讨论和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总结了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

第一，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充分说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正确分析形势是党制定路线策略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明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

鸦片战争以后的九十几年，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但是，“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更加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毛主席抓住这个形势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这种形势，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的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因而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面对亡国的危险，“**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以来的革命，“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却站到蒋介石集团方面去了。在新的形势下，这个阶级的态度有无变化的可能呢？毛主席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科学地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明确回答了民族资产阶级有改变政治态度的可能。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压迫和束缚而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这些经济势力。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而在它一九二七年倒向蒋介石集团一边以后，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此，在殖民地化的威胁的新情况下，这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就有变化的可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还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两广军阀提出欺骗的口

号同蒋介石对立，就是例证。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上述阶级关系的变化总括起来，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变化，指出：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过去更增长了。但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革命力量是不平衡的，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把党领导的红军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同时，毛主席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第二，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左”倾机会主

义军事路线，但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还没来得及彻底清算。“左”倾关门主义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阶级关系上的集中表现。不肃清“左”倾关门主义的恶劣影响，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就得不到贯彻。列宁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①“左”倾关门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地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永远是统一的、铁板一块，从而否认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会发生破裂。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他们只看到革命形势发展的一面，没有看到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弱点的方面。“左”倾关门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他们根本不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当前最主要敌人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他们不会拿起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和一切可能的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中心目标攻击，反而把子弹打在次要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无坚强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党所领导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因此，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毛主席又及时唤起全党注意防止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倾向。毛主席总结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遭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唤起全党注意在新的环境下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右倾危险的发生，要承担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策略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完整地阐明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说明的政治策略问题，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在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关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的策略思想；关于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努力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对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也是当代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反对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反革命文化“围剿”。这个时期，在革命方面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配合红军反“围剿”战争，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

共产主义者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不顾反动派的恐吓、逮捕、屠杀，以马列主义锐利武器，揭露了“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形形色色的卖国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反动嘴脸，并且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的反动阶级实质以及反动统治阶级鼓吹孔孟之道的反动政治目的。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剥开了孔丘的画皮，指出孔丘成为“圣人”完全是后来“权势者们撑起来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尊孔祭孔，都不过是维护他们罪恶统治的手段而已。鲁迅还通过对国内政治事件的分析，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戳穿了他们污蔑共产党和对红军战争的反动宣传。

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和鲁迅的坚决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反映到左翼文化运动内部，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三十年代初，窃踞“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一伙，在政治上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则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形成一条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针对当时左翼文化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发表了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中提出警告：“左翼”作家如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是“容易变成‘右翼’的”，不能“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这个演讲实际上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在鲁迅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时候，周扬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不少貌似很“左”，实则装腔作势，充满下流的辱骂和恐吓的作品。鲁迅从高度革命责任感出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专门给周扬写了长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严肃地批判了这种恶劣倾向。周扬大耍两面派，暗地指使同伙发表文章，污蔑鲁迅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是“戴白手套革命论”，甚至无中生有地造谣鲁迅与叛徒“调和”。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别动队。鲁迅对周扬一伙的破坏活动和卑劣手法十分愤慨，他说：“我总觉着有几个人（指周扬一伙）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在拿我做玩具”。由于周扬一伙对鲁迅的排斥和打击，使得鲁迅“为了防后方”，“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①

党在基本上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后，原来被掩盖

^①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15页。

着的另一种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滋长起来。这时，王明在国外背着党中央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竭力鼓吹建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

三 周扬一伙积极追随王明，从“左”跳到右。他们披着左翼作家、马列主义外衣，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一股右倾投降逆流。周扬一伙，不顾鲁迅的反对，于一九三六年春，私自解散“左联”，在此前后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并且筹组所谓“文艺家协会”，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工具。他们宣称“国防文学”是具有“全民族的性质”的文学，无产阶级不应“以特殊的资格在要求领导权”。“国防文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口号。实质上是在全民共同利益的幌子下，抹煞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鼓吹阶级投降，为蒋介石集团反共卖国政策服务。

“国防文学”口号一出笼，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刘少奇就发表文章，提出所谓“广泛的领导权”的谬论，为周扬一伙张目。钻进党内的老反共分子陈伯达也极力吹嘘“国防文学”口号是“联合战线”的口号，并且抛出“国防哲学”的反动口号，为王明投降主义和“国防文学”提供理论根据。“国防哲学”实质上就是反共卖国，是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投降哲学。

面对周扬一伙掀起的右倾机会主义逆流，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七月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鲁迅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抓住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是一个同“国防文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口号。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所谓“国防文学”只不过是“取悦于国民党”，“是一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防文学”的反动阶级实质和提出这个口号的政治目的，击中了要害。

周扬一伙还乘鲁迅病危，“大摆围剿阵”。鲁迅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信中鲁迅进一步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含义，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周扬一伙的谬论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揭穿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有力地粉碎了周扬一伙对鲁迅的无耻诽谤和恶意中伤，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篇重要文献。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上海不幸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对于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历史的总结，并且对鲁迅给以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8页。

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瓦窑堡会议后，全党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同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

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三月，发表东征宣言，宣传了党的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但正当抗日先锋队占领同蒲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候，竟遭到国民党军的无理阻拦。蒋介石调集三十三万兵力赴山西，伙同闫锡山部队向抗日先锋队进攻，并命令驻在陕西的东北军张学良部队、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向抗日后方陕北挺进。这时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同时也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在其主子英美的指使下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有改变对日政策的可能。为了顾全大局，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抗日，五月，先锋军在击败蒋闫反动军队的阻拦取得重大胜利后，毅然回师河西，放弃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五月五日我党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东征回师通电，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愿与一切肯于放弃进攻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停战议和，磋商抗日救亡大计，并严厉

警告蒋介石国民党，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其反动统治必将为人民所推翻。

八月，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的信，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出双方各派代表进行谈判，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为了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这封信中还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成“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两者形式不同，实质一样。

为了统一全党的策略思想，同年九月党中央又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方针应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一方面必须继续揭露与打击蒋介石对日每一退让、妥协和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以教育和发动群众；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同时，我党也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就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的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团结御侮联共抗日政策。十一月，上海爆发了二十六个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青岛各日本纱厂工人也举行了总罢工。

驻西北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的广大士兵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下，流亡关内，深感家乡沦亡的

痛苦，不愿打内战。鉴于这种状况，党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军的宣传和争取工作。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不平等待遇和卖国内战政策也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当他们被蒋介石派往陕北进攻红军屡遭失败以后，首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并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建议。蒋介石不但悍然拒绝，并且调遣二、三十万嫡系军队进入陕北，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并亲自到西安督战，监视张、杨的行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下级官兵的强烈反对，也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地位，张学良、杨虎城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联合行动逮捕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各种政治势力立即展开了一场极其紧张而复杂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散布谣言，宣传张学良已经“赤化”，煽动中国大规模的内战，叫嚷不能坐视南京政府和张、杨妥协，以利于它进一步侵略；国民党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也极力鼓吹“讨伐”张、杨，乘机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防止亲日派上台和日本独占中国，主张南京同西安之间达成妥协，并表示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与“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国民党内亲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在其主子的支持下，积极要求同西安和共产党方面谈判，救出蒋介石，以便维持英美派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从革命阵营力量方面看，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来就反对反动统治者发动内战，对于卖国贼蒋介石，广大人民恨之人骨，谁也不能忘记十年来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但是在民族危急关头，更不愿因此次事变而扩大内战。

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央估计西安事变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由于这一事变使内战扩大，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阴谋；或者由于这一事变使内战结束，有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因此，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决定时局发展的关键。

这时，张国焘乘机提出形“左”实右的“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的主张。这种方针只能制造混乱，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从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坚决主张尽一切努力使西安事变在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获得和平解决。党中央于十二月十九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揭破日寇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并派周恩来等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赴西安谈判。同时，党也没有放松警惕，集中红军主力于潼关附近，准备在亲日派的“讨伐军”胆敢发动进攻时，予以迎头痛击，迫使其停止内战。经过党的种种努力和斗争，蒋介石在人民的压力下，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地位，终于接受了联共抗日、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于是，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①。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8页。

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生活等五项要求；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作出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保证。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同亲日派汪精卫进行了激烈斗争，终于使国民党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至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上得到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了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主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

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这就从根本上批驳了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那种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接着，毛主席提出在内战基本结束到全国抗战爆发这一阶段内，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行抗战**”，并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才能动员人民，克服国民党反动派的阻碍，实现抗战。

针对国民党开始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情况和右倾投降主义谬论，毛主席着重强调了党必须自觉地担负起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主席再次提醒全党吸取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严肃提出：

“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为此，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毛主席的报告，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五、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从思想路线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批判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国内，全国抗战即将爆发；在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

斗争和国内斗争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空前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总结我党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引导全党分清路线是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在我党领导的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由于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善于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使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四次统治了党的领导机关，其中尤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最为严重。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世界观来说，就是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则是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只有从哲学上把思想路线搞正确，才能在政治上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界限。

为了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总结两次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月间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哲学著作。

《实践论》，从认识论上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了机会主义路线在认识论上的错误。

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

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科学论断，指明了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思想基础，揭露了机会主义的思想特征。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从思想路线上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的指针。

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路线和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集中地概括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因而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指路明灯。

陈独秀、王明之流一贯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对抗唯物论的反映论，否认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违背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离开了社会的实践。“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结果都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毛主席深刻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就揭穿了“左”右倾机会主

义的共同思想本质，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把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同思想路线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规律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主席指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宇宙观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在事物的外部而不在事物的内部，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指明了机会主义者的历史责任。毛主席指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时，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毛主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五、任何矛盾都是具体的，都有它独特的内容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所谓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矛盾的各自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因此，必须学会“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矛盾的特殊性，也就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观都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割裂开来。他们或者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或者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从右的“左”的两个方面修正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他们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而且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和严重危害。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正确运用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始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毛主席在阐述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时，还特别分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在一定

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只有抓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才能明确打击方向和应该依靠和团结的社会力量，从而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主要矛盾规定、影响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有影响。因此，在全力捉住主要矛盾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历史的发展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因此，一个革命政党要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及时注意矛盾的转化，并预见到这种转化，正确地及时地提出新的任务、口号，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群众，集中全力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每当历史转折关头，总是及时预见到主要矛盾的转化，适时提出新的口号和政策，指明前进的方向。从“九一八”事变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方针的巨大变化，就是运用主要矛盾变化，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转化的典范。“左”倾关门主义否认“九一八”事变以后主要矛盾的逐渐变化，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主要矛盾的变化。就是否认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基本观点。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正确地运用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原理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敌人的暂时强大，和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不懂得敌强我弱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因而对革命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成为可耻的取消主义者。“左”倾机会主

义者则又完全颠倒了敌强我弱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位置，否认反革命力量当时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在论述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的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斗争，并且促进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都不懂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这种辩证关系。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斗争性的一面，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到同一性的一面，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投降主义，结果两者都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与他们相反，毛主席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又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毛主席还深刻分析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及其辩证关系。并且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同志当敌人，对反对他们的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则把敌人当作朋友，出卖革命。他们都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了错误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

毛主席在深刻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根源的同时，还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历史表明我们党就是在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发挥，最科学的表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从哲学上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了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中国工农红军战绩统计表
(1931年1月——1933年10月)

| 项目 | 年 别 | | | 总 计 |
|---------|----------|----------|----------|----------|
| | 1931 | 1932 | 1933 | |
| 击 溃 敌 军 | 150,000人 | 300,000人 | 300,000人 | 750,000人 |
| 消 灭 敌 军 | 60,000人 | 106,000人 | 150,000人 | 316,000人 |
| 俘 获 敌 军 | 52,000人 | 71,000人 | 75,000人 | 198,000人 |
| 缴 获 武 器 | 44,000支 | 54,900支 | 66,800支 | 165,700支 |
| 缴 获 电 台 | 8架 | 5架 | 6架 | 19架 |

注：此表仅限主力红军的战绩，游击队和地方部队的战绩未列入。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第一节 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和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的发表

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对立。党的洛川会议

【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的创伤还没有恢复，一九三七年新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又首先从美国爆发，继而波及英法等国。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了掠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逃脱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加紧推行其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的“基本国策”，决心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大举进攻。八月十三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当地中国驻军在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在“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党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

出“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工农红军将士也立即集结，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在我党的领导与推动下，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际环境是很复杂的。

德国、意大利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竭力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是坚决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是中国人民的可靠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及朝鲜、印度等国际友人，还到解放区直接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①

美英帝国主义，对中日战争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侵华战争，侵犯了它们在华的利益，加深了它们与日本的矛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另一方面，它们又企图利用日本之手削弱中国的革命力量，所以对日本的侵华战争采取纵容的政策。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大做军火生意，不断供给日本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所消耗的四千万吨汽油，有百分之七十是美国供应的。它们的目的是，就是使日本和中国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翁之利，或者用中国来换取日本进攻苏联。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内的阶级关系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20页。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人民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全力抗日的。工人阶级是抗战的领导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主力，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都站在抗日方面。

汉奸，是中国最反动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爪牙。他们为数很少，并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国民党的主体，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基本上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买办集团。它们为了维持统治，保护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抗日；另一方面又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不给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权利，并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妄图“借刀杀人”，利用日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有广泛的同盟者；同时也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后，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其基本特点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但依然存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因此，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是党领导抗战、决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尖锐对立】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早日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七月十五日，我党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并派周恩来等同志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由于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

动，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斗争，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直接侵害着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蒋介石集团七月七日被迫宣布对日作战。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国民党把结成这个统一战线看作是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成份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小地主，甚至包括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民族矛盾的加深纵使各个阶级联合起来，而固有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减少或消灭，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级阶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它集中表现在我党同国民党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上。

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毛主席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即指出对待抗战有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揭示了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对立。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利益出发，采取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为实现这个方针，就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

^①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335页。

众，实行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在全国实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和自由。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前途。这便是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国民党从英美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采取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他们主张由它的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坚决拒绝任何有利于抗日的民主改革，不给人民以任何抗日的自由，不允许适当地改善工农生活，顽固地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就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分歧的焦点，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谁来领导抗战的问题，其斗争的结局，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正如毛主席指出：实行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我党必须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争取第一个前途，避免第二个前途。

【党的洛川会议】为了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制定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具体纲领和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党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抗战爆发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国民党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

许多挫败、退却、内部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抗战将是艰苦的持久战。《决定》指出，党在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任何的动摇与妥协；实行全国的军事总动员，武装人民抗战；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各项自由；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等等。其基本精神，就是广泛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依靠广大的人民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抗战胜利的结局成为人民的胜利。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及反动政策的指针。

为了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农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即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斗争。

洛川会议特别强调党对抗日的领导责任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是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

洛川会议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正确地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及具体纲领和政策，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

【两个战场的两种局面】我国的抗日战争，在两条不同抗战路线指导下，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战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抗日局面。

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结果几百万军队在日寇最初几次打击之下，便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在华北、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便丢掉了平、津。国民党七十万军队节节败退，日寇沿平汉、津浦、平绥、同蒲铁路长驱直入，仅仅半年时间，便使整个华北沦于敌寇。在江、浙前线也是一败涂地，上海沦陷后，蒋介石声言要死守六个月的南京城，结果六天就失掉了，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又逃到重庆。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一直退到四川，大半部中国沦陷了，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恶果。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表现出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数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无数居民被屠杀侮辱，即使妇孺老弱，亦难幸免，给

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灾难。日寇占领南京后，把和平居民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拚刺刀的对象，展开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大竞赛”。无辜的居民，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活埋，甚至许多孕妇被剖腹挑出胎儿。在一个多月内，南京人民被杀害三十万之多，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惨案。日本法西斯强盗，妄想用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面前，日寇的暴行只能激起全中国亿万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加速它们的失败。

在日寇猖獗，国民党损兵折将、丢城失地的严重情况下，我党我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正确的作战方针，在敌后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同志任总司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三万余人。九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辟敌后战场。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指示到达华北的部队，应以分散兵力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二十五日又指示华北党组织，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八路军勇敢地向日寇肆意践踏、国民党节节溃败的华北敌后大踏步地挺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华北人民，见到坚决抗日的子弟兵，无不奔走相告，精神振奋，扶老携幼到车站、城镇或村庄，热情的欢迎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深受鼓舞，英勇杀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接连获得辉煌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大长了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扭转了十分险恶的

抗战局面。

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二千余人，在聂荣臻同志的率领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深入晋察冀边区五十多个县，在“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下，依靠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十一月，经二十多天的艰苦奋战，歼敌二千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日寇二万多人的八路围攻，使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六月，又扩展到冀中、冀东等地区。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同志的率领下，深入太行山区，先后进行了有名的神头、响堂铺、长乐村战斗，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建立了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八路军总指挥部就迁到这里。以后，一二九师又派兵挺进冀鲁豫大平原，配合地方党组织开辟了冀南、冀鲁边、冀鲁宁等抗日根据地，共约一百一十多县，近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后来这几块根据地统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下，一九三七年冬，向晋北地区挺进。一九三八年三月，经过反复的争夺战，从敌人手中收复岢岚、河曲等七座县城和广大地区，开辟了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八月，又派出支队向大青山地区挺进，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后与晋西北根据地联成一片，成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我山东各地党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年初，先后在徂徕山、天佛山、黑铁山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游击队，开辟了鲁中、胶东等敌后根据地。这

样，整个华北沦陷区变成了抗日的前线。

在华中，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同志任军长，约一万二千人。一九三八年春，正当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受到敌人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我新四军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从皖南、皖西奔赴苏皖前线，肩负起在大江南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华中敌后根据地的任务。一九三八年五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率领下，挺进到安徽巢湖、无为、定远一带，解放了广大农村，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皖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六月，新四军江南部队在陈毅等同志率领下，挺进南京、上海之间的句容、漂水一带，肃清了敌伪势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路线指引下，解放区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歼敌五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余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建立了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的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击着四十万日军，占全部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敌后抗日根据地好比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使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遭到彻底破产，从而使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见附图五）

在一年多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已表现不能持久；而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称赞，“民族救星”的声浪传布全国。

二、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

【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和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大发展，使国民党内部更加动摇，其反共投降活动也随之加紧起来。他们一方面凭借实力上的优势，力图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于是，蒋介石国民党捏造的“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等谣言与日俱增，并极力向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挑衅，制造“磨擦”，策划分裂统一战线，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又无耻地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引诱我党干部，妄图拉拢、腐蚀、溶化我们党的队伍。这时，中间集团的某些代表也提出“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替国民党法西斯主义辩护。

统一战线中的两个阶级、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尖锐复杂地对立和斗争，在党内也有严重的反映。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右倾投降主义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国民党的无原则迁就；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主张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严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甚至因国民党干涉而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如此等等。以致由于一些同志对国民党反共阴谋丧失警惕，被国民党包围缴械。

针对上述情况，毛主席领导我党，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

生的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九月作出不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决议，在陕甘宁边区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坚持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反对了军阀主义倾向，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了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更好地克服党内出现的投降主义倾向，更有力地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投降活动，毛主席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及时地提出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迫切任务。

第一，毛主席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着重指出国共两党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号召全党为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实现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我党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同国民党主张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正处于从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过渡的青黄不接的严重危机之中。为了胜利度过这个时期，毛主席号召一切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不要忘记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为争取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而努力。

第二，毛主席在报告中及时地揭露了在全国存在民族投降主义，特别是在党内存在阶级投降主义的严重危险，明确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任务。毛主席指出，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是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堡垒，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引导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般地说来，他们从统一战线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其中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发动群众，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有力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芦沟桥事变后，右倾机会主义，即阶级投降主义已经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它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堡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针对党内外的严重投降主义倾向，毛主席尖锐地提出了谁领导谁的问题，并再一次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血的教训。”为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和党内的投降派，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在一切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阵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因此，毛主席指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第三，毛主席在报告中，还规定了在统一战线中扩大和

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坚决反对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的策略方针。毛主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指出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个集团。左翼集团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巩固和扩大这个集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条件。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也要求抗日，但有动摇性，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共投降活动的营垒，我们必须反对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并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毛主席的这篇光辉报告，是对抗战初期党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倾向斗争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特别是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投降派，争取抗战胜利的锐利武器。正是由于毛主席这条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对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正确路线，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学习这篇光辉著作，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反修防修反对投降派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正当毛主席领导全党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胜利地进行斗争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他打着“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猖狂地反对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

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十二月九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抛出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后，他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二十七日，又在他控制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的大毒草，使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一九三八年三月，王明又作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加完备。

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

第一，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抹煞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统一战线中，只有抗日派和亲日派的区别，没有左派、中派和右派的区别。胡说什么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共两党的关系是“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关系。吹捧蒋介石是什么“不朽的民族英雄”，“抗战领袖”。他们不承认国共两党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反对党提出“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口号。王明甚至主张把党中央迁到武汉，对国民党以示信任。他们只讲民族斗争，不讲阶级斗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系列错误的根本所在。

第二，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他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极力反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党的领导权。他们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他们主张“统一政府”、“统一军队”、“统一群众组织”，实质上就是要把我们党领导的民主政府、人民军队、革命群众团体，统到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反动军队和反动团体中去。他们完全放弃了党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党在华北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即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给蒋介石发个大会通电，实际是告诉全国人民，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这是体现我党独立自主原则的重大胜利。王明见到后很不满意，给毛主席发电报，说这样作会对抗战有影响，指责电报不应由延安发，还说今后不要这样做了。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唯恐得罪蒋介石。

第三，在军事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他们轻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而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荒谬地提出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放弃我党对抗日战争的军事领导权。他们反对毛主席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主张进攻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他们反对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而醉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斗争，迎合国民党的要求，企图以所谓“建议”、“赞助”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守以后，毛主席看到武汉将要沦陷的形势，指示长江局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准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创华中解放区，以便和华北连成一片。但是王明一伙顽固地拒绝中央指示，回电表示工作中心应是“保卫武汉”，不在农村，战略方针应是正规战，“建议”华北八路军集中起来攻城市，完全适应了国民党企图利用日寇消灭我

军的反革命需要。

第四，在组织纪律上，王明一伙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他所把持的长江局变成与党中央对抗的独立王国。他们顽固地拒绝中央的正确指示，强制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违背中央正确路线的文章和宣言，而对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一文，则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第五，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极端错误地估计抗战的前途。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在他的《挽救时局的关键》文章中无耻地叫嚷：“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可见，王明一伙已经堕落到完全投降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地步。

总之，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自动放弃了我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他们迎合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发表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一文，提出“在战略上必须实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和王明一个调子，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彭德怀早在党的洛川会议前后，就提出一系列右倾主张，反对放手发动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集中兵力搞“运动游击战”。这时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的报告大纲中，系统地、全面地贩卖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成为推行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得力干将。林彪也于一九四〇年发表了《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的反党文章，无耻地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是什么抗日的“最高统帅”，“政府领袖”，为蒋介石国民党歌功颂德，顽固地坚持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种阶级投降主义在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一方面，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转折，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列宁说：“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①毛主席也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②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出现联合抗日的局面。这时国民党对人民革命力量“围剿”的策略改变了，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他们在抗战“朋友”的字眼掩盖之下，施展种种限制、削弱乃至消灭我党的阴谋诡计。并以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引诱我党干部。正是这样，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就迷失了方向。王

①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49页。

② 《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1192页。

明新投降主义路线，就是适应国民党策略上的变化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党内成分不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平衡。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之流，长期拒绝世界观改造，一向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先是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当革命遭到重大挫折以后，他们又对革命力量丧失信心，认为国民党是不可战胜的，拜倒在国民党的脚下。抗战开始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党策略的改变，王明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国民党超过了相信党和人民群众，以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条件，求取国民党的联合，他们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许多党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就使得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有一定的市场。因此，为了纠正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就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抵制资产阶级影响和腐蚀的本领，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三、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发表

一九三八年五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身受战争灾害，为着自己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民，都在渴望战争的胜利。但是，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怎样取得胜利？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这些问题大多数人还没真正解决。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恐慌与动摇。以汪

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拚命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为其公开投降日寇制造反革命舆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但当其腐朽的军队一再溃败的时候，又大肆鼓吹“亡国论”，以推卸罪责。

在我们党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无视人民革命力量，幻想依靠国民党取得速胜。“亡国论”和“速胜论”，在一部分中间群众中也曾发生影响，成为抗日战争的严重思想障碍。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全面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情况，说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并且指明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一)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从这一基本的历史特点出发，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就规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抗战

不能速胜。第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并且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它已经有了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特别是有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红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进步因素，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第三，日本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很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则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第四，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是失道寡助的。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是得道多助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

抗日战争就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强弱对比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敌强我弱是暂时的、相对的因素，敌之小国、退步、寡助和我之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特别是敌退步、我进步这些因素则是长期起作用的决定因素，这就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遭到失败，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基于以上分析，毛主席还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发展必然经过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艰苦、最关键的阶段，它是战争的枢纽，是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的决定性阶段。中国能否胜利，取决于这个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荒谬论点，指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片面和表面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一个矛盾，把它做为全部问题的根据，而忽视了其他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速胜论”者相反，他们根本不敢正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单单抓住其他矛盾，并夸大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短处。这两个相反的极端，都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毛主席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

（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即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

抗日战争敌我双方诸矛盾因素及其发展变化，决定了中国的持久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但是，仅有这些因素，还只是有了胜利的可能性，它本身并没有分胜负。要实现抗战胜利，还需加上自觉的能动性，促进诸矛盾因素的运动和转化，这就是要以正确的方针，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并使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充分发挥其抗日的自觉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是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主席批判了

“亡国论”者竭力散布的“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怎样充分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呢？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头等重要的是必须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并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齐心协力，把一切贡献给战争。毛主席指出，这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路线的思想，既有力地反对了国民党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而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去放手发动群众的错误思想。

（三）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系统地制定了人民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毛主席从抗日战争的具体条件出发，规定我军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针对王明一伙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所谓正规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着重论证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就解决战争的命运来说，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又具有关系战争胜败全局的战略地位。这是因为在持久战的条件下，游击战争是在广大敌后战场上长期地大规模地单独地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不仅是战役配合，而且是战略配合，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广泛地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正规军，使我军由游击战发展到正规战，担负将来战略反攻的伟大战略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是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方针的具体道路，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具体体现。它既可致日本侵略者于死地，又能打破国民党限制、削弱我党革命力量的阴谋。因此毛主席说，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是“**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①

毛主席还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出发，系统地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主席指出，这一方针是全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的中心，并适用于战争的全部过程。实行这一方针，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改变着总的形势**”，再配合国内外的其他条件，就能从敌强我弱到敌我平衡，再由敌我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实行战略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就到来了。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6页。

《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具有伟大的政治历史意义。毛主席《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彻底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尖锐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澄清了党内外存在的混乱思想，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一书是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范例。毛主席在本书中关于战争规律的分析，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以及一整套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极大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主席在这部巨著中所阐明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等光辉思想，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复活，是断送党和革命前途的极端危险的错误路线。它严重地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贯彻，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不仅在王明直接控制的长江局，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城市做国民党上层工作，搞合法运动上面，致使长江流域地区失去了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大好时机，而且在他所直接影响下的东南局，由

于项英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再拒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不敢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不敢向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活动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致酿成了后来的“皖南事变”，给革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很明显，如不及时克服这条错误路线，党的事业就会被破坏，抗日战争就有完全失败的危险。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种错误路线刚一出现的时候，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八年十月，党在延安又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彻底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中，为了彻底批判王明放弃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严重错误，教育全党明确地认识并认真负起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着重指出并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毛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就必须不断扩大和纯洁党的组织，高度发挥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必须正确认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既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善于与同盟者一道工作，又要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每个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

王明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于十月二十日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继续坚持其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会议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和批判。最后，毛主席就这两个重大问题作了结论。

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中，毛主席深刻阐明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严肃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者对国民党消极让步，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等错误。毛主席指出，党的正确方针应当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一方针在本质上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问题。这一方针是立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在党的方针上的客观反映。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是主要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应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阶级斗争的要求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①因此，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样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导致民族斗争的失败。

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毛主席指出，当权的国民党不许有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19页。

过”我们的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么，他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毛主席指出，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中的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片面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而不应象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者，和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等投降主义者，把整个阶级和革命事业都让掉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实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主席制定了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暂时不斩不奏等一整套策略原则。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中，深刻地论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严厉地批判了王明醉心于合法运动，轻视和反对发展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毛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并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着重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又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严重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谆谆教导全党：“**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为了彻底批判王明一伙轻

视人民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再一次强调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出：“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会上所作的结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决定撤消长江局和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通过了有关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工作规则和纪律问题的几项党内法规。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规定中央委员没有党中央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和文件；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局必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指令。这便从组织上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全党的贯彻。

为了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主席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急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②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彻底批判并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8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9页。

线，使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一致起来，为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但是，王明对自己所犯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从不检讨，毫不悔改。全国解放以后，王明在反党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终于投奔苏修叛徒集团，堕落为汉奸、特务、卖国贼，充当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

第二节 党为坚持团结抗战，粉碎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的斗争。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击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本占领广州和武汉后，由于我党在敌后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严重地威胁了它的后方，加上它战线延长，兵力不足，日寇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回过头来保守占领区。从此，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毛主席英明预见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了。

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前，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

在占领武汉后，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和敌后解放区。据统计，一九三九年日寇用于进攻我敌后抗日人民武装的兵力，有日军五十四万，占其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二，有伪军十四万五千人，几乎是当时伪军的全部。一九三九年春，华北敌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在军事上采取了所谓“竭泽而渔”的“掏水战术”，“牛刀子战术”。“囚笼政策”等所谓新战术，大规模“扫荡”敌后解放区。据统计在抗战第二、三周年中，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零九次之多，其中一万人到三万人的大“扫荡”有七次，三万人到六万人的大“扫荡”有三次；在华中敌人采取所谓“梅花桩”式的堡垒政策，加紧对解放区进行围攻和“扫荡”。

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加紧了诱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放弃它一月份发表的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欢迎”国民党参加“东南亚新秩序”的建设。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又发表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表示只要国民党投降，日本军队就可以撤出华中、华南，华北也可以在名义上属于中国。

在西方，德寇正加紧侵略欧洲，英美法与德国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妄图以牺牲捷克利益为条件，换取同德国矛盾的缓和，并把德寇侵略锋芒引向苏联。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继灭亡捷克之后，又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英美法害怕日本与德国互相配合在东方攻击它们，并为了诱使日本北攻苏联，几次酝酿召开所谓“太

平洋国际会议”，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企图以牺牲中国为条件与日本妥协，因此，英美大使多次到重庆进行劝降活动，搞所谓“远东慕尼黑”阴谋。

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情况下，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活动日益加剧，并成为当时时局的主要危险。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首先响应日寇的召唤，发表“艳(二十九日)电”，公开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成为无耻的汉奸卖国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惨败和对人民抗日力量猛烈发展的仇视和恐惧，对抗战更加动摇。从此，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把主力龟缩到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采取了避战观战、保存实力的政策。蒋介石声称“抗战到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提出了投降的条件，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本代表在香港、上海等地秘密谈判，谋求对日妥协投降。

【击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集团为了扫清投降路上的障碍，日益加紧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接着又陆续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并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大搞反共宣传。在国民党统治区兰州、西安、赣州、上饶等地设立集中营，大批屠杀和囚禁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派遣特务潜入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制造摩擦，无耻的叫嚣向共产党八路军“收复失地”。

一九三九年四月，山东的国民党胡启荣部，在对八路军和抗日人民“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反动叫嚣声中，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惨杀我指战员四百余人。六月到十一月，又连续制造了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等反共事件，残杀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方留守人员，企图打击我党，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日。

毛主席领导我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非理性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六月，毛主席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已成为当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①七月七日，我党发表了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九月，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宣布了我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②的严正立场。毛主席号召全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好准备，以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

^①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选集》第537页。

^②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53页。

潮，主要集中在陕甘宁、晋西、晋东南和太行等地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向我进犯，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等五座县城；闫锡山集中了六个军，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向我晋西、晋东南进攻；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朱怀冰部分三路进攻太行区和袭击八路军总部。但是，由于我党我军在思想上、军事上早有充分准备，我解放区军民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卫原则，对反共军队，予以坚决回击。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的进犯，解放了绥德分区五个县城，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太行区的八路军彻底击败了朱怀冰等部的进攻，消灭国民党三个师。进攻我军的闫锡山部亦为我军所击败。这样，便在军事上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粉碎这次反共高潮中，党坚持了毛主席制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对国民党的进攻绝不退让，这样就保卫了人民已经建立的抗日阵地和力量，制止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妥协投降阴谋；另一方面又严格执行自卫原则，这样就制止了顽固派发动更大的军事进攻，缩小冲突范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和巩固。

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共高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反共反人民的猖狂进攻。他们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专门雇佣一批反动政客，再加上几个托洛茨基分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幌子，利用孔孟之道为武器，疯狂地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

西斯主义，他们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胡说“一切革命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当“取消”，共产主义应当“收起”。他们还高谈什么“基马尔主义”，以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招牌，掩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反共声浪，一时甚嚣尘上，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革命，使中国永远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民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他们虽然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一党专政及其妥协投降活动表示不满，但是他们又害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企图走“中间道路”，幻想在抗战胜利后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两条道路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党内也有严重的反映。右倾投降主义的头子王明，抗战以来就极力吹捧蒋介石，美化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并叫嚷把孔孟之道“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胡说国共两党要“相互礼让”、“相互尊敬”、“互相敬爱”，要“祸福与共”、“相依为命”，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刘少奇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抛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其要害就是背叛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替国民党的“溶共”政策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了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

攻，打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为了扫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复杂的环境中为党和全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毛主席在理论上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毛主席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深刻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同年十二月，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站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高度，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集中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具体纲领问题。毛主席首先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争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王明投降主义主动让权的实际情况，毛主席着重阐明了中国革命已不是旧的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把一九四一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世界革命范畴的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属于旧的世界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为什么呢？毛主席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主席发展了列宁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看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的思想，论证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在国际范围内分清了敌友，从时代和世界革命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毛主席还充分估计了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重大影响，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毛主席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思想。毛主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前，是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而“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它不仅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而且有跟随大资产阶级充当反革命助手的危险。这样，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就必然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而中国无产阶级从五四运动开始，已经变成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建立了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提出了彻底反帝

反封建的伟大纲领，并单独领导了土地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着。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主席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根本不同于旧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一种过渡性的国家形式。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就是这种政权的典范。

毛主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基马尔主义”的阴谋，和民族资产阶级妄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的幻想，严厉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资产阶级专政的路，乃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无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允许。“**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尖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要建立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为了掩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并严重警告他们：如果想分裂统一战线，想在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独吞抗日成果，顽固坚持这条反革命道路，那只能是自寻死路。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毛主席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这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互相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14页。

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以这个革命恰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领导是共产党，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彻底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叫嚣的“一次革命论”、“一个主义”的反革命实质。指出这种反动理论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阶段，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毛主席指出，绝不能因为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毛主席说：“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所宣扬的伪三民主义，是反俄、反共、反农工的反动的三民主义。国民党顽固派“一个主义”的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面目。

毛主席在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基础上，为我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毛主席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成明确系统的公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指引我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应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容许富农经济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发展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思想进攻，剥夺其精神武器，毛主席在文章中着重阐明了革命文化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深刻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10页。

线。而“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的代表，就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人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著作。它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武装，从根本上粉碎了他们在思想战线上对我党的猖狂进攻；它打破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同时它也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大大加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又是一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精辟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创立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学说，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世界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

【毛主席发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党在政治、军事、思想上的一系列斗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并没有改变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政策，投降危险依然存在，国内时局尚未根本好转。然而由于日军深入国土，全国人民都主张团结抗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党的任务，就是继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要实现这一任务，党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

但是，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又产生了“左”的倾向，并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他们对中日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表示怀疑，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动摇。他们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新的“马日事变”，以为国共合作很快就要破裂，以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不去注意团结中间势力，不去努力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则反对斗争，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为了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全面阐述党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毛主席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十二月又写了《论政策》的极端重要指示，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政策。

毛主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①但决不能象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那样，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政策；也不能象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那样，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策。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为了更好地实行这一政策，毛主席对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进行了阶级分析，并在区别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党在国内各阶级关系方面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③

第一，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力量，超过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去放手扩大人民军队，广泛地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工、农、青、妇、儿童等群众运动和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统一战线中的基本力量，只有发展了他们的力量，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起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为发展进步势力不仅要和日寇、汉奸作斗争，而且还要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

第二，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

①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720页。

②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721页。

③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703页。

绅和地方实力派。在当时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因为他们有较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要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能取得胜利。

第三，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因为他们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反共投降政策作坚决地斗争。只要我们斗争策略得当，就有可能达到限制他们实施反共政策的范围，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就有可能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他们。同时也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中，避免大内战的爆发。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不可分的三个环节，而以发展进步势力为主，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①

同顽固派斗争，必须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的策略，并认真执行这样的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而且应利用顽固派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先打击之。这是斗争的局部性。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703页。

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721页。

第三，是休战原则。在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在他们举行新的斗争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使顽固派以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向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可以争取时局走向好转。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毛主席还规定了关于政权、土地、除奸、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方面等具体政策。

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具体政策，充分体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的结合，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它进一步纠正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使党在极端复杂环境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紧紧地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抽调它的主要兵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但是，由于我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及时纠正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产生的某些“左”的倾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因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华北晋察冀、晋

冀鲁豫、晋绥、山东四个大抗日根据地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都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还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展开了英勇地反“扫荡”斗争，并在岔口、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日寇阿部中将，敌人不得不发出哀鸣：“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到一九四〇年底，已发展为包括晋、察、冀、热、辽五省各一部，面积八十万平方里，人口二千五百万的广大解放区。

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建立了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一九四一年，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根据地扩大到西起同蒲、汾河，东至渤海，南靠黄河，北沿正太、沧石路，总面积约六十九万九千平方里，人口约二千五百余万的广大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二月，建立了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全面积为三十三万一千平方里，人口三百二十余万，是支持华北抗战和屏障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底，成立了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作为山东最高的行政机关。全区包括津浦路以东之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及河北、江苏两省各一部分地区，总面积六十万平方里，人口二千九百余万，成为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联系的枢纽。

华中抗日根据地：我华北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将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中。我华中军民坚决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攻，打开了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经过两年多对日寇的艰苦作战，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包括江苏绝大部

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河南、浙江一部分及湖南一小部分的广大国土和人民，迅速建立了淮南、淮中、苏南、苏北、苏中、皖中、鄂豫皖、浙东等抗日民主政权，总面积一百二十余万平方里，人口六千余万。

华南地区：自广州失陷后，广东党组织在广九铁路两侧的惠阳、淡水、宝安、东莞一带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二月，海南岛被日寇占领后，党组织游击队和汉、苗、黎各族人民联合抗日，由不到二百人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建立了琼崖抗日根据地。以后这两区人民武装，合编为华南抗日纵队。

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战斗二万多次，仅在华北战场，就毙伤日军十二万五千多人，伪军六万多人。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战斗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八路军、新四军由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五十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在广大敌后战场上，人民武装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抗日战争已真正成为全国范围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〇年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上升的阶段。

正当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时候，彭德怀追随王明路线，发动了在政治上是投降主义、军事上是冒险主义的“百团大战”。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彭德怀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等右倾投降主义口号下，利用职权，擅自调动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万人，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面出击，发动“百团大战”，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

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攻坚战。这次战役虽经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给敌伪一定打击，但由于在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指导下，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而使我军付出二万余人的重大代价，完全适应了日本侵略者寻找我主力决战的要求，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奸计，所以在战役进行中，蒋介石就对彭德怀“特电嘉奖”，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为国民党卖命。由于“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所以“百团大战”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集中力量进攻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对我们抗日根据地也更加仇视和害怕，加紧实行军事包围、封锁和进攻。“百团大战”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

四、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一九四〇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非常猖狂的时期。一九四〇年秋，希特勒占领了大半个欧洲；九月，德、意、日三国签了继续扩大侵略、重新瓜分世界的军事同盟，日本与英、美的矛盾尖锐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寇的欧洲攻势，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南取太平洋，北攻苏联，在疯狂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美国这时仍然企图牺牲中国，与日妥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反共投降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积极准备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军阀李宗仁、韩德勤等在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向新四军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新四军。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摩擦活动，毛主席和党中央多

次指示全党要提高警惕，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却借口“江南特殊性”违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坚持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否认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发展新四军，一切迁就国民党。他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作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任何准备。针对项英的错误，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又一次给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毛主席还严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实行反共投降政策的时候，我们应当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法，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①

这个指示下达后，东南局委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负责人陈毅同志坚决地执行了，而项英却不执行，对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等，诬蔑我新四军破坏团

^①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713页。

结和抗战，并无理强令新四军在一个月內全部撤至黄河以北，阴谋在我军行动中，进行围歼。十一月七日，党中央和毛主席以朱德总司令和叶挺军长的名义，发出通电，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愿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开赴江北，使党在政治上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与此同时，毛主席多次电令项英提高警惕，认真准备渡江北移，并强调了不走国民党的指定路线。但项英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皖南部队一万多人，按照国民党指定的路线开始北移。一月七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蒋介石早已埋伏好的八万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这紧急时刻，项英又惊慌失措，把希望寄托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上，以至丧失了突围的时机。虽经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地与敌人搏斗了七昼夜，但终因路线错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项英本人亦为反动分子所杀。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阴谋得逞后，又于一月十七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面临空前危机的严重形势下，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继续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日战争，并准备抵抗亲日派的进攻。一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联合“剿共”的全部罪恶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并在谈话中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十二条，作为全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行动纲领和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毛主席严正地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续继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①同时也给蒋介石留有余地，他们如能实行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之下，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展开了广泛群众性的抗议运动。解放区广大军民坚决支援新四军的斗争，随时准备增援新四军。一月二十九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正式重建，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并在八路军支援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得悉“皖南事变”后，立即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刊登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掩盖皖南事变真相的阴谋。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倒行逆施、消灭异己、破坏团结的行为。很多中间党派人士，开始时劝我让步，这时也转为支持我党反击的立场。蒋介石在政治上空前孤立，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妄图用诱骗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734页。

我党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办法，减少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我党针对这种情况，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并于三月二日，提出立即停止在全国向我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在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人员等第二个十二条，作为解决时局的临时办法和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我党的严正立场，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策略方针的胜利。毛主席总结这一次斗争经验时指出：“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①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②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粉碎，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四军由原来的十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五千人，华中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其它中间派利益和要求的党派，也开始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于一九四一年十月，正式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从此，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共产党声望空前提高。

^① 《关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740页。

^② 《关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741页。

第三节 党为坚持抗战、巩固解放区的斗争。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的发表

一、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到来和党关于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

【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到来】一九四一年是法西斯势力甚为猖獗的时期。六月，希特勒德国挑起了全面的侵苏战争。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夺取了英、美、法、荷等国在太平洋的很多殖民地。整个世界都卷入到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空前巨大的战争之中。

国际上法西斯的一时横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以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时更加强调推行其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相结合的“总力战”，妄图进一步灭亡中国。在华北，日寇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战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对各区施以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紧其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修筑封锁沟墙，平毁村庄，制造无人区，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散布鼠疫病菌，施

放毒气，使解放区人畜不留，庐舍为墟，企图根本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仅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就有一百七十四次，比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的总兵力达八十三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一倍。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五万兵力和七万辆汽车，“扫荡”我冀中根据地的八千个村庄，人民被杀害和抓走的共有五万多人，其时间之长，兵力之多，手段之残忍是空前的。在华中，敌人则搞极端残酷的军事、政治、文化、特务一体化的“清乡”活动，妄图消灭新四军。

这时，国民党反对派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暂时得势的鼓舞下，反共投降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一面调动七十多万军队包围封锁解放区；一面又秘密指使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在日寇指挥下进攻解放区。这期间，先后有二十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五十八个高级将领和五十万军队投降敌人，占伪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这样，直接进攻解放区的伪军就由一九四〇年的二十二万，骤增到一九四二年的五十五万人。

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新投降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它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招引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解放区的更加疯狂的进攻；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更加助长了其反共投降活动。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的情况，八路军新四军由一九四〇年的近五十万人减少

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十多万人，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人口也从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以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毛主席在叙述那时的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

【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面对着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坚定的指出，反动势力的猖狂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们的困难也只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我们彻底发动群众，执行正确的政策，就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为了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持久抗战，党制定了各项政策。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普遍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即在政权机构中，贯彻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原则。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专政的政权。一九四〇年三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写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即提出“三三制”原则。从一九四一年起，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普选运动，选举了各级政府。“三三制”原则的实行，调节了根据地内部各阶级的关系，增强了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的团结，有力地支持了对敌斗争。

^①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847页。

开展减租减息，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继洛川会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之后，一九四二年一月，党中央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规定了这一政策的原则及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办法，并要求各地克服右倾观点，普遍、认真、彻底地贯彻这个政策。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各解放区还进一步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通过这一斗争，削弱了封建势力，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确立了农民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改善了农民生活，激发了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从根本上巩固了根据地的政权。

实行精兵简政，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精兵简政政策，实质上是解放区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它可以使战争机构变得精干、扎实，能够更加敏捷有力地去战胜敌人，并且还可以使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效用，减轻人民的负担，克服物质上的困难。

实行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日寇对根据地残酷扫荡和封锁情况下的迫切要求，是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的重要保证。因此，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这个决定的实行，加强了党的领导，在“一切服从战争”的最高原则下，极大地统一了各解放区和各种组织的步调，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

除此之外，党中央还制定和实行了加强对敌斗争、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等项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它是推动整个工作继续前进，战胜日寇和国民党进攻的中心环节，是巩固解放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二、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献的发表

【延安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毛主席领导全党抓住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定，我党已经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壮大。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②这是党的基本情况。

但是，党内还存在着问题，就某种意义上说，问题还是

^①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1007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69页。

相当严重的。这就是对于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危害最大的王明路线的错误，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清算。王明始终坚持他的错误路线，一九四〇年三月，又公然再版了他的臭名昭著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继续危害广大党员。过去机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不正之风，还在经常作怪，危害革命。

同时，抗战以来我党吸收了约七十万新党员，他们中间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高度的革命热忱，但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还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许多党员还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这就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错误路线，并往往成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活动的市场。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

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揭露了“左”右倾机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32页。

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为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党有一批久经锻炼的，有两条路线斗争切身体验的坚强骨干，为延安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同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我军在敌后已站住了脚，总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有可能胜利地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九月，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肯定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这一时期中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路线错误，并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这是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三月，党中央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康生同志为副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的指导机关。六月，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于是各解放区都先后开始了整风运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形成了全党学习和自我改造热潮，这是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的阶段。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党中央又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和讨论了党史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时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地参加了整风运动的领导工作。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和讨论，对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彻底的清算，大大帮助了全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正如周恩来同志当时指出

的：“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一九四四年四月，毛主席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对讨论作了总结。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作了正确的结论。至此，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著作，是指导这次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①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②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也是我党一贯遵循的思想原则。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③

为了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学风。毛主席指出，主观主义有两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0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1页。

③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753页。

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出发，他们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使理论和实际分离。经验主义者只相信其局部的、片面的经验，并认为是普遍真理。他们固步自封，满足现状，把自己的经验奉为至宝。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本质却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的。在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中，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它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

学风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是密切联系到政治路线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论的基础。毛主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周密地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正确地提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不断战胜并克服党内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才使我党和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毛主席为全党树立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光辉典范。与此相反，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的主观主义学风，必然导致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当他们的认识超越于客观实际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当他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时，又会表现为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一伙，自称

“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却从来不实行马克思主义原则。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反对搞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把它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两种学风的斗争，实质上是思想和政治上的两条线路的斗争。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

为了揭穿党内假马克思主义的伪装，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主席对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给了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以锐利的武器。王明之流妄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不过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璜门面，掩护他们的谣言和诡辩，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以便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②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提高全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力，及时揭穿机会主义路线有深远意义。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758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85页。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毛主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毛主席号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毛主席并指出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具体道路，就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并教导全党：“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③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④这种宗派主义在党内表现为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向党闹独立性的本位主义；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的个人主义；以及在党内相互关系上自以为是，互不尊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分散主义；在党外关系上表现为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不愿意和人家合作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对党的危害极大，“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⑤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3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760页。

③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85页。

④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83页。

⑤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9页。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队伍里是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党内历次重大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形成的党内的团结、党与人民的团结，是战胜任何强大敌人、任何艰难困苦的无价之宝。而党的团结，又是团结全国人民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①一切阶级敌人最害怕革命队伍的团结，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钻到党内施展种种手段来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如王明、张国焘之流，为了推行他们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在组织上搞分裂主义，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搬进共产党里来，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拉山头，结死党，组成小集团，进行派别活动。他们极不老实，搞阴谋诡计。但是，凡是反对毛主席团结胜利路线，坚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都必然要失败，绝没有好下场。

为了克服宗派主义残余，毛主席号召“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②必须根据这一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党，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同地方干部之间、老干部同新干部之间、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党内和党外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党在团结全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56页。

^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79页。

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才能使我们党队伍整齐，步调一致，以利战斗。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毛主席在批判王明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时，尖锐地指出，对党八股“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①

毛主席为了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腐朽文风，用极生动和鲜明的语言概括了它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危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是一切机会主义头子的腐朽文风的共同特征，完全暴露了他们哲学的贫困、思想的空虚和政治上的反动。因此，要使革命精神得到发展，必须废止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整风运动中，在毛主席领导下，正确地进行了党内斗争。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主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

“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90页。

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①毛主席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干部按照毛主席这个方针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了认识，达到了团结，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个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象这样大规模地、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我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从整个整风运动来看，全部的学习过程，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同时也是全党日益团结、日益巩固的过程。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总结这次整风的成绩时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②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路线觉悟大大提高。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785—786页。

②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48页。

提高了，分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团结起来了，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顺利贯彻，这就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思想条件。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我们党内斗争的实际经验创造的适合党内斗争和思想教育的最好形式、最完善的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光辉贡献。

【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解放区的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伟大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有着严重的反映。王明路线在文艺界的代表周扬，一九四一年七月抛出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毒草，鼓吹“暴露文学”，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抵制和破坏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在他煽动之下，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托派分子一齐向党进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大毒草纷纷出笼。他们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干部和群众，把延安描写的漆黑一团，掀起一股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逆流。毒草一出笼就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并大量翻印作反共宣传材料。另一方面，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统治区来到延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虽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还没转变，他们好大、喜

洋、复古，脱离实际，看不起工农兵，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对待党的文艺事业。这说明文艺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两条文艺路线的矛盾和斗争是很严重的。文艺究竟应该为谁服务？又应该如何服务？就成为当时文艺界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在文艺界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进行一次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亲自出席会议，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这两个问题为中心，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路线。

第一，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刻地系统地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问题。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究竟是为千百万工农兵，还是为一小撮剥削阶级？为无产阶级，还是为资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同资产阶级文艺的分水岭；是马列主义文艺路线同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毛主席发展了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要为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服务。

第二，毛主席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这就是要正确解决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等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有鲜明的阶级性。毛主席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艺术家的基本任务。”只有这样，文艺才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强大工具，才能达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

第三，毛主席在《讲话》中，系统地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深入工农兵群众，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道路。毛主席指示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使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种立足点的转变，思想感情的变化，也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是正确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关键。

第四，毛主席在《讲话》中，全面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特别是严厉地深刻地批判了

周扬一伙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毛主席批判了“人类之爱”的反动观点，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毛主席的批判，揭露了周扬一伙的反动面目。他们鼓吹“人性论”，是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和蒋介石的“溶共”政策效劳的。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伟大著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它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批判旗帜，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它对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这部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战斗纲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仍然是我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在毛主席《讲话》的指示下，解放区文艺界整风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路线，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创作了广大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秧歌舞《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陕北翻身农民李有源还创作了著名的歌曲《东方红》。开创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新局面。

三、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毛主席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斗争，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毛主席、党中央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整风运动的同时，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毛主席所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就是当时党领导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是解放区军民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毛主席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要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他解放区要做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毛主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②在这里，毛主席既批判了忘记

①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917页。

②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46页。

发展经济，企图从单纯节约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陈旧保守观点；又批判了不顾具体条件和客观实际，而妄想搞大工业计划的冒险观点。指出：“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国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①

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当时解放区的具体情况，党和毛主席又制定了领导生产的一系列的方针和办法：（一）根据农村人力物力分散的特点，在生产和供给上规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样既保证了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又发挥了各地区各单位的积极性；（二）根据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军民需要，提出发展经济必须采取以农业为主的方针。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工业手工业才有发展的基础，才能用农产品换回所必须的工业品，才能同敌人进行斗争；（三）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的方针，使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所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既满足机关部队的需要，又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使军民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一方面批判了不顾抗日战争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人民那里取得税收。我们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样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

^①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46—847页。

战争；（四）在发展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农民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规定在农民自愿互利原则下，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劳动组织，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毛主席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日胜利的必由之路”^①；（五）组织部队、机关进行生产。毛主席号召全体军民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各级党政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要参加生产同群众相结合，并要学会组织群众生产的本领。这些具体方针和办法的制定，充分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是陕甘宁边区，接着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于一九四二年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便发展成为普遍的运动。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机关、学校首先行动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参加开荒生产劳动，给解放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八路军、新四军是大生产运动中的突击队。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八路军三五九旅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于一九四一年开进了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战天斗地，做到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不到三年，开荒二十六万亩，把荒原变成了万顷良田的陕北“江南”，不仅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品的全部自

① 《组织起来》 《毛泽东选集》第886页。

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上交公粮就有一万大担（每担二百五十斤），取得了极其光辉的成绩。广大农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以及某些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就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强了集体观念。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开荒达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有的地方达到“耕三余一”。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全边区国营工厂发展到六十二个，职工由原来的不到百人发展到近四千人，年产土布十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军火等。边区生产的发展，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而且使全体军民的生活有了提高，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敌后各解放区军民，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在频繁的反“扫荡”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九四三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六个地区，就扩大耕地六百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两三个月的自给，蔬菜做到全年自给，达到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胜利，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经过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和国民党的封锁，度过了难关，而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军民的生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经过大生产运动，密切了军民关系、干

群关系、军政关系，培养和锻炼了干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积累了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

由于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和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国人民终于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四、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猖狂进攻的英勇斗争

党为坚持抗战、巩固解放区，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同时领导解放区全体军民，为粉碎日寇的残酷进攻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军事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针对敌人烧杀抢的“扫荡”政策，党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了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普遍发展群众武装，并使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密切结合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各解放区把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并相继建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统一领导对敌斗争，进一步贯彻了人民战争的方针。

在晋察冀边区：一九四一年八月，敌人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集中十万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扬言四个月内将我军消灭于长城两侧。但在我军民英勇抗击下，到十月中旬，我军毙俘敌伪军八千多名，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协同作战的配合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这次反“扫荡”战中，在易水河畔的狼牙山，我一个班凭险阻击二千多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剩下五名战士，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面对凶恶扑来的日

寇，齐声高呼：“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不当俘虏的！”纵身跳下悬崖，表现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寇以五万兵力对冀中进行“全面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主力。但在敌人合击时，我冀中军民创造了“三击”（迎击、侧击、尾击）。“三速”（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和地雷战、地道战等人民战争的作战方法，使进入解放区的敌人，如同陷入天罗地网，寸步难行，到处都有死亡的危险。这些创造成为平原游击战争得以坚持的重要条件。经过两个多月极其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共打死敌坂本旅团长以下八千多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同一时期，晋冀鲁豫军民进行了著名的交通破击战，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粉碎了敌人五百多次“扫荡”；山东解放区军民，在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晋绥边区军民，在两年中共进行了三千多次战斗，毙伤敌伪三千余名，击退了敌人的“扫荡”。

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反“蚕食”斗争。在面对敌人点线的正面，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组成联防线，随时给敌人以坚决打击，逼其撤走；在敌人点线后面，则以武装深入，发动敌占区人民起来斗争，使之腹背受敌，顾此失彼。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小而精悍的军队、政府、人民一元化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武装工作

队。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活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对敌伪组织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死心塌地的特务汉奸，分化瓦解敌伪人员，建立小块分散的抗日基地。敌后武工队在反“清乡”斗争中是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他使得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完全破产，“治安区”永远不安。

与此同时的华中军民也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坚持了华中的敌后抗日战争。

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全党和全体军民在斗争中实行了伟大的人民战争，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粉碎了日寇的野蛮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四万二千二百零五次，毙、伤、俘日伪军三十三万五千余人，保卫了根据地，坚持了抗战，逐步扭转了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严重的困难给予我们党和解放区军民巨大考验和锻炼。“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工作”，^①并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解放区的面积虽然暂时缩小了，但是内部却更加巩固和团结。人民军队数

^①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897页。

量虽然减少了，但战斗力却获得空前提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一时期是中日两国力量“转变的枢纽”，中国人民战胜了困难，“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第四节 党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发表

一、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解放区的恢复、扩大和局部反攻】一九四三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消灭了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三十三万人，迫使德寇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法西斯首先宣布无条件投降，法西斯联盟迅速土崩瓦解。一九四四年，苏联红军把德寇赶出了苏联国土，并进入德国境内，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也赶走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自己的国土。这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抢夺反法西斯胜利果实，乘势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洲，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人民抗日斗争，也日益发展。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胜利发展中。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胜利发展的条件下，中国抗战形势也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一九四三年，我解放区军民

继续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使解放区不断恢复和发展，使我党和人民力量由下降阶段转向再上升阶段。这时我解放区面积扩大了，解放区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人口）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九十万。从一九四四年起，各解放区军民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获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对敌作战共二万二千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六万多人，俘虏敌伪军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三万人，收复县城十六座，攻克据点五千多处，收复国土八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二百多万。到一九四五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的主力已经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党员达一百二十一万人，并建立了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的十九个解放区。这时仍被日寇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大部分海岸线，也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中，为全面大反攻准备了条件（见附图六）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在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势力却日益削弱。他为了坐享其成，捞取胜利果实，为了消灭人民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遂于一九四三年春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疯狂地鼓吹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叫嚣两年内决定中国之命运，即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舆论准备。六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托派汉奸张涤非召集了十分钟的九人会议，以所谓民众团体的名义通过一纸“电文”，叫嚷

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中国共产党应该“解散”，陕甘宁边区也应该“取消”。蒋介石吹起一阵风，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吹鼓手彭德怀就在党内掀起一层浪。同年四月，他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非常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陈词滥调，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投降口号。继“百团大战”之后，再次为蒋介石撑腰。

在新投降主义的配合下，蒋介石加紧了军事部署。六月底，他把胡宗南指挥的担任河防的另一个集团军调来，加上原有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共计五十万人，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并于七月七日和九日炮击我关中分区，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

我党对蒋介石的这一罪恶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七月十二日，毛主席发表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周恩来同志也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反共叫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严正指出：应该取消、应当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党中央还陆续发表了《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况》、《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活动的一笔总帐》等材料，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同时毛主席写信严厉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错误。毛主席指出，在各根据地必须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对反动分子，不是民主、自由太少，而应强调镇压的必要，对于敌人不是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而是必须实行“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原

则。毛主席的信及时唤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警觉。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边区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准备随时严惩一切敢于来犯的反动派。各解放区也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发通电，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全国人民也都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由于我党的揭露和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及全国人民的反对，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其反共军队无机可乘，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边区的军事进攻，使这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

【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美帝国主义为了在敌后取代日本独占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扶植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期通过对这个政府的控制，达到其发展侵略势力的目的。美国以大量贷款援助国民党政府，从一九四二年到抗战结束共达十三亿七千万美元；派遣大批“专家”、“顾问”，控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部门以及特务组织；派遣大批军官来训练和武装蒋介石的军队，在日本投降前，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了二十个美式机械化师。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公正”面孔来“调处”国共关系，其实质是企图帮助国民党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扑灭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实现独占中国的罪恶阴谋。一九四四年九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在重庆阴谋活动两个月后，十一月到延安。开始，他假惺惺地表示赞同我党提出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可是不久他回重庆后就撕下了假面具，暴露出他同蒋介石完全一致的反动立

场。他们要中国共产党首先把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交给国民党，或者组织一个由美国人主持，国共两党各派一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人民军队，然后国民党再给共产党“民主”，“邀请”某些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他们企图以此恶毒手法来完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所谓“统一”和“民主化”，以便打消人民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消灭人民的军队和解放区。当这个罪恶阴谋被我党揭穿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则发表声明，公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这就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政策的反动面目。毛主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①

美蒋反动派的进一步勾结，使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腐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出现严重的危机。在政治上，蒋介石继续坚持内战和独裁政策，并不断强化其法西斯的统治机构。一九四三年又成立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主任，以美国特务为副主任的庞大特务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比比皆是，到处囚禁和残杀大批共产党员、抗日青年和民主人士，对人民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在经济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打着抗日招牌，利用军事政治特权，对全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迅速地发展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行资本。他们采取“统制”、“调整”等手段，垄断金融商业，兼并民族工业，使得工人大批失业，仅重庆

①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1015页。

一地纺织工人，在一九四四年就有四万多人失业。国民党还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国民党实行所谓“田赋征实”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农民饥寒交迫。仅河南省一九四三年饿死和逃亡的人就达五、六百万。在军事上，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使它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一九四四年，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援救其在南洋的孤军，只调动十万兵力向国民党战场发动进攻，国民党近百万军队望风溃逃，在八个月中就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使六千多万同胞陷于日寇的奴役之下。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性充分暴露，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造成了“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

一九四四年五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责国民党排斥异己、拒绝民主的专横态度。六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柳亚子等倡议，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主张立刻动员民众，坚决抵抗，鏖除抗战中的失败主义者。于是成都、重庆、昆明各界人士纷纷响应。重庆和成都的一些工商业家也发出了“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的呼声。特别是同年七月，河南桐柏、信阳等县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数万农民，为反抗国民党军队的勒索和抓丁而纷纷举行暴动，并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打垮了汤恩伯反动军队十三军。

我党及时领导了这一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我党代表集中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召开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

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我党这一主张，把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要求集中到政权问题上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海外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响应我党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不断举行罢工和起义，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重庆人力车工人为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八万多人，为抗议国民党特务枪杀电力公司工人的暴行，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在湘鄂川边、陕南、贵州等地成千上万的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残暴的抽丁征粮而发动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武装展开了激烈地搏斗。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昆明一万多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喊“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顽固地拒绝广大人民要求，反对任何民主改革，用“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实行宪政”等欺骗口号，来抵制我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时，他还阴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动路线。这说明“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①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

^① 《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926页。

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时局发展的关键。

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发表

在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党员人数比抗日战争开始时增加近三十倍。这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关系到全中国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大会，并作了极其重要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极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预见到抗战胜利后中国仍然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在国际上，法西斯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个历史的总趋势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但是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毛主席指出：在国内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因此，避免失败和取得胜

利的可能性充分存在，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但是，国民党仍然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正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内战的准备工作，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毛主席告誡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充分提高警惕，“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基于上述分析，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这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为了反对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毛主席总结了二十多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为我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这条政治路线，是争取抗战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这条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国家机器。毛主席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道路”的幻想，强调指出：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

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同时又指出，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应该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在目前，必须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为这个专政“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彻底废除这个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

这条政治路线又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个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建设新中国，没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是不可能的。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重点必须是壮大和发展人民军队与解放区。人民武装是人民力量的中心支柱。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严重情况，强调指出，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壮大和发展人民军队与解放区，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准备充分力量。其次，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主要是放手发动农民。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文化革命运动的主要对象。因此，对待农民的态度，历来是中国和反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也是我们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与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之一。为了充分发动农民，毛主席提出在抗战期间，我们党要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战后则要有步骤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彻底的土地改革。再次，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还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最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领导方针上必须做到真正“放手”，必须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不让我们放手，他们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和消灭人民军队，要取消解放区；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有手不敢放，搞投降主义。因此，只有同中外反动派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冲破他们的任何限制，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真正做到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人民力量。

这条政治路线还指明，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党的领导，就必须搞马列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主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党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吸取历史经验，必须谦虚谨慎，要团结，不要分裂，在党内和

全体同志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毛主席这些教导，是我们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论联合政府》这部光辉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党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宏伟纲领，也是揭露和声讨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战斗檄文，又是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锐利武器。它对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都起了决定的作用。同时，它还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根本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出了新的贡献。

大会还听取了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斗争的经验，阐明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战术原则，提出了我军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任务。

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尖锐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结果，是全党经过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党就受挫

折，就失败；跟着毛主席，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一日，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彻底革命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七大”路线，建立必胜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它标志着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与统一，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斗志昂扬地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三、解放区军民大反攻，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七月，解放区军民对日寇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夏季攻势，在各个战场上纷纷出击，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并打通了各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为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西方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寇宣战。八月九日，斯大林领导和指挥的苏联

红军，在长达四千余公里的广大战线上，对日寇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并在我抗日军民的积极配合下，迅速地击溃了关东军，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毛主席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一再提醒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八月十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进军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立即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八月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投降。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向日寇占领区，特别是各交通要道展开了大规模的进军。冀热辽等部队沿北宁路向东北进军，配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东北。晋察冀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进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军，解放了绥远、山西两省广大地区。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部队向津浦路中段

和胶济路进军，解放了山东一百零八县中的一百个县。华中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路和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军，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军，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日的两个月中，经过激烈的战斗，毙伤俘虏敌伪军二十三万余人，解放人民一千八百七十余万，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解放了三十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号称东方头号军事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①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人民军队从抗战开始的四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七万人，民兵二百二十多万人，解放区面积达一百零四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人。特别是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空前觉悟和团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这就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是以弱胜强的光辉典型。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只要敢于拿起武器，敢于起来斗争，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战胜任何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同时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并且必将影响整个世界，鼓舞和推动各国首先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

附表一：

抗日战争时期我抗击敌伪军兵力统计表

(1937年7月——1945年8月)

| 军别 | 全部侵华敌 (人) | 我抗击敌军 (人) | 占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比 | 我抗击伪军兵力 (人) | 占全部伪军的百分比 |
|------|-----------|-----------|-------------|-------------|-----------|
| 1937 | 500,000 | 500,000 | 100% | 0 | 0% |
| 1938 | 680,000 | 400,000 | 58.8% | 78,000 | 100% |
| 1939 | 860,000 | 540,000 | 62% | 145,000 | 100% |
| 1940 | 800,000 | 470,000 | 58% | 225,000 | 100% |
| 1941 | 610,000 | 460,000 | 75% | 348,000 | 100% |
| 1942 | 550,000 | 332,000 | 63% | 555,000 | 100% |
| 1943 | 600,000 | 350,000 | 58% | 735,000 | 90% |
| 1944 | 730,000 | 468,000 | 64% | 782,000 | 95% |
| 1945 | 1,088,500 | 758,700 | 69% | 955,782 | 95% |

附表二：

抗日战争时期我歼灭敌伪军兵力统计表

(1937年9月——1945年10月)

| 数目 项别 | 敌伪军 | | 敌伪合计 (人) | |
|----------|----------|----------|-----------|-------|
| | 敌 (人) | 伪 (人) | 敌 (人) | 伪 (人) |
| 毙 | 520,463 | 490,130 | 1,010,593 | |
| 俘 | 6,213 | 512,933 | 519,146 | |
| 投 | 746 | 183,632 | 184,378 | |
| 合 | 527,422 | 1186,695 | 1,714,117 | |
| 作战次数 | 125,165次 | | | |

附表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兵力逐年增长统计表

(以每年年底为准)

| 兵力 年别 | 部队 | 八路军 (人) | 新四军 (人) | 华南抗日 纵队 (人) | 合计 (人) |
|----------|----|------------|------------|-------------------|-----------|
| 1937 | | 80,000 | 12,000 | | 92,000 |
| 1938 | | 156,700 | 25,000 | | 181,700 |
| 1939 | | 270,000 | 50,000 | | 320,000 |
| 1940 | | 400,000 | 100,000 | | 500,000 |
| 1941 | | 305,000 | 135,000 | | 440,000 |
| 1942 | | 340,000 | 110,960 | | 450,960 |
| 1943 | | 339,000 | 125,892 | 4,500 | 469,392 |
| 1944 | | 507,620 | 251,393 | 20,730 | 779,743 |
| 1945 | | 1,028,893 | 268,581 | 20,820 | 1,318,294 |

注：抗战开始时红军为32,000人，日本投降时我军总数为1,270,000人。

附表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陕甘宁解放区制造摩擦事件统计表

(1938年12月——1940年10月)

| 次数 时间 | 性质 | 武装 进攻 | 抢劫 骚乱 | 拘捕 人员 | 暗 杀 | 反共 宣传 | 驱逐 人员 | 阻我 募征 粮工作 | 其他 破坏事件 | 总 计 |
|-----------------|----|----------|----------|----------|--------|----------|----------|-----------------|------------|--------|
| 1938.12—1939.10 | | 28 | 14 | 26 | 23 | 13 | 10 | 17 | 20 | 151 |
| 1939.11—1940.6 | | 64 | 38 | 6 | 2 | 7 | | | 7 | 124 |
| 1940.7—1940.10 | | 20 | 53 | 8 | 3 | | | | 6 | 97 |
| 合 计 | | 112 | 105 | 40 | 28 | | | 17 | 33 | 372 |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十月)

第一节 党为粉碎美蒋“和平”阴谋和反对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形势。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战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壮大，在东欧和亚洲东部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政治觉悟广泛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此相反，帝国主义力量大大衰落，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大国被打败；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大国被削弱；只有美帝国主义

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扩张了军事实力，但是，它的基础虚弱，外强中干，国内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火山一样，经常威胁着它。总之，战后的国际形势是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正如毛主席所说：“**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①

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战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严重而又复杂的。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维护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制度，凭借其一时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极力推行反革命的全球战略，妄图称霸世界。它一方面大肆喧嚣反苏战争，挥舞原子武器，不断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则在反苏战争的烟幕下，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扶植各国反动势力，猖狂地侵略和控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中间地带，镇压和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并梦想进攻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美帝国主义就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国际上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严重的反映。在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吓和各国反动派散播的美国“举世无敌”的舆论攻势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白劳德修正主义思潮又重新抬头，并形成一股右倾投降主义的逆流。美共叛徒白劳德，在一九四四年，就系统地抛出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歪曲时代的性质，认为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的发表，使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1080页。

会主义“长期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鼓吹国际范围的阶级合作。他美化美帝国主义，认为美国大资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能够“共存”，竭力否认暴力革命，主张改良。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于一九四四年五月，解散了美国共产党。战后，法修头目多列士、意修头目陶里亚蒂之流，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革命两手策略的战争讹诈和政治收买下，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议会道路”，推行一条交枪、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放弃武装斗争，甚至交出几十万人民武装，去换取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副总统、部长等一官半职，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战后的国际形势表明：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侵略活动敢不敢顶，对一切反动派采取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是否针锋相对的斗，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那种过高估计敌人，看不到人民群众力量，不敢斗争，取消革命，交枪、做官的投降主义路线，则是革命的主要危险。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壮大，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空前发展。党在全国获得极高威望，解放区的工作影响中外。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广大人民也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从来没有这样完备。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遵循“七大”制定的革命路线，正满怀信心地为夺取全国政权，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但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

战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仍要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不许有丝毫改变。美帝国主义认为，夺取中国是它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迫使它不敢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而采取了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又由于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困难很多，准备不够，而且还幻想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因此，他们又在“避免内战”的幌子下，玩弄“和谈”阴谋。

为了坚持独裁和积极准备大规模内战，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勾结美帝国主义疯狂地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八月十一日蒋介石连发三道反动命令：一是要包围敌伪的解放区人民军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许接受日伪军投降和收缴枪械；二是令躲在峨嵋山的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下山抢桃子；三是叫实行“曲线救国”的地下军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久，五十万伪军被蒋介石收编为抢夺胜利果实的“先遣军”。八月下旬，蒋介石更进一步命令日军帮助伪军向我军解放的地区大举进攻。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派出飞机运送蒋军三个军到内战前线。这样，就出现了蒋、美、日、伪大合流，篡夺胜利果实的局面。内战危险，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

战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表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和以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一场

尖锐、复杂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但是，当时在人民中间和党内的许多人中，对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及其内战阴谋，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认为打内战，“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幻想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策略，不敢斗争，幻想和平，并妄图出卖人民胜利果实，断送中国革命。

面对着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严重威胁，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投降主义逆流的泛滥，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是坚决保卫胜利成果，坚持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还是把人民的胜利果实奉送给蒋介石，继续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十分尖锐的重大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在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紧要关头，为了使党对复杂的局势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领导全国人民不失时机的去夺取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讲演。

第一，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战后国内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

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形势，分清敌友，丢掉和平幻想，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观点，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本性，强调了内战的危险性。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

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从历史上看，他在一九二七年篡夺人民胜利果实后，一贯与人民为敌，一贯发动和准备反人民的内战。抗战胜利了，他还想照样来干，使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反动派的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全面内战会不会爆发？这是全国人民迫切关心的问题。毛主席指出，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已经定了，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附庸的方针也老早定了。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但是力量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早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精辟地概括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实质。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里，毛主席清楚地指明：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国人民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焦点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在当前的集中表现是對抗

战胜利果实的篡夺和反篡夺。从而规定了党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战胜利果实，放手发展人民力量，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失时机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第二，毛主席提出了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

为了使全党能正确地认识和应付美蒋反动派不断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这就是对美蒋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恐吓，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坚决同敌人斗到底，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

针对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毛主席指出：“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为了自卫，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决不让国民党轻而易举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毛主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强调在坚持革命两手的针锋相对战争中，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打败美蒋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上，指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种迷信用政治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对于美蒋反动派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合法地

位”，“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政治圈套，毛主席认为，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同时又做好革命战争的准备。他强调指出：“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是“武化团体”。“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谁要想轻而易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骗去，那是办不到的。

第三，毛主席阐明了自力更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

为了增强党和人民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迎接严重的国内斗争，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自力更生，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力量来打倒反动力量，坚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一贯坚持的战略方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群众创造历史伟大思想的充分体现。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毛主席还深刻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外强中干的本质，反复强调不相信他们的“好话”和不害怕他们的恐吓。我们依靠人民的斗争，依靠小米加步枪，是一定能够打败中外反动派的。针对当时流行较广的原子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资产阶级错误观念，毛主席果断地指出：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问题，“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不相信人民群

众而迷信武器，是资产阶级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

第四，毛主席及时地教导全党要警惕和抵制右倾机会主义。

鉴于战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局势，修正主义逆流的出现，毛主席预见到右倾机会主义将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他再三提醒全党，要以陈独秀为借鉴，不要重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说：

“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

为了使全党同志增强抵制右倾机会主义侵蚀的能力，同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毛主席指出：必须坚持代表人民利益的立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必须坚持针锋相对的革命方针，坚决消灭敌人，陈独秀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必须坚决依靠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党应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的革命决心和信心；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些人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丢在脑后，是不可能正确观察形势，指导革命，不可能抵制机会主义路线的，甚至有可能被俘虏或同流合污。

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这篇著作在中国进入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关头，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运用和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战略策略的理论，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本质和手法，划清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制定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胜利的道路。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一切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论断，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并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策略思想，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坚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思想，坚决防止和抵制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述，以及贯穿于全文中的反潮流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性，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反对帝、修、反，反对投降派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党为粉碎美蒋“和平”阴谋和军事进攻的斗争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日本投降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同美蒋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反对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毛主席于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亲自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两篇评论，发了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郑重宣告只有解放区人民军队才有受降权利，彻底揭露了蒋介石的人民公敌的面目和挑动内战的阴谋，严正指出，对于独夫民贼的进犯，人民将给予坚决反击。同时，在毛主席指挥下，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一切敌伪地区积极进攻，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和敌伪军的顽抗，迅速扩大解放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从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

市和广大农村。

由于我党和广大人民坚决地反对内战，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他的诡计是：如果毛主席不去，就可以宣传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主席去了，他们就可利用和谈欺骗人民，争取时间，部署内战。

毛主席早就洞察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面目，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毅然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了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让步。毛主席还部署了各解放区的斗争任务，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①。针对党内已经出现的投降主义逆流，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说：“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②坚决依靠人民，才是出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等同志陪同下，亲自到重庆谈判。这一伟大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蒋介石对于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由我们

^{①②}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1052页。

提出，他只是消极应付，完全陷于被动。

谈判的过程，是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过程。谈判集中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我党坚决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主动作了有限度的让步。但是，国民党一再顽固地拒绝了我党的合理提案。会上的政治斗争是同会外的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从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加紧对解放区的进犯，妄想以此对我施加压力。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大量印发反动的《剿匪手册》，密令其部下“努力进剿”解放区。九月初，绥远国民党傅作义部，进攻察哈尔解放区，逼近张家口，我军起而自卫，将其击退，俘虏其大批官兵。九月下旬，国民党军阀闫锡山先后以十三个师的三万八千人，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十月初，解放区军民发动反攻，一举歼灭敌人三万五千人。这样，经过四十三天的会内会外斗争，在十月十日，蒋介石被迫同我们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他在表面上，承认了“坚决避免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国民党的“训政”，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但是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胜利地返回延安。十七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这次谈判斗争的意义和经验，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揭穿了敌人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国民党再要发动内战，

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报告指明了谈判后党的任务，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毛主席还深刻地阐明了形势发展的趋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党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政治协商会议，同美蒋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美蒋反动派不断向解放区进攻。自九、十月间开始，美国军队便直接在华北登陆，替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到十一月，侵华美军已达十一万三千余人。至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直接进攻或准备进攻解放区的已达八十万人，侵占我解放区城市三十一座。十月下旬，胡宗南部和孙连仲部二十余万人，沿平汉路侵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邯郸地区。我军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敌人一个军起义，两个军被我围歼，放下武器。整个战役，共歼敌七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民主运动，以昆明学生的罢课运动为标志，也开始高涨起来。这样，就使美蒋反动派发现全面内战仍未准备好，于是，他们又玩弄起新的和平欺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派马歇尔来华，演出一出调处中国内战是假，扶蒋反共是真的文明戏。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布置内战，表面上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的要求，

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对于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我党是洞悉其奸的。但是，为了揭露敌人，教育人民，争取中间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接着，我代表团提出必须在政协会议前无条件的实行停战。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被迫与我签订了《停战协定》，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以及青年党、国民党，代表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会议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国家政权和军队问题。国民党提出必须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实行政治民主化的反动主张；中间派有的对蒋介石的欺骗抱有幻想，有的则妄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代表国家来接受。我党坚决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阴谋，提出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必先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的民主政府。同时，对中间派的错误主张，也进行了批评和教育。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和平建国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虽然与我党主张距离尚远，但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完全的主动，使美蒋和平阴谋进一步遭到失败。

蒋介石一手签订停战协定，一手又发布作战密令，令其部队“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同时，蒋介石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二月，他指使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公然破坏

庆祝政协的群众集会，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社，制造反共反苏的游行。三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了推翻政协决议，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叫嚣。美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以“调处”为掩护，从各方面帮助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自日本投降起，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用军舰和飞机共运送了五十四万蒋军到内战前线，训练蒋军十五万人。装备蒋军四十五个美械师，并供给蒋介石大量军火、物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达四千三百六十五次，占领城市四十座。这样，就充分暴露了美蒋勾结，决心发动内战的反动面目，他们所玩弄的“和平”阴谋，也在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下，被彻底戳穿。

三、反对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党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

【反对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还在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利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作报告、写社论、发指示，散布和平幻想，美化美蒋反动派，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胡说：“全世界的和平建设阶段来了，不打仗了”，“中国抗战结束了，应该是和平建设”，“美国也不愿意中国打内战”。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二天，刘少奇就迫不及待地作了《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抛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少奇无视美蒋反动派积极部署内战，顽固坚持独裁的

严重形势，胡说：“全国武装斗争停止了”，国家民主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他极力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鼓吹议会道路，叫嚷“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不是靠枪杆子打冲锋，而是靠选票进城”，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要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自中央政府至区政府里都得去做官”，要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他认为“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实行转变”，主张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进行整编”，“成为国军”，“统一在国防部”。他还主张让国民党到解放区来办报纸，办通讯社，以至参加我们的政府。刘少奇的这条路线，就是要无耻地向国民党交枪投降，当官受招安，断送中国革命，妄图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它是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

毛主席对于以白劳德为代表的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和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早有警觉。抗战一胜利，毛主席就及时为党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领导全党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重庆谈判以后，针对国内外的修正主义散布的和平幻想和交枪投降逆流，毛主席严正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①告诫全党，国民党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只能是“**他来进攻，我们把他**

^①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1059页。

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①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顶住了国际上的“交枪”逆流，批判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谬论。

一九四六年四月，针对刘少奇之流和国际上修正主义者鼓吹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阶级合作”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一重要文献中，深刻地指出：在世界人民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与反动力量作坚决地有效地斗争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②这就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为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我党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毛主席亲自领导和部署了解放区准备自卫战争的各种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在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的情况下，“站

^①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1057页。

^② 《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1081页。

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①，为此，我党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抓紧时机，大力做好练兵、减租和生产三件工作，一切工作必须作持久打算，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各解放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各解放区野战军还建立和扩充了炮兵和工兵，调整了后方勤务工作。通过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我军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各解放区开展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斗争。根据抗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及时地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由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积极参军参战，极大地加强了解放区的武装自卫力量。与此同时，党还领导了解放区军民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整理了财政，改善了人民生活，保证了军队的供给，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做了物资上的准备。

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全国时局出发，十分注意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日本投降后，党中央相继派遣

^①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180—1070页。

大批干部和十万大军进入东北，领导人民消灭日伪残余，建立革命政权，创建根据地。鉴于蒋介石大举进攻东北的严重形势和东北斗争的艰苦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是认真发动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同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为此“**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在东北斗争中壮大人民力量，战胜敌人的唯一正确指导方针。但是，林彪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伙同彭真，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执行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害怕战争，幻想和平，留恋大城市，不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占领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军事上，他先是竭力夸大困难，消极避战，接着又集中主力，死保城市，硬拚消耗，大搞消极防御，当敌人向东北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又实行退却逃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多次严肃批评，才煞住了他的退却逃跑，稳定了东北的军事形势。以后，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得到了贯彻，使东北局势进一步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为解放全东北和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的这一系列斗争，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战胜美蒋反动派的进攻，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党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的斗争。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全面内战的爆发】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认为已经作好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准备，随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冒险的战争。六月二十六日，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从此爆发。从七月到九月，国民党军队又先后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这样，蒋介石就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

战争初期的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占着暂时的优势。他们拥有四百三十万人的军事力量，统治着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接受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又有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我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一百二十万人，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又被迫分割在十几块根据地里，装备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人

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土地改革刚刚开始，革命的后方还不够巩固。没有外援，一切依靠自力更生。敌我力量对比，人民革命力量显然处于劣势。

当时，蒋介石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占其总兵力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蒋介石依恃这一时的优势，狂妄地宣称，只要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并命令国民党军队在四十八小时内歼灭中原解放军，两个星期占领苏北，三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气势汹汹，猖狂已极。美帝国主义也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于八月十日宣布“调解”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美蒋反动派疯狂的武装进攻面前，在敌我力量对比暂时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进行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敌人的进攻，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当时，在人民群众中和我党内部有些人抱有怀疑和忧虑，他们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长期战争，认为反动派的进攻难于粉碎；一些好心的国内外朋友也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怕原子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更怀疑我们具有战胜敌人的力量，反对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

正当天空中出现乌云，中国革命处于关键的时刻，毛主席科学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英明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①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41页。

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①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暂时的因素；而人民解放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性质，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我们战胜蒋介石进攻的政治基础。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认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一九四六年八月，毛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从阶级本质和长远观点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虚弱性，阐明了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的历史规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代表了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社会力量，违背了社会发展

^①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

的方向，脱离人民、压迫人民是它的致命弱点，因而它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前途的，它一个时候貌似强大，但在矛盾的发展和斗争中，将逐步地向反面转化，最终必然走向灭亡。人民革命力量代表了新的、向上的、进步的力量，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前途，它一时看来还很弱小，但必然会在斗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毛主席以生动的例证说明了一切反动派的虚弱本质，指出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曾强大一时，但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最后被人民所打倒。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它们坚持与人民为敌，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在政治上极端孤立，失道寡助，也将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和一些人的“原子恐惧症”，毛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最后将证明，中国人民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毛主席强调指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主席还阐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

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在战略上，整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它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如果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它们，不敢胜利，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又要看到敌人是活的铁的真老虎，是很凶恶的，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必须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集中全力作战，以便逐步地孤立和消灭敌人，不这样，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批判和扫除了党内外的右倾悲观论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伟大的作用。同时，也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敢和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鼓舞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列宁在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基本矛盾之后，把垂死腐朽的帝国主义看做“泥足巨人”或“空架子”。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经验的概括。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本质的深刻分析，正确估计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对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革命策略辩证统一的阐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毛主席关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解放区军民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毛主席关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根本上转变解放战争的军事形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毛主席先后写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对党内的指示，为党制定了一整套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

在政治上，毛主席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①在农村中，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同时，对其他阶级和阶层应区别对待。在城市中，除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毛主席制定的政治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用人民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的进攻。

在军事上，毛主席明确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毛主席及时地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改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

^①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

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①强调了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的必要性。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中心要求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②“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③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最充分地补充自己，才能沮丧敌人，振奋自己，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使我军由局部的优势改变为全局的优势，直到最后彻底消灭敌人，获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制定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对于扭转战争形势，打败蒋介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① 【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被粉碎】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领导各解放区军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作战方针，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改变了战局。

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的头四个月，是敌人全面进攻的高潮。我军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战机，主动地撤离了一些城市和地方，换取了大量歼敌的胜利。六、七月间，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领导下，主动地作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极大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作战。七、八月间，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在粟裕等同志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在苏中连续打了

①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

②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095页。

③ 同上，第1094页。

七仗，七战七捷，歼敌五万余人。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指挥下，前后三个月中，共歼敌九个旅，近五万人。此外，我山东、晋察冀、东北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都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总计这四个月的作战，敌人虽占领我承德、张家口、淮阴、荷泽等一百五十三座城市，但我军收复城市四十八座，歼敌三十三三个旅，近三十万人。使蒋介石战线太广与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能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为了维持全面进攻，不得不把原定守备南京、上海、武汉和海南岛、台湾等地的部队抽调出来。十月，蒋军攻占张家口以后，全面进攻的高潮便开始下降。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又四个月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华东解放军，在陈毅、粟裕等同志领导下，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进行的莱芜战役，就是执行毛主席作战方针，克敌制胜的光辉一例。当时，敌人集中三十一万兵力，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叫嚣“国民党胜败全系鲁南一役”，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我军则除留一部兵力在南线阻击敌人外，主力部队毅然放弃临沂，大踏步地北上，在莱芜地区，一次歼敌七个整师，共六万多人。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晋绥等战场，我军也取得多次胜利。这个时期，敌我双方城市的得失各为八十七座，我军歼敌四十万余人。总计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八个月中，我军共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七十一万人，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每月歼敌八个旅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破产之后，由于兵员大量被歼，战线延长，士气下降，后方空虚，在几个战场上失去了主动，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我解放区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为挽救其垂死统治，纠集胡宗南所部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兵力，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逼迫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①，并决定“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②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二万多人，在优势敌人面前，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我军在延安以南抗击战中歼敌五千人以后，于三月十九日主动撤离延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继续在陕北，领导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时与毛主席一起转战陕北的还有周恩来等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留在陕北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我军撤出延安后，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依靠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等有利条件，采用“蘑菇”

^{①②}《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毛泽东选集》，第1117页。

战术，不断与敌人周旋，磨得敌人缺粮餓饭，精疲力尽，然后伺机各个予以消灭。三月下旬和四月间，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两次伏击战中歼敌七千多人。五月初，我军又诱敌主力北上，乘敌后方空虚之际，突然攻占敌军重要补给站蟠龙，再歼敌六千多人，并缴获大量物资。接着，我军又出击陇东和攻克三边，进攻榆林，歼敌九千余人。八月，沙家店战役，又歼敌精锐一个师。经过上述七次作战，共歼敌三万余人，终于粉碎了敌人在西北战场的重点进攻，并由防御转入进攻。

在山东战场上，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蒋介石先以二十五万兵力向我鲁中新泰，蒙阴地区进攻，妄图压迫我华东解放军至沂蒙山区而消灭之。我军英勇奋战，四月下旬，在泰安歼敌两万四千余人。五月，敌又一次发动对沂蒙山区进攻，我军在孟良崮一战，全歼蒋介石嫡系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经过四十天的整顿，六月底，又以二十四万人再次向沂蒙山区进攻，又被我军击退，七月，敌被迫由鲁中西撤。至此，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打退。

与此同时，我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相继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总计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的四个月作战，敌占我城市九十五座，我收复和解放城市一百五十三座，歼敌军四十余万人。

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我军共歼灭敌人一百一十二万人。毛主席在总结我军第一年作战时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

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①这个巨大胜利的取得，是解放军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充分发动了广大群众，实行了人民战争的结果。解放区农民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纷纷组织民兵和游击队，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就是英雄的一例。

三、蒋介石反动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中

十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危机】在战争的第一年，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遇到了严重危机。这是美蒋反动派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结果。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更加肆无忌惮地实行大掠夺，蒋介石也更加彻底地大拍卖。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先后同美国政府签订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卖国条约和协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最集中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卖国条约，把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权、海关权、商业权、内政外交特权，都出卖给美国。当时蒋介石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曾经公开无耻地说，这个条约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太上皇”，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①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125页。

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官厅买办资本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商品向中国大量倾销和走私，美货成了“美祸”。美国对华投资占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劫收”敌伪经济，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援，横征暴敛、滥发钞票、扩大垄断、大搞投机等手段，到一九四七年，官厅资本已发展到最高峰，集中了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富。在美国垄断资本和蒋介石官厅买办资本的联合压榨下，中国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农民日益破产，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空前高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从一九四六年秋到年底，国民党统治下的二十个大城市，工商业倒闭了二万七千余家。一九四六年上海市八十万产业工人中，有三十万人失业，占百分之四十。据一九四七年三月的统计，国统区农产品总产量，只有抗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以抗战前夜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物价上涨一千八百倍，而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则上涨为六万倍。法币一百元，在一九三七年能买三头牛，到一九四七年，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在美蒋反动派的统治下，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总崩溃的境地。

在政治上，国民党也陷入严重危机。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的当天下午，竟悍然下令单独召集反动的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伪国大正式开幕，通过了伪“宪法”。蒋介石玩弄这些

政治把戏，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孤立中国共产党，使他们的法西斯独裁“合法化”。但是，伪“国大”和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除了御用的青年党、民社党和一些无耻政客之外，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都反对和拒绝参加伪“国大”。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自己更加孤立。一九四七年一月，蒋介石政府由于军事进攻不断失败，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又施行新的骗术，要求和我党恢复所谓和谈。我党立即予以彻底揭穿，指出，恢复谈判必须实现两个最低条件，一是废除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宪法；二是国民党军队退出停战协定生效以后侵占解放区的一切土地，国民党政府看到“和平”骗术无法实施，就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限期撤退。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国共破裂，决心把内战打到底，在政治上走上了绝路。一九四七年四月，蒋介石又扮演了一出“改组政府”的丑剧。但是，这个由卖国老手、封建余孽、无耻政客拼凑起来的“多党”政府，只不过是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工具，一登场就颁布血腥镇压人民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立即暴露了它的法西斯面目。这样，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

【第二条战线的出现】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鼓舞下，随着蒋介石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政治欺骗的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在我党积极的领导下，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成为打败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

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起，以上海市民骚动和北平学生运

动为标志，出现了国统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十一月底，因国民党无故逮捕和杀害摊贩，上海爆发了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参加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同时，发生了上海八千工人、学生包围国民党警察局的事件。这一爱国行动，立即扩大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了极端野蛮的镇压办法。五月二十日，同时在南京和天津殴伤和逮捕学生百余人，造成有名的“五二〇血案”。但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没有被镇压下去。以“反饥饿、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迅速遍及六十多个大中城市。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到一九四七年，仅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几个主要工业城市，参加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帝暴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人数即达一百二十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农民为了生存自救，奋起反抗，抗征、抗捐、抗租和民变运动，遍及各地。一九四七年一月，四川、西康、浙江、湖南等十四省的民变武装发展到八十万。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斗争，使台湾大部分地区的反动政权，一度瘫痪，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

因，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象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击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打败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毛主席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①历史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第三节 党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第二年开始时，敌人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后方异常空虚，守备的兵力仅有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从

^①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1120页。

新疆到台湾十三个省的广大地区。由于师出无名，屡战屡败，士气低落，战斗力更加削弱，整个国民党反动营垒充满着失败情绪。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到一百万人以上。部队的装备由于大量缴获而大为加强。由于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壮大民兵，后方日益巩固。我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处于劣势，但能机动作战的兵力却多于敌人，处于相对优势。我军连战连胜，士气旺盛，人民拥护，整个解放区军民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决定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由防御到进攻的战略转变，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①毛主席还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先后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路，挺进大别山，揭开了大反

^①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126页。

攻的序幕。陈赓、谢富治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于八月下旬在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陈毅、粟裕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打破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从此，三路大军互为犄角，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全面防御的被动地位。

我军在外线进攻的同时，在内线作战的部队也先后转入反攻。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在胶东地区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下旬转入反攻。九月初，晋察冀野战军对平汉路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东北野战军也从九月初发动了秋季攻势。

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的半年中，我军经过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共歼敌七十五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全面防御的计划，迫使敌人采取了“分区防御”的方针。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攻势，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战略防御地位，转入战略进攻，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①

为了使我军的战略反攻发展为全国性的胜利，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毛主席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139页。

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布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八项基本政策。《宣言》的发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成为动员全国人民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檄文。

【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开展】革命形势的猛烈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入地普遍地实行土地改革，以便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支持革命战争。一九四六年党的《五四指示》发布以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到一九四七年初，各解放区都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党内出现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努力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右的倾向。同时，在斗争中暴露了有些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情况，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

为了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克服土改中存在的右的倾向，一九四七年九月，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适合全国农民要求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颁布实行。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样，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了《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的不彻底性。这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纲领。土地法大纲还贯彻了自下而上的放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与自上而下地由革命政府颁布法令，为群众运动撑腰，保障农民利益两方面紧密结合的方针。这就有力的反对了右倾错误，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

的彻底进行。土地法大纲的发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各解放区对地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高潮，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从而极大的巩固了解放区，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和发展生产的革命热情，这就使我党获得了战胜蒋介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源泉。

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迎接革命战争的更大胜利，根据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各解放区还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时，我们党已从抗战初期的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方面，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作风，致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这就迫切地要求整编党的队伍。

在整党运动中，党清除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不可救药分子，纯洁和巩固了党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二、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为了及时地制定党在革命新高潮时期的行动

纲领，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毛主席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充分估计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意义。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已经胜利在望，我们必须敢于胜利，必须肃清自己内部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依靠和领导群众，去夺取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各方面的经验，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在政治方面，毛主席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我党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坚持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使美蒋反动派完全孤立，党才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拥护。毛主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关键在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毛主席总结了我党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分析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强调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正是由于我党坚

持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才使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扩大和巩固，才使中国革命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伟大的胜利。毛主席提醒全党要牢记，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的历史教训。

在军事方面，毛主席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的作战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选择作战的对象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在攻城问题上是先打守备薄弱的，后打守备强固的。根据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毛主席提出作战的形式是“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为了不断地、大量地、有效地歼灭敌人，毛主席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要以俘获敌人的武器、人员、补充自己；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也是对付不了的。

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我军作战方法最完备、最科学的概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杰出贡献。也是对这个时期林彪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三三

制”、“四组一队”）的彻底批判。

在经济方面，毛主席着重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毛主席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为此，毛主席重申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针对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土地改革“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关于没收官僚资本问题，毛主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这一典型的垄断资本形态，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消灭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

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问题，毛主席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别，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能够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因此，“新民主主

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对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保护政策，而绝不允许重复王明“左”倾路线时期的过左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应当进行揭露和打击，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胜利实现，毛主席强调指出，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党内不纯问题。依据具体情况，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以加强党的领导。毛主席说：“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新中国的时期内，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是划时代的中国大革命的檄文，解决了中国革命伟大转变关头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使我党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潮时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和防止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各项工作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之上，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毛主席在报告中，对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精辟分析，对于统一战线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的深刻阐

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战略策略思想和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

三、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被纠正。

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

【刘少奇在土改、整党中形“左”实右路线的被纠正】
从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前后，刘少奇乘我党纠正土改中右的错误倾向的时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抛出了一条在土改和整党中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干扰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贯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团结中农、不许侵犯中农利益的指示，胡说：“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鼓吹土地一律“打乱平分”，提出什么“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在这种“左”倾错误影响下，许多地方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在农民代表和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提出要把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搞他个干干净净”，说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入工商业是“化形伪装”，“要搞垮”。他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的方针，煽动群众乱打乱杀。叫嚷“要杀就杀干净，杀他一家”，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改中不必要的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他在整党运动中夸大党内不纯现象，大搞“搬石头”，胡说“党内的封建最多”，提出“要把斗地主富农与斗干部结合起来”，把斗争锋芒指向广大党员和干部。他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极力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胡说土改、整党“不靠干部、政府、党”，“群众要怎样办

就怎样办”。在工作步骤上，他不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鼓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刘少奇的这条路线，破坏了党的土改、整党运动，破坏了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帮助了敌人，孤立了自己，形式上是“左”，实质上是右。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彻底克服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就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主席就对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提出了批评，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根据会议的讨论，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二、三月间，陆续发出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关于情况的通报》等一系列指示。四月一日，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这些指示和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①针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错误，毛主席强调说：“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②毛主席指示，对过去几个月的工作，要加以检查，以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保证整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

① 《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1192页。

②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第1176页。

利。为此，毛主席一再告誡全党，必须认真注意政策问题，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①“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②

在这些指示和报告中，毛主席从各方面批判和清算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针对刘少奇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毛主席反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③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了成份的，应一律改正；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容许他们保有较高于一般贫农所得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但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是错误的；为了正确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党中央重新公布了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在农会和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毛主席还明确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④

①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181页。

② 《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1193页。

③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164页。

④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1163页。

针对刘少奇侵犯工商业的冒险政策，毛主席再次重申，应当“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①，“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②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地主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绅士，应该在反对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拥护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

针对刘少奇在镇压反革命中提倡乱打乱杀的错误行径，毛主席一再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③除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应予镇压外，“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④

针对刘少奇大搞“搬石头”的错误做法，毛主席强调指出，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必须

①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180页。

②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164页。

③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166页。

④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166页。

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除了少数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分子以外，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针对刘少奇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极力鼓吹群众的自发运动的错误，毛主席指出：“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① 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就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针对刘少奇在工作步骤上的冒险主义，毛主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② 土地改革工作要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有步骤地、有分别地展开斗争。

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倾向，就必须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③ 并告诚全党：“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5页。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3页。

③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11页。

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①

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了正轨，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我党进一步教育了干部，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蒋介石反动派，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关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由于革命形势有了极大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政策能够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九四八年，毛主席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文件。

毛主席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在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甚至将自己管理的地区，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活动和政策内容，发生了某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11页。

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因此，当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形势迫切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坚决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中央规定各级领导对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要全部遵守，不得擅自修改；规定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必须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中央还严格地批评了某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及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不良现象，并规定必须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一切重要问题均需经党委集体讨论，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即注意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

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毛主席提出的在新的条件下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会的集体领导的指示，是对我党建设的重大贡献。

【整军运动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期间，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的空隙，以诉苦和三查的方法，实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

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对全体指战员进行阶级教育、土改教育和坚定立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经过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全军的团

结，纯洁了部队，整顿了纪律，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发扬了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的民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解放热河地区隆化县时，董存瑞舍身炸毁敌人桥上暗堡，使部队顺利解决了战斗的英雄事迹，就是我军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提高的体现。

人民解放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以后，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自一九四八年春起，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又粉碎了敌人“分区防御”的新战略。

在南线，我军进入中原地区获得初捷之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迅速建立起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为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立了强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基地。在西线，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四月收复革命圣地延安，为解放全西北打下了基础。在西北的胜利局面已经奠定的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离开了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于五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东线，华东解放军收复山东解放区大部失地之后，又重新建立了江淮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接通。在东北，我军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发起了大规模冬季攻势后，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使国民党据守的长春、锦州、沈阳之敌陷于孤立，解放全东北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华北，除北平、天津、保定、塘沽一带敌占区和太原孤城外，敌人在华北解放区的重要据点已全部肃清，从而为解放全华北创造了条件。

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我军经过内线外线作战的配合，取得了粉碎敌人“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重大胜利。这一年，共歼敌一百五十二万人，解放人口三千七百万，解放城市一百六十四座。解放区面积已达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也有了新的高涨。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城市掀起更大的反压迫、反饥饿斗争高潮。五、六月间，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又蓬勃展开，各大城市举行了万人以上的大示威。许多工人和学生为了配合解放军夺取城市，积极准备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还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游击部队发展到三万余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更加强大了。

这时，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也更加扩大和巩固。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曾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迫害，不能公开活动。这就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一九四八年一月，已被国民党下令解散的民主同盟在香港重建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同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在香港成立。他们当时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采用我党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我党发布纪念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

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后，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陆续进入解放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蒋介石反动集团已经彻底孤立，我党则得到了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拥护。

我军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党的各项工作的重大成就，表示着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已经完全成熟。

第四节 党为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准备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斗争。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

一、伟大的战略决战。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一九四八年秋，由于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的战略进攻中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军，使战争形势出现了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二百八十八万人，其中野战军一百四十九万人，军队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战争中我军缴获敌人大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

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积累了阵地战的经验。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和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解放区人民觉悟空前提高，生产迅速发展，参战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主要解放区已相继形成一片，我军后方更加巩固。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减少到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万人，并分别被我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北五个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被迫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这时，反动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还处于优势，但是，由于反革命战争连续失败和法西斯统治极端腐朽，敌军士气极为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人民反抗更加激烈，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是摇摇欲坠之势。

敌我力量对比的新形势表明，我军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毛主席纵观全局，及时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时机，果断地下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当时，全国各主要战场的形势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而东北战场的形势则对我更为有利。整个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有了巩固的后方，经济上在全国各解放区占第一位。东北我军在质量上、数量上都已超过敌人，有主力部队七十万人，地方部队三十万人。敌人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人，非正规军七万人，孤立固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点上，蒋介石正在制定“撤出东北、确守华北”的计划，但又举棋未定。我军抓紧敌人尚未决策的时机，首先消灭东北敌军，既可粉碎敌人的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使我军及时转入关内作战，还可利用东北工业支援全国战争。毛主席根据东北战局的有利条件，从战争全局出发，毅

然决定战略决战从东北开始，发起了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东北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这次战役，自始至终是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但是，当时，身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却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情况判断、下定决心、战役方针、战役方向、战役部署指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为此，毛主席曾先后给林彪发了数十封电报，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坚决的斗争，克服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毛主席分析了东北战场的形势，提出东北我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既可以切断东北之敌从陆路向关内的退路，实现就地歼灭敌人的战略计划，又可以使华北和东北的敌军互相孤立，不使华北之敌增援。从一九四七年五月起，毛主席就多次指示林彪，要准备南下作战，应当集中主力，切断北宁线。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主席明确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把敌人歼灭在东北为有利。但是，林彪一再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正确方针，害怕敌人，害怕打大仗。从一九四八年四月起，他借口打长春，又不敢打长春，一直在长春、沈阳之间打转转，一会儿要打，一会儿要围，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在毛主席多次批评后，直至七月二十日才表示攻打长春没有把握，愿意执行南下作战的方针。但他又借口南线的敌情严重，粮食无法解决，全军皆无雨具，拖延时间南下。毛主席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林彪“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

锦州、榆关、唐山诸点”^①，“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②，“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③，“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④这样，林彪才不得不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部署部队南下北宁线，但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

锦州是北宁线上的一个战略要点，打下锦州，才能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才能调动沈阳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歼灭它，进而取得全胜。能否迅速打下锦州，成了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毛主席曾多次向林彪分析了打下锦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示林彪不要分散兵力。但是，林彪拒不执行迅速打下锦州的指示，先提出要去打承德；接着又提出要去打山海关；后来又被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吓破了胆，提出要把主力拉回北线打长春。毛主席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反复说明攻打承德、山海关、长春的严重后果，强调指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⑤，“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⑥经过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林彪才不得不放弃其错误主张，将攻击重点，放在锦州。

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于九月十二日到达北宁线，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十月一日攻克义县。十月十四

①②《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230页。

③④《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231页。

⑤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232页。

日，对锦州发起总攻击，经三十一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集团十万余人。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十一万敌军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

毛主席早就预见到，锦州攻克后，敌人有从营口逃跑的可能，为了全歼东北残敌，曾先后给林彪七次电报，命令他以足够兵力，迅速控制营口。但是，林彪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致使敌军一万余人，首先占领营口，从海上逃跑。

我军攻克锦州之后，立即向东北方向回师，十月二十七日在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全歼由沈援锦之敌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十一月二日，我军乘胜猛追，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十四万九千余人。至此，东北全境完全解放。整个战役，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见附图七）

辽沈战役的胜利，加上当时其它各战场的胜利，使敌人兵力下降为二百九十万人，我军则上升为三百万人以上。至此，在数量上我军也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东北全境的解放，为解放华北准备了前提，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央军委对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统一整编，将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三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

当辽沈战役还在进行时，为了给敌军以持续的歼灭性打击，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部署了歼灭长江以北南线蒋军主力的大会战。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华东、中原地区的地方部队共六十余万人，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

商邱，北起临城（今菏泽），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动了淮海战役。

当时，淮海地区的敌军，连同后来从华中增援的敌人共达八十多万人。为了避免被我军各个击破，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敌人以徐州为中心，采取所谓“一点两线，重点密集”的部署，便于机动和相互增援。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指示我军应采取集中兵力，迅速围歼位于陇海路东段较为孤立之敌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以斩断敌人之右臂，并吸引徐州之敌出来增援，在运动中分批歼灭。从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三日，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一举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十七万八千人，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之势。接着我军主力转战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包围并全歼了由河南南部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十二万余人。徐州守敌三十万人慌忙弃城而逃，我军经三天猛追，将逃敌围困于永城东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十日，我军发起总攻，再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俘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六十五天，歼敌五十五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见附图八）

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将获全胜的有利形势下，为了夺取战略决战的彻底胜利，毛主席又及时部署了平津战役。这次战役，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

当时，华北六十万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困守于北平、天

津、张家口三个地区，十分孤立，预感到将受我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夹击，是守是逃，是西窜绥远，还是南逃江南，还在犹豫不决。毛主席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战场的形势，及时地作出了稳住敌人，不使逃跑，分割包围，就地全歼的英明战略决策。并且排除了林彪的破坏和干扰，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

为了拖住华北敌人，不使逃跑，东北主力早日入关是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条件。毛主席早在辽沈战役结束前夕，就电令林彪督促先遣部队先行入关；并要他在精神上，组织上和物资上做好入关准备。时隔半月，林彪却置若罔闻，毫无反映。接着毛主席和军委又几次电示，东北主力早日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出敌不意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在包围态势下进行休整。而林彪却以“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新兵和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部队冬装“尚未发下”为借口，硬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针对林彪按兵不动，不想入关，可能放跑敌人的错误，毛主席再一次严令林彪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取捷径以最快速度，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经过毛主席和中央三令五申，林彪才不得不部署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入关。

为要稳住敌人，不使其过早发觉我军人关，东北主力隐蔽行动，秘密入关，是极为重要的措施。毛主席几次电示林彪，部队行军路线必须十分隐蔽，夜行晓宿，不要走山海关。但是林彪借口山海关以北地区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又有敌机侦察，“已无秘密可言”，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

示，擅自命令三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这就把我军行动暴露给敌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已令华北我军在平张线分割包围了敌人，将敌注意力引向西方，才未造成严重后果。

东北野战军入关以后，矛头指向何处，是关系战役全局的重要环节，毛主席首先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的方针。规定东北我军入关后，先包围天津、塘沽、唐山诸点，切断北平敌人海上逃路。林彪却无视战役全局，不去隔断平津联系，多次提出要用先头部队去打南口的错误主张，毛主席当即指出，这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有迫使北平之敌逃向天津、塘沽的危险。但是，林彪仍令三纵“全力向南口前进”。毛主席急电制止，严令“三纵决不要去南口”^①，林彪才被迫放弃其错误主张。毛主席针对林彪过高估计敌人的战斗力，不敢切断敌人，不敢打歼灭战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②，这就打中了林彪的要害。

由于毛主席在战役一开始就为我军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错误，就使我军迅速完成了对平、津、张全线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我军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集中优势兵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张家口。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守敌拒绝放下武器的情况下，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人，解放天

^①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256页。

^②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255页。

津。我军攻下两头后，北平二十余万守敌，完全陷于绝境，由于我方的努力争取，北平守敌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经过五十六天，歼敌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见附图九）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解放，从而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三大战役中，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广大群众日夜不停地为前线赶运弹药粮食，转送伤员，自愿组织运输队。担架队随军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三大战役中，各地支前的民工达五百四十万人，担架十万多付，大车三十八万辆，牲畜一百多万头，粮食九十五亿斤。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美蒋“和平”阴谋的被粉碎】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已被消灭，只剩下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蒋家王朝已面临全面覆灭的绝境。美蒋反动派看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方法加以阻止，就日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除了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分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外，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玩弄“和平”阴谋，幻想争取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又

妄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装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发表了一篇虚伪的声明，演出了一场战犯求和的丑剧。妄图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荒谬条件下，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显然，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但是，美蒋这一“和平”阴谋，却使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的一些人发生了动摇。他们对美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对国民党的失败表示怜惜，特别是某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人民中间散布各种和平妥协思想，要求人民接受美蒋的“和平”建议，举行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所谓的联合政府，结束革命，否则就“不够伟大”，“不合国情”等等。这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跳出来，胡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了”，叫嚷要“慢一点”，“从从容容地准备”，妄图使革命半途而废。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词中，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再一次深刻地分析了敌人的反动本性，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的胜利，只能迫使敌人变换反革命的策略，而决不可能改变他们与人民为敌的阶级本性。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

经进行了仁至义尽的努力，希望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并没有改变敌人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毛主席还用古代希腊一个农夫因为怜惜冻僵了的毒蛇，结果自己反而被毒蛇咬死的寓言，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

毛主席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出：“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中国人民才能解放，“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否则，就将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那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和平，更不可能实现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针对美蒋反动派要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的阴谋，一些“自由主义人士”散布的孔老二的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毛主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一切真正愿意参加目前革命事业的人们，都要做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不要上美蒋“和平”阴谋的当，那种“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

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为了彻底粉碎美蒋的“和平”阴谋，毛主席于一月五日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十四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所谓“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分的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①这八条，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的条件，是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

毛主席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一月二十一日，被迫“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继续玩弄“和谈”阴谋。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1280页。

蒋介石则在幕后操纵，妄图利用“和谈”，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四百个师二百万人，伺机卷土重来。李宗仁上台后，表面上愿以我党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四月一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依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命令，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这样，美蒋反动派的求和骗局，就彻底被戳穿。

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党为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

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支柱，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只有彻底消灭它，才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毛主席总结了解放战争的经验，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如天津的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采取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但也不是不用斗争。毛主席十分重视作为国家政权主

要组成部分的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时期内，也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新的人民政权广泛建立，需要大量干部，“**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须依靠人民军队；巩固政权，也必须依靠人民军队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根本标志，也是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根本保证。毛主席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指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对建国工作必须积极地筹备。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农民阶级，同时，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便彻底打倒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主席说，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需要。毛主席还及时提醒全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

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为了胜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毛主席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首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样，人民政权才能得到巩固。

毛主席在报告中，论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和政策。

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强调了必须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能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中国革命必须不停顿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全国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着重提出：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战线坚持阶级斗争，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毛主席充分估计到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严重、复杂形势，告誡全党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号召全党同志，要在新的形势下，

学会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同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必须不断肃清反革命的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必须有力地反击资产阶级的公开的猖狂进攻，也必须**“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

毛主席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各种成分，规定了党所必须采取的方针政策，指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毛主席指出：旧中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现代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上的问题。谁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首先，在现代工业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就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次，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现代工业中占第二位，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由于中国的经济落后，在一定时期还应加以利用，但必须从各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自由泛滥，并要逐步地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强调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

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放弃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政策，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反过来，认为可以立即全部消灭私人资本，则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再次，对于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这样，毛主席就从理论上、政策上奠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预见到革命胜利后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及时地提出要警惕停顿不前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号召全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袭、腐蚀下，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是他们经不起糖弹的袭击，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必须树立不断革命和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主席教导全党必须保持优良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深刻地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毛主席关于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坚持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思想，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关于警惕糖衣炮弹进攻的论述，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这篇文献的光辉思想，将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

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之后的第二天，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①

^①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选集》第1340页。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作战，两天两夜时间，即彻底摧毁了美蒋反动派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接着，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分路向南挺进，相继解放了杭州、南昌等地。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上海。继而又进军福建，解放福州。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强渡长江。五月十六日、十七两日解放了武汉三镇，接着和平解放湖南，又向广东、广西进军。与此同时，华北各兵团于四月攻克太原。第一野战军于五月解放西安后，与华北两个兵团进军西北，解放兰州、西宁、银川。九月，新疆、绥远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和华北全区全部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向华南、西南大进军，解放全国大陆的形势已经完全确定。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由我党发起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常务委员会，着手进行建国的准备工作。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中国要向那里去？当时，对这个根本问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大肆诬蔑和攻击，咒骂中国共产党“独裁”，是“极权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则始终幻想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

路，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主张对反动派施“仁政”，幻想英美的“援助”，害怕“刺激”帝国主义，反对向社会主义“一边倒”，等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公然对抗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相呼应，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极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胡说：“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青年时代”，“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不可靠”，“不要一个阶级专政”等等。

为了阐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给全党全国人民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道路，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新中国的种种恶毒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所鼓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毛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前夕，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

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深刻地阐明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明确地规定了新的国家政权的性质。

针对资产阶级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精辟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而“**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这就从辩证法的宇宙观高度，阐明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政权是消灭阶级和国家的重要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使人类走到更高一级的社会，进到大同境界的必由之路。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先进的中国人，曾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革命真理，找中国的出路，但都失败了。“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中国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历史的经验证明，“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在概括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正是为了“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毛主席还明确地规定了各个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工人

阶级是领导力量，“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团结他们，“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主席的这些论述，进一步粉碎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妄图争夺领导权，改变国家性质的幻想。

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还强调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全面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对国内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科学地预见到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了强化人民政权的必要性。针对资产阶级要我们消灭国家机器的谬论，尖锐地指出：“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为了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和破坏，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只能强化，决不能削弱。

毛主席着重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

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主席痛斥了国内外反动派和孔孟之徒的“你们独裁”、“你们不仁”的叫嚣，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因为“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毛主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地实行企业国有化。对民族资产阶级要进行教育的和改造的工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将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最后被消灭。毛主席强调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就粉碎了资产阶级企图在国家政权中争夺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的痴心妄想。

毛主席认为教育和改造小生产是无产阶级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而“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一切旧思想开展长期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毛主席说：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

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组织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国内外敌人曾经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等待我们的失败。毛主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建设起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还提出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必须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孤立打击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国内外反动派并不存在刺激与否的问题，只能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要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要区别革命力量的友谊援助和资产阶级赚钱做生意的行为。幻想英美政府的援助，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毛主席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对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幻想英美援助，害怕刺激帝国主义等错误观点。

从上述情况，完全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担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使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也不是全国革命胜利前部分地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我国条件下无产

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

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文献。这篇文章，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规定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和对国内外的基本政策，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创造了我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痛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恶毒诽谤，打破了资产阶级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批驳了刘少奇在建国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这篇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指导我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指路明灯。

【毛主席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引起了美国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激烈争吵。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被迫抛出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颠倒黑白，隐瞒捏造，充满着对中国革命的诬蔑和仇恨。但是，为了说服争吵的对手，推卸失败的责任，艾奇逊等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公开暴露若干反革命的真相。同时还公开声称他们今后还要继续捣乱，企图利用“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这样，白皮书在事实上就成了美帝侵华罪恶的自供状。

为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和争取那

些对美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八、九两个月中，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著名的评论。

毛主席痛斥了美帝国主义肆意歪曲、篡改中美关系的历史，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针对艾奇逊把侵略说成“友谊”的谬论，毛主席指出，美国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进行鸦片战争起，一贯伙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外，还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动了由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民，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一百零九年的中美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腥罪恶史，美帝国主义从来就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的经验，发出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针对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幻想美帝国主义“强盗收心做好人”的错误思想，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①毛主席总结了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5—

1376页。

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对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①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②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③，只有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反动分子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毛主席号召一切先进的人们，都有责任去说服教育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使艾奇逊的一套无所施其伎。

毛主席严厉地批驳了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透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针对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历史唯心主义，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④为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教育人民，帮助那些具有唯心史观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正确地认识问题，毛主席严厉地驳斥了艾奇逊之流关于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首先，毛主席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5页。

②③④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痛斥了艾奇逊胡说中国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人口太多”的谬论。指出：古今中外革命的历史表明，人口问题从来不是发生革命的原因，民族的和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才是爆发革命的真正根源。毛主席还驳斥了艾奇逊的所谓中国人口太多是“不堪负担的压力”的谎言，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革命能改变一切，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其次，毛主席驳斥了艾奇逊胡说中国革命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西方的影响”的谬论。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中国革命，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在这个反抗过程中，中国人民也曾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都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并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才由失败转为胜利，最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

毛主席的这五篇光辉评论，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帝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揭示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帮助那些动摇犹豫的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有力地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从内部颠覆人民政权的阴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在北平胜利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代表共六百六十二人。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主席在致开幕词时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制定了国旗、国徽，决定了国歌，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的临时大宪章，它对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对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九月三十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选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了由六十五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同日，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一唱雄鸡天下白”，占人类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象一个坚强的巨人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这是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同时也是对世界人民革命的有力支援。它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促进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

附表一：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歼敌统计表
(1946年7月—1950年6月)

| 项目 年度 | 毙伤 (人) | 俘虏 (人) | 投诚 (人) | 改编 (人) | 起义 (人) | 合计 (人) |
|----------|-----------|-----------|-----------|-----------|-----------|-----------|
| 第一年度 | 426,000 | 677,000 | | | 17,000 | 1,120,000 |
| 第二年度 | 540,200 | 953,000 | | | 28,200 | 1,521,400 |
| 第三年度 | 571,610 | 1,834,010 | 242,780 | 271,000 | 130,600 | 3,050,000 |
| 第四年度 | 173,300 | 1,122,740 | 390,730 | 22,030 | 671,150 | 2,379,950 |
| 总计 | 1,711,110 | 4,586,750 | 633,510 | 293,030 | 846,950 | 8,071,350 |

附表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缴获统计表

(1946年7月—1950年6月)

| | | | | | |
|-----|-------------|---|------|-----------|---|
| 各种炮 | 54,430 | 门 | 坦克 | 622 | 辆 |
| 长短枪 | 3,161,912 | 支 | 装甲车 | 389 | 辆 |
| 机枪 | 319,958 | 挺 | 汽车 | 22,012 | 辆 |
| 飞机 | 189 | 架 | 机车 | 1,016 | 辆 |
| 舰艇 | 200 | 艘 | 马匹 | 195,475 | 头 |
| 子弹 | 507,984,700 | 发 | 炸药 | 1,458,814 | 斤 |
| 炮弹 | 5,527,400 | 发 | 通信器材 | 3,626 | 件 |
| 手榴弹 | 3,635,790 | 个 | 其他武器 | 36,881 | 件 |

附表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民兵参战人次、战绩统计表

(1946年6月—1950年10月)

| | | | | | |
|------|----------|-----|-----|-----------|------|
| 大参歼 | 小战敌 | 战民总 | 斗兵数 | 114,700 | 次 |
| | | | | 2,284,800 | 人次 |
| | | | | 204,700 | 人 |
| 主要缴获 | 各种 | 种 | 炮 | 400 | 门 |
| | 轻重机枪、冲锋枪 | 短 | 枪 | 1,800 | 挺(支) |
| | 长短炮 | 子 | 枪 | 54,700 | 支 |
| | 手榴弹 | 榴 | 弹 | 2,772,300 | 发 |
| | 汽车 | | 弹车 | 59,400 | 个 |
| | | | | 100 | 辆 |

附表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统计表

(1948年9月—1949年1月)

| | | | |
|---|---|---------|-----|
| 俘 | 虏 | 865,000 | 人 |
| 毙 | 伤 | 257,000 | 人 |
| 起 | 义 | 54,000 | 人 |
| 投 | 诚 | 120,000 | 人 |
| 改 | 编 | 250,000 | 人 |
| 合 | 计 | 154 | 万余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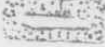





附表五：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支援前线统计表

| 项目 | 战役 数目 | 辽沈战役 | 淮海战役 | 平津战役 |
|----|----------|-----------|----------|---|
| | | 民挑担小大汽牲船粮 | 工子架车车畜只食 | 160 万人 13,800付 6,750辆 30,000头 7,000万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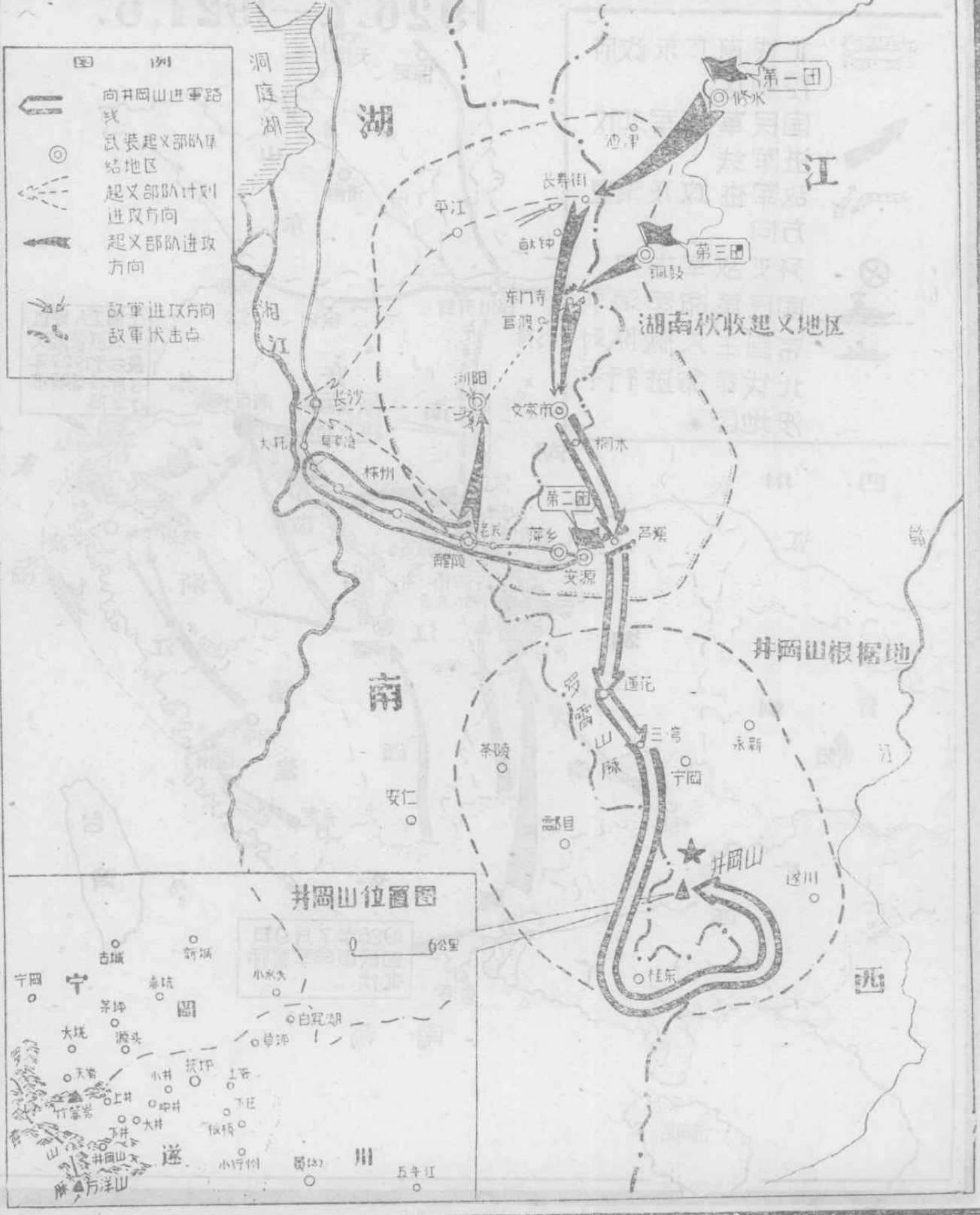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

1926.7.—1927.6.

-  北伐前广东政府控制区
-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线
-  敌军进攻及溃退方向
-  歼灭敌军主力
-  国民革命军海军
-  帝国主义舰队对北伐革命进行干涉地区



湖南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9月-1928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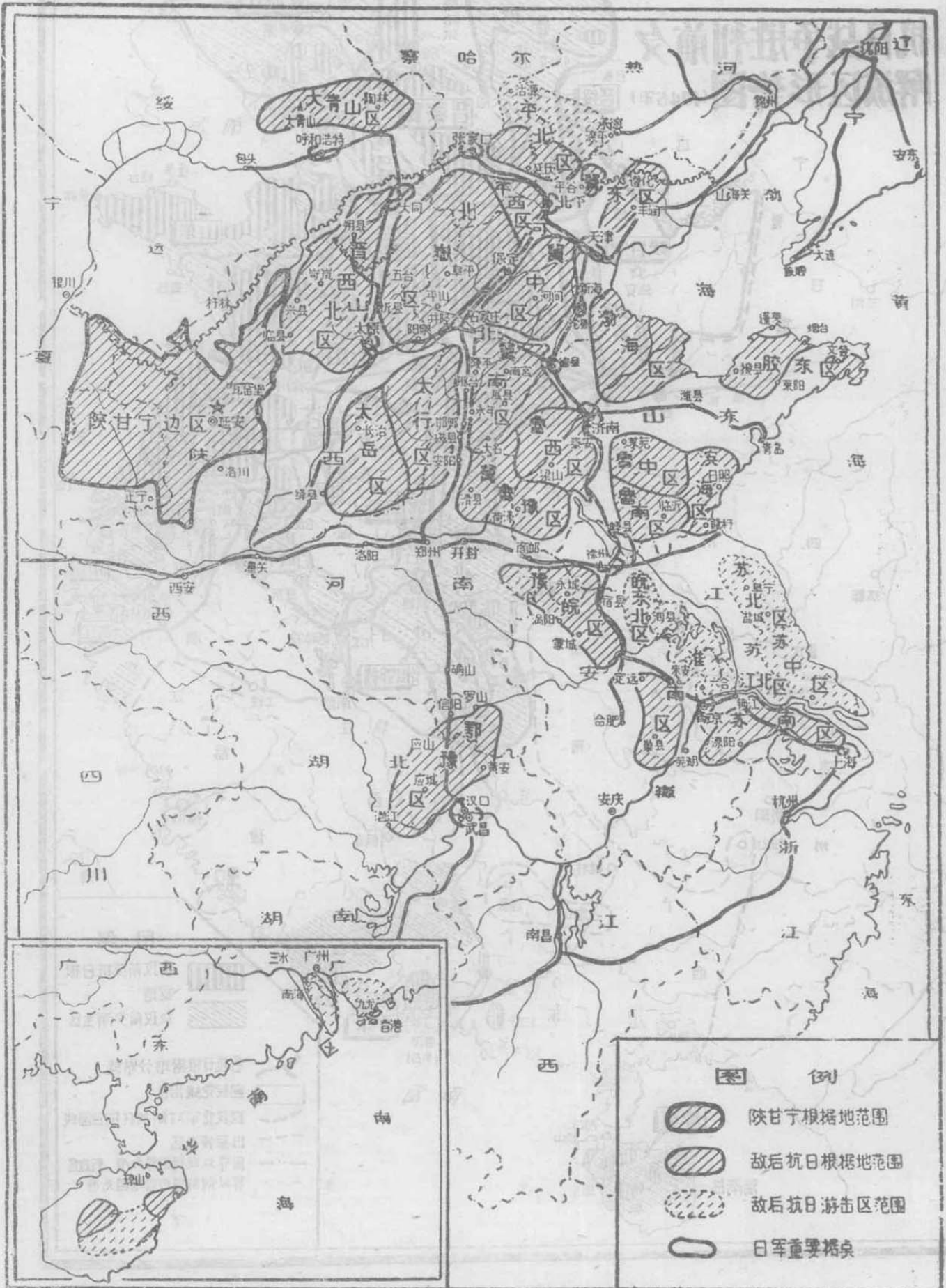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附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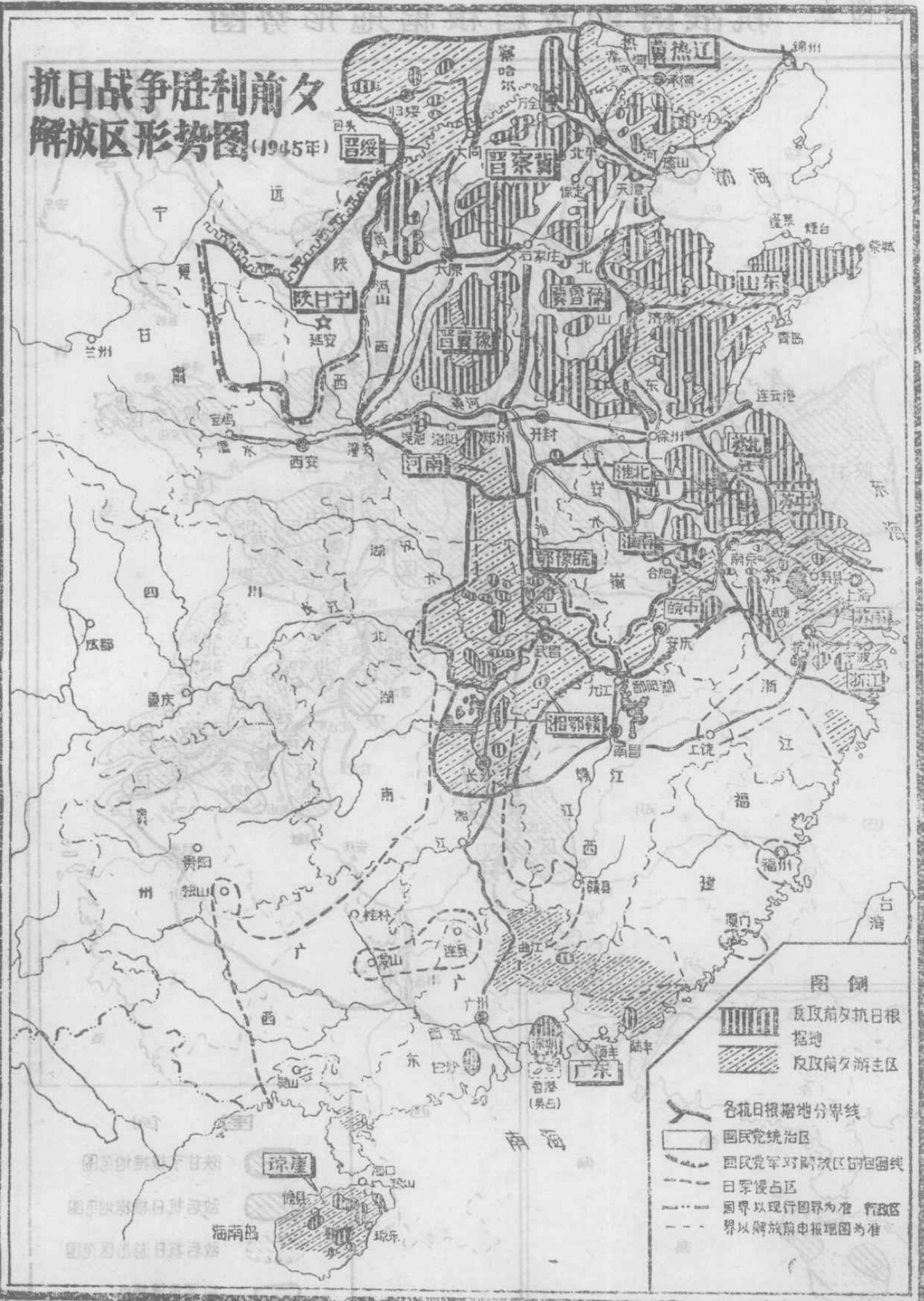
附图五 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地形形势图



- 图例**
-  陕甘宁根据地范围
 -  敌后抗日根据地范围
 -  敌后抗日游击区范围
 -  日军重要据点





附图六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解放区形势图 (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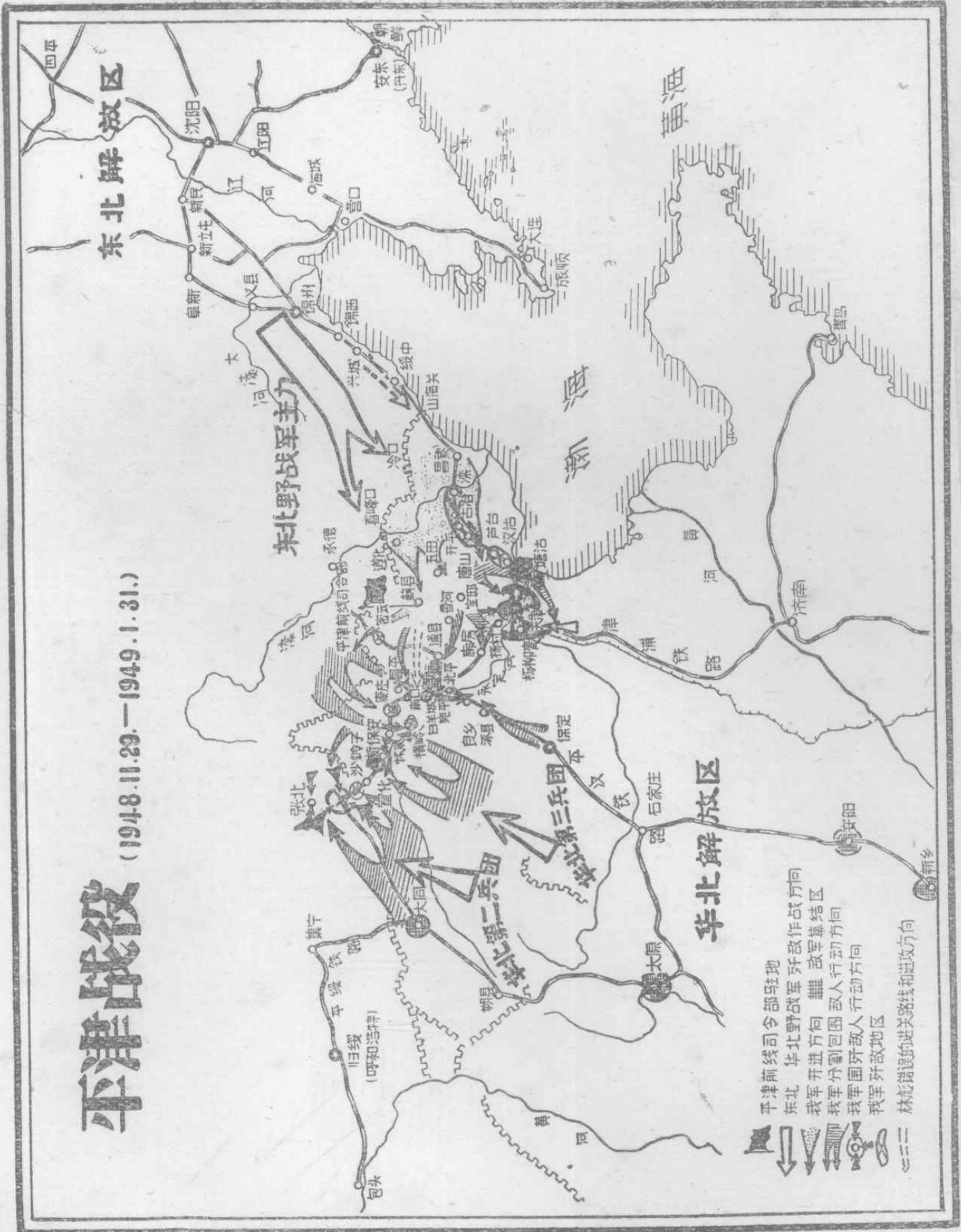
淮海战役 1948.11.-1949.1.



 战役第一阶段我军进攻方向
 战役第二阶段我军进攻方向
 战役第三阶段我军进攻方向
 我军歼敌地区

平津战役

(1948.11.29—1949.1.31.)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Lit5Zu95YWx5Lqn5YWa5Y6G5Y+y6K6y5LmJICDkv67mlLnnqL8glOS4il8xMjM2NTcwOC56aXA=",
  "filename_decoded": "\u4e2d\u56fd\u5171\u4ea7\u515a\u5386\u53f2\u8bb2\u4e49 \u4fee\u6539\u7a3f \u4e0a_12365708.zip",
  "filesize": 62835571,
  "md5": "2a448f397c08b6aa4e906977425bac11",
  "header_md5": "aff51de6b729c4178052389bb8e0dbf3",
  "sha1": "0653dd5a237cc2c32bee0cabdd9ac1f6d6e33489",
  "sha256": "9e3efa05200ab05c527bc3e2a30f5427a3fb03cfd875c8aba015b1609981bb0e",
  "crc32": 411692243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64715668,
  "pdg_dir_name":
  "\u2553\u2568\u2563\u00b7\u2563\u2593\u2593\u00b7\u2561\u2502\u2514\u00b7\u2569\u2556\u255c\u2593\u2565\u03c3
  \u2568\u2590\u2555\u2500\u2555\u03c3 \u2554\u2567_12365708",
  "pdg_main_pages_found": 335,
  "pdg_main_pages_max": 335,
  "total_pages": 359,
  "total_pixels": 112348044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